

世界史的誕生

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

〔日〕冈田英弘
陈心慧
译 著

界

史

の

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世界史的诞生

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

〔日〕冈田英弘

陈心慧
译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5 - 1477

SEKAISHI NO TANJO by Hidehiro Okada

Copyright © Hidehiro Okada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kumashobo Lt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hikumashobo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Beijing.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2016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八旗文化（台湾）授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史的诞生 / (日) 冈田英弘著 ; 陈心慧译.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 - 7 - 200 - 11662 - 5

I . ①世… II . ①冈… ②陈… III .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0050 号

世界史的诞生

SHIJIESHI DE DANSHENG

[日] 冈田英弘 著

陈心慧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 销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7.25 印张 134 千字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1662 - 5

定价：38.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前　言

十九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名为《世界史是否成立》的文章（《历史与地理》211，1973年4月）。文章中指出，“世界史一词在我们心中所唤起的是两个近乎矛盾的观念相互重叠，整体的轮廓模糊不清，很难掌握”。这两个观念其一是明治时期以来的“万国史”。“万国史”是在明治初期，面对同一时间突然大量来袭的各国西洋人，为了与他们交涉，日本人急需知道对手的背景。因此，从希腊、罗马开始，一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在日本互争长短的法国、英国为止，万国史叙述了西洋各国的兴亡盛衰。“万国史”改编自欧洲人的“原书”，但由于改编的是日本人，因此在选择记述的事项时，是根据日本人所持有的传统历史观，也就是从汉文书典中所学到的中国“正史”观。

对于接受中国文化熏陶超过千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历史的重点在于哪一个政权被授予“天命”，属于“正统”。为此，“万国史”记载的对象实质上仅限于从希腊、马其顿

帝国、罗马帝国、日耳曼分支出来的英国、法国以及德国。这说明了“天命”传递的顺序，也代表承认明治时期三大列强的“正统”。这个中国型的“万国史”属于“西洋史”，与源自中国史的“东洋史”并列，这就是日本历史学的现状。

无论是“东洋史”或是“西洋史”，两者皆以中国型的“天命”与“正统”史观的理论为基础。而两者是各自独立撰写完成的历史，基本上无法相提并论。日本人想尽办法修改“东洋史”，希望能够更接近“西洋史”。这些方法或是将“东洋史”以时代区分，或是另外撰写东西文化交流史、塞外史、社会经济史。然而，无论是哪一种方法，都在不自觉地将日本人的历史观根于中国型历史的情况之下，将“西洋史”的用语表面上套用在“东洋史”上，最后都招致失败，更遑论历史学的统一。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学制改革，将东洋史与西洋史合并，出现了“世界史”这个科目。

但事实上，将东西洋史合并是一个无理的要求。就算两者都是建立在中国型的“正统”思想上，但东西方的“天命”相互对立，就好像水和油无法相容一般。在日本高中世界史的教材里，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矛盾。将东西洋各自呈现纵向的脉络横切之后相互堆叠，无论对教学的人或是学习的人而言，都是不合逻辑的事情。我听说很多日本高中老师在教西洋史的时候，会从世界史的教科书中

取西洋史的部分，等到教东洋史的时候再取东洋史的部分，将东西洋史分开教授。这样一来，“世界史”和过去完全没有分别。

另外，合并东洋史与西洋史的“世界史”，当中竟然没有包含属于“国史”的日本史。这样的做法导致在日本的学校里，日本人所学的是将日本排除在外的世界史。就好像日本不属于这个世界一般，日本的历史与世界史毫无关系，日本也没有对世界有任何的影响。如此一来，应该学习的“世界史”大事选项当中完全没有与日本相关观点，学的大事愈多，逻辑愈混乱。想当然地，世界史的知识只会愈来愈杂乱无章。

《世界史是否成立》一文的最后我以“最起码在现在的日本，真正的世界史并不成立。但就算如此，学校却不得不教授世界史。要解决这样的矛盾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从大学联考中废除世界史这个科目”当作总结。但我并不满意这个悲观的结论。正如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需要“万国史”一般，姑且不论大学联考，现代的日本人还是需要世界史，需要重新创造出符合逻辑的世界史。

为此，我们必须重新认知，历史属于地域性，并不具有普遍性。是属于创造出东洋史的中国世界与创造出西洋史的地中海世界两者的特有文化。在这样的认知之下，知道从中央欧亚大陆的草原分别向东西发展的势力创造出了中国世界和地中海世界，经过不断地变化，演变成我们现

在所看到的世界，沿着这样的逻辑，才有可能记述单一的世界史。

我的这种想法，一部分已经写进《汉民族与中国社会》（山川出版社，1980年）、《中央欧亚的世界》（山川出版社，1990年）以及《有历史的文明与没有历史的文明》（筑摩书房，1992年）当中。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便是将我的这种想法付诸实行，试着统一记述世界史。我在这里非常感谢筑摩书房的汤原法史先生，给我机会进行这样大胆的尝试。

目 录

前 言 (1)

第1章 1206年的天命

——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	(1)
成吉思汗	(1)
蒙古之外的世界	(2)
罗斯的公爵们	(4)
立陶宛人	(6)
东罗马帝国	(9)
阿尤布家族	(10)
西欧	(11)
统治世界的天命	(13)
历史是文化	(14)
没有历史的文明——印度文明	(19)
没有历史的文明——玛雅文明	(22)
对抗文明的历史文化	(24)

第2章 对立的历史

——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29)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29)
被扭曲的神话	(32)
对立的历史观	(37)
《旧约圣经》的历史观	(40)
《启示录》的历史观	(44)
东西的对立	(50)

第3章 皇帝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52)
司马迁的《史记》	(52)
《史记》的构成	(54)
五帝	(55)
东夷的夏	(58)
北狄的殷	(60)
西戎的周	(61)
西戎的秦	(63)
正统的理论	(65)
班固的《汉书》——儒教	(69)
正史架构的定型	(74)
正史架构的裂痕	(76)

正史的缺陷 (80)

第4章 创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 (87)

草原的游牧民族 (87)
中央欧亚草原之道 (92)
印欧人 (95)
匈奴帝国的出现 (97)
游牧帝国的理论 (101)
匈奴人的出现 (107)
罗马“帝国”的虚构 (109)
第二阶段的中国——鲜卑 (111)
汉语的变迁 (117)

第5章 游牧帝国的成长

——从突厥到契丹 (120)
阿瓦尔人的出现 (120)
突厥人的出现 (122)
斯拉夫人的出现 (125)
突厥文字 (128)
西藏文字 (130)
回鹘人的祖先 (131)
中国的突厥人 (133)

契丹帝国	(134)
基督教传向蒙古高原	(139)
党项人	(141)
可萨汗国	(141)
罗斯人的出现	(144)
钦察人	(147)
第6章 蒙古帝国创造世界	(149)
《资治通鉴》的中华思想	(149)
金帝国	(151)
资本主义的萌芽	(153)
蒙古人的出现	(154)
蒙古的发展	(157)
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人	(158)
征服欧洲	(159)
征服西亚	(161)
征服南宋	(162)
蒙古帝国的构造	(163)
蒙古帝国创造的各国国民	(164)
蒙古的继承国——中国	(166)
蒙古与儒教	(167)
清朝复兴蒙古帝国	(169)

蒙古的继承国——俄罗斯	(170)
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	(175)
蒙古与资本主义经济	(178)
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	(180)
第7章 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	(184)
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大领域	(184)
日本史的特征	(186)
中国型的西洋史	(189)
东洋史的失败	(191)
蒙古帝国让世界史变得可能	(194)
拉希德丁·哈马丹尼的《史集》	(194)
贡噶多吉的《红史》	(196)
杜撰的《元朝秘史》	(197)
《蒙古源流》	(198)
单一世界史的可能性	(201)
参考文献的解说	(204)
后 记	(216)

第1章 1206年的天命

——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

成吉思汗

公元1206年春天，在蒙古高原北部、肯特山中、鄂嫩河（古称黑水）上游的附近草原，游牧民族各部族的代表齐聚在此地召开大会，选出蒙古部族的首领铁木真为共同的最高领导者。铁木真的堂兄弟大萨满（巫师）阔阔出是游牧民族各族人的宗教领袖，他被认为拥有可以骑马登天的神力，蒙古人称他为“帖卜·腾格里”，意指“通天使者”。

在此之前，游牧民族最高领导者的称号为“汗”，他们习惯在“汗”之前冠上各种赞美的词汇当成尊称。“成吉思”是古突厥语的蒙古发音，有“激烈、严格”之意。就这样，铁木真在鄂嫩河上游之地，扬起名为“秃黑”的军旗（从长杆顶端的金轮垂下九根的白色长毛，类似江户时代救火队的布条），举行了即位仪式，尊号“成吉思·汗”。这是蒙古帝国建国的开始，也是世界史诞生的瞬间。

在这伟大的瞬间，蒙古高原以外的世界又发生了些什么事呢？

蒙古之外的世界

在日本，当时是由军人掌握国家实权的时代。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征夷大将军源实朝在由比滨打造大艘军舰，准备亲自远征中国。然而，造船不幸失败，源实朝在十三年后于镰仓的鹤冈八幡宫，被外甥公晓杀害。

在韩国，高丽王国虽然统一了朝鲜半岛，但依然属于军人掌权的时代，将军崔忠献巩固了崔氏四代的武臣政权（相当于日本的幕府）。

高丽的西边是女真（女直）人所建立的金帝国，统治满洲、内蒙古以及到淮河为止的华北一带。

在金帝国的南方，由汉人建立的南宋帝国统治华中、华南一带。首都杭州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市，有上百万定居此处。朱熹（新儒教朱子学的始祖）在南宋怀才不遇，六年前郁闷而终。

在金帝国的西方，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国统治从内蒙古西部到宁夏、甘肃一带的城市和游牧民族。

在西藏高原，地方豪族鼎立，各自保护各自的佛教高僧和教团，努力振兴地方发展。其中，在西藏西部豪族昆氏所建的菩提寺——萨迦寺（接近日喀则）里有一位二十五岁的

青年僧侣名为贡噶坚赞。他向从印度逃亡而来、知识渊博的学者学习佛教的教义，之后自己也成为一位大学者，被称为萨迦·班智达（萨迦的权威）。他的外甥就是八思巴。

在喜马拉雅山脉南方的北印度平原，至今为止都是佛教占有优势。但在大约二十年前，伊斯兰教徒的阿富汗人首领——古尔家族的穆罕默德率领骑兵队从阿富汗入侵北印度，征服印度人的国王们，取得广大的领土。从此以后，在印度，伊斯兰教开始比佛教更具优势。公元1206年，穆罕默德在古尔遭到暗杀，古尔家族在阿富汗的领土被北方的花剌子模帝国合并。而穆罕默德在北印度留下的王国由曾是他奴隶的突厥人将军——库特布丁·艾伊拜克继承，在德里建立了奴隶王朝。这个德里苏丹王国的繁荣一直持续到公元1290年。

在阿富汗的北方，楚河（现在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畔的草原上，从东方移居此地的佛教徒契丹人建立了黑契丹（西辽）帝国。当时在位的是黑契丹最后一个古儿汗（皇帝）直鲁古（天禧帝），在中亚地方拥有强大的势力。“黑契丹”在突厥语中含有“黑色的契丹人”之意。今日，俄语称中国为“契丹”，中国人为“契丹人”，便是受此影响。

黑契丹帝国的西方、咸海南方的花剌子模地区（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由突厥人伊斯兰教徒所建立的花剌子模王朝日益茁壮。这个皇家的祖先也是突厥奴隶出身，

世世代代都是黑契丹古儿汗的臣子。虽然如此，花刺子模掌管西土耳其斯坦至伊朗高原一带，是一个占据伊斯兰世界东半部的大帝国。当时的花刺子模王阿拉乌丁·摩诃末秘密计划向黑契丹发动独立战争。数年之后，摩诃末击败黑契丹大军，完成独立。

花刺子模的北方、哈萨克斯坦的草原向西，经过北高加索、乌克兰直到多瑙河为止的广大草原地带，住着说突厥语的游牧民族——钦察人。俄罗斯人将钦察人称作“波罗维茨（Polovtsy）”，意指“浅黄色的人”。这些钦察人被当作奴隶大量贩卖，从黑海北岸热内亚的港口都市输出到地中海沿岸。渐渐地，在原本的地区再也看不到钦察人的身影。然而输出到埃及的钦察奴隶大多成为奴隶军，终究让他们建立了马穆鲁克王朝。

罗斯的公爵们

在钦察人游牧的乌克兰草原北端，有一个罗斯人的城市——基辅。罗斯人是在公元九世纪时从斯堪的纳维亚渡波罗的海而来，在东斯拉夫人和芬兰人的土地上建立国度。罗斯人在伊尔门湖的北岸建立了一个名为大诺夫哥罗德的城市，他们的首位领导者传说是一位名叫留里克的人物。罗斯人另外也建立了多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由留里克的子孙统治，这些诸侯被称为“князь”。“князь”在日文一

般被翻译成“公”，相当于英文的“king”或德文的“könig”（王），指的就是日曼语中的“族长”。

“罗斯”这个词是“俄罗斯”的语源。现在的“俄罗斯人”指的是说东斯拉夫语的人，但原本并非如此。罗斯人是从斯堪的纳维亚移居而来，也就是所谓的诺曼人。到现在，芬兰语仍称瑞典为“Ruotsi”。

从北方的大诺夫哥罗德沿着第聂伯河南下，穿越森林地带来到草原，这里就是基辅。罗斯人以基辅为根据地，掌握连接波罗的海与黑海的水路交通，与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进行贸易往来。由于与东罗马帝国有这样的贸易与外交，罗斯的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于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亚的希腊人城市——克森尼索（近现在的塞瓦斯托波尔），受洗成为基督徒。

由于这个基督教属于大本营在拜占庭的东方教会，因此罗斯人的基督教无论是圣经或礼拜用语，照理应该全部使用希腊文。然而，正好当时在保加利亚出现了西里尔字母，用西里尔字母便可写出斯拉夫语，因此罗斯人信仰的基督教使用的是斯拉夫语。有文字的语言与没有文字的语言之间的竞争，有文字的语言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被罗斯人征服的斯拉夫人，他们所用的语言取代了罗斯人原本使用的语言。

公元1206年，当时罗斯人的政治中心是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莫斯科东方）的城市，由留里克的子孙弗谢沃洛

德大公统治。弗谢沃洛德的兄长安德烈大公将政治中心从基辅搬到弗拉基米尔。当时的莫斯科还只是一个连城市都称不上的小小要塞。

立陶宛人

罗斯人的国度以西，从现在的拉脱维亚、立陶宛至波兰北部，住着波罗的人。波罗的人说的既不是斯拉夫语，也不是日耳曼语，而是自己独特的语言。这种语言据说是印欧语系中最具古代特征的语言。今日的拉脱维亚语和立陶宛语便属于波罗的语系。

这个时期刚好是德意志人开始进入波罗的人的土地开垦。德意志骑士团进入现在波兰的北部，波罗的系原住民普鲁士人终究逃不过被灭绝的命运。利沃尼亚（现在的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也受基督教徒的德意志人统治，公元1201年建立了一座名为里加的城市，为了保卫里加的主教座堂，创立了圣剑骑士团。

被夹在东边的利沃尼亚与西边的普鲁士之间，现在住在立陶宛的波罗的人是欧洲最晚接受基督教的国家，保护祖先传承下来的诸神信仰。直到明道加斯国王统一了住在立陶宛的波罗的人，于公元1251年终于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随着明道加斯国王死去，他的王国也跟着瓦解，立陶宛人舍弃基督教，重新恢复了先祖以来的传统信仰。一直

到公元14世纪，立陶宛人再度统一成为一个大公国，才又改信基督教。立陶宛大公国与南方邻国的波兰王国结合，成为中欧最大的强国。

波兰属于使用西斯拉夫语的国家，在公元九世纪时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公元11世纪时成为一个王国。公元1206年，当时在克拉科夫（华沙的南方，接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有一个出身皮雅斯特家族的国王。然而，国内领土分裂，公爵们各据一方，国王实际的权力十分薄弱。

在波兰王国南方的匈牙利王国是马扎尔人的国家，使用的语言属于亚洲的芬兰与乌拉尔语系。马扎尔人在公元9世纪时从乌拉尔山脉沿着伏尔加河南下，进入北高加索、乌克兰的草原，再往前到达了多瑙河中游地带，闯入了斯拉夫人居住地的正中央。公元10世纪时接受基督教的洗礼，进而成为一个王国。

公元1206年之时，匈牙利的首都为埃斯泰尔戈姆（布达佩斯的西北方），国王是出身阿尔帕德家族的安德鲁二世。这个国王滥用王权且好大喜功，在大约十年之后，他计划自己发起十字军，远征巴勒斯坦。终于在公元1222年，在贵族们（公元九世纪移居之初，马扎尔人征服者的子孙）的逼迫之下，签下了承认贵族们传统特权的“黄金诏书”。

匈牙利王国的东南方是保加利亚第二帝国，这是从亚洲而来的保加尔人所建立的国家，公用语言为突厥语。今日伏尔加河的名称来源与这里曾经是保加尔人的国度有关。

公元 7 世纪，保加尔人与钦察人一起在阿斯巴鲁赫汗的率领下进入巴尔干半岛，征服了使用南斯拉夫语的原住民。公元 9 世纪，鲍里斯汗建立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并接受了基督教。

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所采用的基督教属于东方教会的基督教，教会的公用语非希腊语而是斯拉夫语。当然，这也是为了防止东罗马帝国的干涉。

公元 9 世纪初，在现在的捷克有一个名为摩拉维亚的国家，这是斯拉夫人最早建立的国家。在摩拉维亚有一对说着流利斯拉夫语的希腊人兄弟美多德与西里尔，他们用斯拉夫语开始向斯拉夫人布教。他们还发明了斯拉夫字母（格拉哥里字母），将福音书等翻译成斯拉夫语。斯拉夫语在此首度成为有文字的语言。在美多德死后，他的弟子们被赶出了摩拉维亚。流亡至保加利亚的弟子们重新创造了西里尔字母，继续以斯拉夫语布教。这是东方教会斯拉夫语的由来，公元 10 世纪末罗斯人所接受的基督教也属于这个斯拉夫语的东方教会，这也是将来的俄罗斯正教。

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在公元 11 世纪初被东罗马帝国灭亡，到了公元 12 世纪末，保加利亚人的彼得和阿森兄弟宣布从东罗马帝国独立，以大特尔诺沃（索菲亚的东方）为首都，建立了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公元 1206 年时保加利亚在位的皇帝是第三代的卡洛扬。

东罗马帝国

保加利亚帝国南方的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在不久之前属于东罗马帝国的领土，但在公元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在威尼斯将领的计谋之下，十字军攻陷拜占庭，在此建立了拉丁帝国。当上首位拉丁皇帝的是鲍德温一世。鲍德温在公元1205年败给保加利亚的皇帝卡洛扬，被俘虏至大特尔诺沃身死。继位的是公元1206年正在位的皇帝，也就是鲍德温的弟弟亨利。

东罗马帝国虽然被逐出了拜占庭，但并非就此灭亡。越过海峡向东，在靠安纳托利亚一侧对岸附近的尼西亚（现土耳其共和国的伊兹尼克），有一位拜占庭的贵族提奥多雷·拉斯卡利斯，企图复兴帝国，正好在公元1206时继承皇位。提奥多雷一世的帝国称作尼西亚帝国。到了公元1261年，尼西亚帝国灭了拉丁帝国，夺回了拜占庭。

尼西亚帝国东方、安纳托利亚中央高原上，有一个由说突厥语的伊斯兰教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塞尔柱帝国，以科尼亞为首都。公元1206年，当时的苏丹（王）是凯·霍斯鲁。公元1211年，凯·霍斯鲁被提奥多雷·拉斯卡利斯击败，战死沙场。凯·霍斯鲁的儿子凯·考斯继位成为苏丹（王），公元1214年占领了北方黑海的港口城市——锡诺普。在此战役中，他俘虏了特拉布宗帝国的阿莱希奥斯一世。阿莱希奥斯臣服

于凯·考斯之下，发誓效忠。

特拉布宗是位于锡诺普东方、近亚美尼亚边境的黑海港口城市。现在土耳其语称其为“Trabzon”（英语称作“Trebizond”）。第四次十字军占领拜占庭、赶走东罗马帝国时，当时是拜占庭贵族的阿莱希奥斯逃往特拉布宗，在这里坐上了皇位。特拉布宗帝国虽小但持续了二个半世纪的时间，直到公元 1461 年才被奥斯曼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灭亡。

阿尤布家族

塞尔柱帝国的南方是阿尤布家族的领土，范围从今日的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王权属于伊斯兰教徒的库尔德人，开国始祖是萨拉丁。他最有名的是在公元 1187 年打败十字军，收回耶路撒冷。当时距离十字军第一次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已经八十八年了。之后，萨拉丁与英国国王理查（狮心王）讲和，于公元 1193 年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与世长辞。十字军的王国只剩下巴勒斯坦的海岸线。因此，在公元 1206 年之时，伊斯兰世界西半部最强大的势力就是阿尤布家族的苏丹（王）。

阿拔斯家族的哈里发（伊斯兰政治、宗教领袖）在伊拉克的巴格达苟延残喘。过去统治从西亚至北非全境的大阿拉伯帝国，伟大的阿拔斯家族意气风发的样子再也不复

存在。当时的哈里发夹在东边的花剌子模帝国与西边的阿尤布家族之间，除了巴格达市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势力。

简单介绍了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时欧亚大陆的情势。接下来再看看当时西欧的情形，顺道一提，西欧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世界只是个乡下地方。

西欧

公元13世纪初的西欧情势简单来说，当时没有名为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或西班牙的国家。今日我们所熟悉的这些国家，都是在之后才成立的。

从西西里岛至意大利半岛南端属于诺曼人的西西里王国。西西里王国北部的意大利半岛中部、北部（威尼斯除外），一直到今日的瑞士、奥地利、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东部的广大地方，都是由德意志人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神圣罗马皇帝统治。当时的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为了与霍亨斯陶芬家族抗衡，与德意志人的韦尔夫家族联手，迟迟不肯承认皇帝菲利普·冯·士瓦本的帝位。从此，皇帝党（Ghibellini）与教皇党（Guelfi）形成对立，长期影响了德意志人与意大利人的政治。

神圣罗马帝国的西方邻国为法兰克人的王国，领土十分狭小，只有现在法国的东半部，且南仅到卢瓦尔河为止。现在法国的西半部，北从诺曼底，南至比利牛斯山与地中

海为止的广大领土都属于出身普兰塔奈特家族的英格兰国王（金雀花王朝）。当时的法兰克国王是卡佩家族的腓力二世，他在公元 1202 年时向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约翰（理查狮心王的弟弟）宣布，没收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地方的领土，引起了双方的战争。战争的结果由腓力二世获胜，赢得了加斯科涅以外所有在欧洲大陆地方原本属于英格兰王国的土地，首度统一了几乎与今日的法国相当的国土。代表这块土地的国名“法兰西”（来自拉丁文的“*Francia*”，意指法兰克人之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用。

另一方面，英格兰国王约翰被教皇英诺森三世赶出教会，无反抗之力的他终于在公元 1215 年，在贵族的逼迫之下签署《大宪章》（*Magna Carta*），于隔年死去。

这时在不列颠群岛，不久之前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理查国王与约翰国王的父亲）发动了侵略战争，当时英格兰和苏格兰是两个不同的王国，且威尔士也尚未被英格兰合并。在爱尔兰，面对爱尔兰人的顽强抵抗，英格兰人仅能勉强站上海岸。也就是说，今日我们所知道的英国（大不列颠与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当时尚不存在。

最后，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有卡斯提尔、阿拉贡、纳瓦拉、葡萄牙四个基督教国家。南部则是伊斯兰教柏柏人，穆瓦希德家族的领土。首都位于靠近非洲摩洛哥的马拉喀什。

统治世界的天命

公元1206年春天，在蒙古高原的一角，游牧民族聚集在一起，选出了成吉思汗作为自己的最高领导者。东从太平洋，西至大西洋，欧亚大陆的各个国家几乎都不知道这件事，就算知道，恐怕也不是那么关心。然而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事件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事件。也就是说，这个事件是世界史的开始。

事实上，成吉思汗在即位的时候，借由他的堂兄弟，也就是大萨满阔阔出之口，下达了神的旨意。

这是永远的天命。在天上，唯一永远的是天神；在地上，唯一的君主是成吉思汗。这是我传达给汝等的话语。只要马可及、舟可达、使者可至、书信可传的地方，都要将我的命令传达给地上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听到我的命令却不遵从者，就算有眼也将看不见，就算有手也将举不起来，就算有脚也将无法行走。这就是永远的天命。

这道神诏指名成吉思汗为全人类的唯一君主，不肯归顺成吉思汗的人就等于不服从天命，无论是谁都将遭到毁灭的惩罚。收到天命，成吉思汗与他的子孙率领蒙古大军，

为了达成上天所交付的神圣使命，准备发起征服世界的战争。这是世界的开端，在说明前因后果之前，必须先就到底什么是历史这个根本的问题做出说明。

历史是文化

什么是历史？

一般说到“历史”，大家普遍都会认为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历史并不单纯只是过去的记录。

所谓历史，是沿着时间与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叙述人类居住的世界。

首先最重要的是，历史与人类居住的世界息息相关。没有人类的地方不可能有历史。“人类出现之前的地球史”“银河系形成之前的宇宙史”等，是将地球或宇宙比拟成人类，将如果是人类可以当作历史的东西，以比喻的方式称作“历史”，这样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历史。

另一个重点在于，历史与时间和空间息息相关。也就是说，广大世界的这里、那里，或是之前、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而将这些事情整理并排序的便是历史，这一点无论是谁都无法反驳。

然而，历史所言的无论是时间或空间，都远远超越了

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这又是另一项重点。如果仅限于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内，这样的叙述顶多只能称得上是日记或经验谈，不应该称为历史。自传也可视为是一种历史，因为自传是撷取写自传的人所居住的广大世界的一部分。

历史所言的世界远远超过一个人可以到达的范围。一个人自己不可能亲身经历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所有事情，更不用说在自己出生前所发生的事。为了知道这些发生的事，必须借助自己以外的他人经验。聆听他人的言语、阅读他人的著作等，是把握、解释、理解世界的第一步。

空间远远比时间容易掌握。超过双手可及范围的空间，只要用走的就可以测量，再远的地方，只要花上几天的时间便可往返。也就是说，空间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测量。

然而，时间却并非如此。时间不是可以任意往返的东西。而且时间也不是用感觉就可以掌握的东西。看到某一个正在移动的物体，用移动的距离换算时间，我们总算才能感觉到“时间的长短”。换句话说，我们人类除了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的长短计算之外，没有其他测量时间的方法。

那么，到底要如何测量时间的长短呢？找一个进行规律周期运动的物体，以那个周期为单位，将时间用同样的“长度”作划分。长夜过后太阳升起，进入白天。等到太阳西斜进入黄昏，西沉后进入夜晚。地球绕着自转轴转动的

周期为“一日”。暗夜里升起一弯新月，慢慢填满成半月、满月，之后缺成半月，慢慢又再度看不见月亮的身影。月亮绕着地球公转的周期为“一月”。冬天之后是春天，春天之后是夏天，夏天之后是秋天，秋天之后又回到冬天。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周期为“一年”。只要利用自然规律回归原始状态的周期，以周期的长度划分时间，也就可以测量时间了。

然而，使用年、月、日等时间单位会有两大问题。其一，“一日”这个单位虽然很简单，使用起来也很方便，但这个“一日”指的是一月中的哪一日？相同地，“一月”这个单位指的又是一年中的哪一月？如果需要将发生的事情排列先后顺序，那么必须将各月各日取名字，或是加以编号以作区别。取名“寒月”“热月”，或是“下雨日”“刮风日”等也许也是不错的办法，不过如此一来名字很容易重复，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月的“下雨日”？或是哪一年的“寒月”？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一生远远超过一年。一个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年头，如此一来，到底要怎么区分这些年头呢？以比一年还要长的周期作划分，将年整合起来也许也是一个办法，但要找到比一年长的规律周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木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大约是十二年，也是有像这样比较长的周期。然而，“一日”“一月”“一年”是在地球上可以清楚看到环境变化的周期，无论是谁都可以直

接感受到。但是木星的公转周期在地球上看不到任何环境的变化。因此，除非是拥有黄道十二宫星座知识的占星师，对于一般人而言，十二年的周期无法简单辨识，使用起来不方便，不具实用性。而且，十二年的时间，比起一个人的一生还是短很多。如此一来，同样会产生重复相同的周期、无法加以区别的问题。

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将以年、月、日划分的时间编号，用数字保存过去的时间并管理未来的时间。这就是历法的起源。

然而，在制作历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到底要用哪一年当作第一年算起呢？这也就是纪元的问题。根据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的说法，时间与空间是在大约二百亿年前突然出现的东西，我们的宇宙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地膨胀。终于宇宙停止膨胀，转而收缩。等到哪一天宇宙的收缩达到极限，时间又会和空间一起再度消失。

因此，时间是有限的东西，有始也有终。但如果从宇宙出现的时候开始计算，那么数字过于庞大，并不实用。如果宇宙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那么又另当别论。犹太教与基督教以《旧约圣经》为基础，计算出了多种开创天地年代的纪元。其一是在公元前5509年，以雅威（耶和华）开创天地为纪元。俄罗斯直到公元1700年1月1日，彼得一世的时代使用的都是这个纪元。

把这个暂且放一边，一般的做法是决定一年当作纪元

元年，依序编号。以拿撒勒的耶稣诞生之年当作元年的基督教纪元便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纪元元年是哪一年都可以，只要决定从某一年开始计算即可。接下来只要依序编号，便可区分年、月、日。

就像这样，与使用自己的身体就可以测量的空间不同，需要相当高度的技术才能将时间空间化，用眼睛就能够测量。因此，根据技术发达的程度不同，对于时间的感觉也有很大的差异。有人将去年发生的事、三年前发生的事、十年前发生的事、百年前发生的事全部归类成“以前”的事，不加以区别。也有人明显区别今天中午发生的事与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就像这样，对于时间的“细微度”与“深度”的感觉，根据人类集团或文化的不同，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时间本身属于物理，但人类对时间的态度则属于文化。而与时间和空间两者息息相关的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同样属于文化的领域。历史是文化，根据人类集团的不同有不同的文化，因此每一个集团都有属于各自定义“这是历史”的东西，与其他集团主张“这是历史”的东西大不相同。也就是说，世界的人类不可能这么简单地拥有共通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史是不可能存在的。

与对于时间的感觉相同，与历史密不可分的是文化要素，也就是记录。写下在自己眼中的世界，希望在当时的状态不复存在的未来时间里，这些记录可以唤起一些记忆。

这属于高度文化，孕育自然，与自然同化一同生活的人类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就想出要留下记录这件事。另外，为了留下记录，必须要有不输给测量时间的高度技术。创造文字、学习文字、活用文字，这些当然也是文化的一种，但在没有文字的地方，在木头上刻纹、在绳子上打结、记忆数字等也都是记录的文化。西非布基纳法索的摩西族虽然没有文字，但有一种职业的人世世代代将王家的由来口说传承。在宫廷仪式的场合上，不改变一字一句，清楚朗诵历代国王的事迹，这也是想要留下记录的表示，属于文化的一种。不过，只靠口耳相传，历史是无法成立的。有了历法与文字，才有可能有历史这项文化。

没有历史的文明——印度文明

历史是文化，然而并非世界中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历史这项文化。在世界众多文明之中，可分为拥有历史这项文化要素的文明，与没有历史这项文化要素的文明。实际上，没有历史的文明远超过拥有历史的文明。

世界虽广，但拥有自己历史文化的文明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

没有历史的文明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印度文明。在印亚大陆，从很古老的时代开始都市文明就非常繁荣，同时拥有完善的历法与文字。虽然如此，但印度文明有很

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历史这项文化。

从公元前 3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为止，在北印度平原上，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重要城市，当时已经有了尚未被解读的文字，甚至还有刻印的印章。由于完全没有传承让后代知道这个文明到底是谁创造的，因此印度河流域文明的时代必须归类为历史以前的时代。

到了公元前 2000 年，雅利安人从北方入侵，在北印度平原各处建立了新的城市。这些城市里都有一个“拉者（酋长、王者）”，士兵们听从他的指令，商人在城市里做生意。他们拥有文字，并留下了“吠陀”等宗教文献。虽然如此，在北印度的众多城市国家中，并没有留下可以称得上是历史的著作。到了公元前 6 世纪，摩揭陀王国的频毗娑罗王在恒河中游建立霸权，一直到公元前 4 世纪都维持强大的势力。然而，在那个时代，印度刚好兴起了佛教与耆那教，而关于各个国王的事迹仅少数记载于宗教经文当中，并没有整个王国完整的历史。

与摩揭陀王国同时代，西北印度的旁遮普地区属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的行省（Satrapeia）。到了公元前 327 年，马其顿王国的国王亚历山大率军入侵。亚历山大一世虽然很快就撤军，但这个侵略行动打开了北印度平原与地中海直接的交通。受到这个刺激，不久之后孔雀王朝便统一了北印度。从这时候起才真正出现了被称为印度的国家，印度文明可说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孔雀王朝首任的旃陀罗笈多国王与第二任的宾头娑罗国王，两人的名字出现在同时代的希腊人的记录中，因此可以确定两人是这个时代的人。至于第三任的阿育王，他在帝国各地建起石柱，并在上面刻文，记录了该地与自己相关的事迹。这虽然是一种记录，但上面并没有标明时间，因此称不上是历史。另外有一本名为《Arthaśāstra》（实利论）的书籍，内容关于帝国的政治与经济。据说这是由担任旃陀罗笈多国王最高顾问的考提拉所写，但这也不是历史的书籍。

公元前2世纪，孔雀王朝瓦解之后，北印度地方小国林立，更不是适合撰史的环境。大致而言，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千年，直到公元997年起阿富汗的伊斯兰教徒开始入侵北印度，在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即位的同一时间，伊斯兰教徒的突厥人在德里建立了奴隶王朝为止。从奴隶王朝开始，印亚大陆首度开始记录年代。换句话说，有历史的伊斯兰文明将历史带进了印度，印度文明本身终究没有历史。

印度文明有城市、有王权、也有文字，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历史也不足为奇。然而，为什么历史一直无法出现在印度文明之中呢？解开这个谜题的关键在于印度人的宗教。

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的印度宗教，无论是佛教、耆那教或是印度教，都有轮回（Samsāra）思想。六道的众生（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的六种生物）在寿命终了之后，都会依据生前所积的业（karma），以上等或下

等生物的形体重新获得生命，再一次经历从最初到最后的一生。这个过程将永远不断地重复。历史的对象原本是人世间所发生的事，但若依照这样的想法，仅在人世间无法了解原因与结果，与在神、鬼、幽灵、其他的动物以及死者等人类无法了解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也有关联。这么一来历史根本没有办法整合。此外，在这样的想法之下，时间整体不再有连贯性，无论撷取哪一个部分都是独立且拥有各自不断循环的小圈圈。也就是说，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没有前也没有后。如此情况之下，历史根本不可能成立。

另一个印度文明没有历史的原因是阶级制度的存在。在阶级制度下的社会，与自己不同阶级的人，感觉不同属于人类，反倒像是异种生物。而且，阶级划分之细微，几乎有无数种阶级。因此，像历史这种超越阶级之分，将所有人类视为一大集团处理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于这样的社会之中。不承认阶级制度的伊斯兰教徒进入印度，让印度有了历史，这便是最好的证据。

没有历史的文明——玛雅文明

没有历史的文明不仅印度文明一个。美洲大陆的两大文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以及南美的秘鲁古文明，都是没有历史的文明。

印加帝国所孕育出的秘鲁古文明虽然有伟大的城市与强大的王权，但既没有文字也没有历法，当然也就没有历史。相反地，玛雅文明的城市从公元3世纪开始便有由大约八百字所形成的文字体系，也有精密的历法。以公元前3114年8月11日为起点，以十四万四千日（三百九十四年余）为周期，正确地标记出数千年的日期。另外，玛雅人还组合十三日与二十日的周期，创造出了二百六十日的历法。再利用十八个二十日的周期加上多出来的五日，创造出了三百六十五日的历法。组合两者所得到的一万八千九百八十日（少于五十二年）则是另一个周期。有趣的是，无论是哪一个周期都与月球公转的周期（一月）和地球公转的周期（一年）无关。

从公元292年到909年，碑文上都刻着用这样精密的历法所推算出的日期。这些碑文刻着各个玛雅国王治世期间所发生的大事。很明显地，当时的玛雅人已经有将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的意识。在停止刻碑文之后，从公元13世纪开始，玛雅人用无花果树造纸，以图记事。然而，这些图的内容多半与宗教仪式有关，既不是记录，也不是历史。玛雅本身尚未出现整合记录创造历史的文化。

之后，西班牙人渡大西洋而来，在公元1502年首度与玛雅人接触。再之后，虽然也出现了许多玛雅人用数字标记的编年史，但当中的记述混杂着现实的事件与预言，很难辨别。危地马拉出土的《波波尔·乌》，其内容也是在人

类世界开始前的神话。会出现这样的著作也许是因为在接触到有历史文明的西班牙人之后，在没有历史文明的玛雅人心中，萌起了“历史意识”。

对抗文明的历史文化

历史是独立发生在地中海世界与中国世界的文化。有历史的文明原本只有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其他有历史的文明，不是从有历史的文明中独立出来的文明，就是与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没有历史的文明借用有历史的文明中的历史文化。

例如日本文明。公元 668 年（天智天皇即位）建国之初便有完整的历史。但这是从有历史的中国文明独立出来的结果。

有观点认为：西藏文明虽然是从没有历史的印度文明中独立出来的文明，但却留下《编年纪》。记录从松赞干布国王建国的公元 635 年起每年所发生的大事，这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这是由于当时的吐蕃政权与唐王朝的文明对抗，而唐朝属于有历史的中国文明。

伊斯兰文明从一开始就具备历史的文化要素，但这一点本身就很不可思议。如果说安拉是唯一全能的真神，宇宙间的所有事情都仰仗安拉无比的意志所决定，那么每一件事都是单独的偶然，想要用理论的方式找出事件与事件

之间的关系，那就等于是企图对安拉不敬。如此一来，历史的叙述本身就不可能成立。

话虽如此，伊斯兰文明在公元6世纪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开始传教之后，就已经有了历史。理由之一是信者生活上的需要。《古兰经》是将穆罕默德得到的天启，以安拉的话语记录下来的书籍。但并非所有信徒所希望的指引都记载在《古兰经》当中。穆罕默德在世期间，信徒向他请教关于《古兰经》中所记载的事情，请他作判断。大家口耳相传穆罕默德所作的各项回答，其量之庞大，最后集结成名为“圣训”的大批文献。每一段文献都会注明这是由某某品行端正的信徒向穆罕默德请教，这个信徒转述给某某信徒，那个信徒又转述给某某信徒。就像这样，文献中一定会记载传播的路径与传播人的名字，用来保证这是可以信赖的传承。这些名字出现在“圣训”中的信徒们，最终有了关于他们的传记书籍。这也是伊斯兰文明很早就有历史的另一个原因。

然而最大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文明与有历史的地中海文明对抗，与罗马帝国为邻。犹太教是地中海文明的宗教之一，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公元6世纪，犹太教传播到了阿拉伯半岛。

犹太教圣典《旧约圣经》当中有许多具有编年史特质的部分，借由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的契约关系说明以色列人的命运，表现出另类的历史观。这个历史文化的成立是

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发生在今日以色列南方的犹大王国。那个世代正值亚述帝国末期，而犹大王国不久之后也将被新兴的新巴比伦帝国灭亡。从那时候也开启了以色列人沦为“巴比伦囚虏”的苦难。

罗马帝国的地中海文明存在着两种历史文化。其一是公元前5世纪，从希罗多德开始的希腊系历史文化。另一个则是透过基督教进入到罗马帝国的犹太系历史文化。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的支派之一，因此基督教中也继承了犹太教的历史观，而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时，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是发生在穆罕默德出生前一个半世纪的事情。

有历史的文明与没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时，有历史的文明通常都占有优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如果起了纷争，有历史的文明可以引经据典地主张“这个问题起源于某处，根据问题的来龙去脉分析，自己才是对的”。而对于没有历史的文明而言，无法找出有效的方法反驳对方的主张。

另一个理由则是，有历史的文明除了活在现在之外也活在过去。因此更可以仔细思考事情的条理。只要事情有条理，吸取过去的经验可以让当下更为清楚，甚至可以预测未来。就算心中的脚本实际上是错误的，但对于未来，还是可以做出某种程度的准备。

然而，对于没有历史的文明而言，除了活在现在之外别无他法。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不明确，就算想预测未来也没有办法。对于一连串无预警发生的事

情，都只能在发生之后才来对应。事前无法决定任何方针，什么事都总是晚了一步。

除非拥有强大的军力，无论什么情况都可以用武力压制对方，否则没有历史的文明总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原本没有历史的伊斯兰文明，也为了对抗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而必须采用历史文明。

历史是一项强大的武器。正因为历史是强大的武器，没有历史的文明在与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时，必须想办法创造出自己的历史，获得历史这项强大的武器。正因为这个理由，历史这项文化从发祥地的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不断地被其他原本没有历史的文明复制，一个文明“传染”给另一个文明。

虽然如此，原本没有历史的文明就算采用了历史文化，但其历史的力量仍然薄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当时的世界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对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再加上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对抗。在这当中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对立，现代世界真正的对立应该是有历史的文明对抗没有历史的文明。

日本与西欧属于有历史的文明。然而，美利坚合众国从18世纪初起便舍去历史，以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建国基础。现在已经解体的苏联，大家都知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建国基础。苏联前身的俄罗斯帝国原本属于蒙古文明的一部分。然而，俄罗斯帝国却否认这段历史，

移花接木似地接上了地中海文明的历史，结果发展并不顺利。在俄罗斯革命时舍去了历史，转换意识形态之后所建立的国家便是苏联。

现代世界对立的真正构图是没有历史的美利坚合众国，以强大军力对抗以历史武装的日本与西欧。

正因如此，属于有历史文明的日本应该把握现在的世界，为了能够预测未来世界，更应该彻底理解历史这项文化的本质。

然而，这里最大的问题在于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其性质完全不相同，就像水与油一般无法混合。因此，就算将地中海型的历史（西洋史）与中国型的历史（东洋史）放在一起，也不可能得出单一的世界史。接下来将会说明为什么会这样。

第2章 对立的历史 ——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地中海文明的“历史之父”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希罗多德。希罗多德出生于安纳托利亚的海岸城市哈利卡那索斯（现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博德鲁姆）。他的著书《历史》，内容主要在讲述有关波斯战争的故事。

“历史”的希腊文（罗马拼音写成“historia”，为单数形。“historiae”为复数形）是英文“history”与法文“histoire”的语源，原本并不是“历史”的意思。希腊文的“histor”是含有“知道”之意的形容词，“historein”则是含有“调查后知道”之意的动词。从中衍生出的名词是“historia”，真正的意思为“研究”。希罗多德将经过自己调查后所得知的事项写下，因此才会将著书取名为《研究》，但由于这是地中海世界最初的历史书籍，因此才又赋予“historia”一词“历史”的意思。从这里也可看出，在希罗

多德之前的时代，历史的观念尚不存在。

希罗多德书中的波斯战争是从很古老以前的时代开始写起。书中记述如下：

根据波斯学者的说法，腓尼基人是一切争端的起因。根据他们的说法，腓尼基人从红海（波斯湾）迁移到了这边的海（地中海）。腓尼基人定居在现在居住的地方之后，马上展开了远洋贸易，将埃及、亚述的货物运到各地，其中也包括阿耳戈斯。在今日被称为 Hellas（希腊）的地区中，当时的阿耳戈斯无论在各方面都是最强大的国家。腓尼基人来到了阿耳戈斯，开始贩卖他们所带来的商品。就在第五、六日，当商品卖得差不多的时候，有一大批女子来到海岸边，国王的女儿也混在其中。与希腊的传说相同，这位公主正是伊纳科斯国王的女儿爱欧。女子们站在船尾，挑选各自想要的商品。这时，腓尼基人相互使了个眼色，偷袭了这群女子。大部分的人虽然都顺利逃脱，但爱欧和其他几位女子却被抓住。腓尼基人乘船将这些女子带回了埃及。

这个最初的事件正是之后一切纷争的开端。在这个事件之后，有几个不知名的希腊人袭击了腓尼基的泰尔城，掳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这

些希腊人被认为是克里特人。双方一来一往原本应该是扯平了，但之后希腊人又犯下了第二件恶事。

希腊人乘坐军船来到了科尔基斯地方的埃亚，在法希斯河（格鲁吉亚的里奥尼河）完成了渡航的目的之后，掳走了国王的女儿美狄亚公主。科尔基斯国王派使者前往希腊要求希腊人赔偿并交还公主。然而，希腊人的回答却是“之前你们掳走阿耳戈斯公主时没有做出赔偿，所以我们也不会赔偿”。

波斯人相传，进入到下一个代之后，普里阿摩斯之子亚历山大（帕里斯）知道了上述的来龙去脉，他一定是认为既然希腊人没有做出赔偿，那么自己也不需要赔偿，于是从希腊掳回了适合自己妻子的女子。帕里斯掳回了海伦之后，希腊派遣使者要求归还海伦，但帕里斯却以希腊掳走美狄亚公主的事件为挡箭牌，怒斥希腊之前既不赔偿也不归还公主，竟然还敢来要求赔偿。在这件事之前双方最多就是互相掳人，但之后希腊人却犯下了滔天大罪。在波斯人（亚洲人）向欧洲进攻之前，希腊人率先向亚洲进军。

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亚洲地区没有扩大公主被掳的问题，但希腊人却为了斯巴达的女人召集

大军向亚洲进军，灭了普里阿摩斯的国家（特洛伊）。从此之后，希腊人就成了自己（波斯）的敌人。波斯人将亚洲与住在亚洲的非希腊诸民族视作自己的一部分，与欧洲和希腊是不同的个体。

希罗多德将以上波斯战争的由来说成是“波斯学者的说法”。当然，这其实是希罗多德自己的想法，也就是他的“研究”成果。然而，他认为如果说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读者恐怕不相信，因此才特地说是“波斯学者的说法”。

无论如何，希罗多德将自己所知的世界分成亚洲与欧洲，并从希腊神话当中挑选出了四个被认为发生于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事件，论说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怨恨不断地在亚洲与欧洲地方累积，最终成了引发波斯战争的主因。

被扭曲的神话

事实上，希罗多德所引用的希腊神话被他大幅扭曲。

最初诱拐爱欧的故事，在普通的希腊神话里是这样的。在《历史》书中被写成是国王的伊纳科斯原本应该是希腊阿耳戈斯地方的河神，他的女儿爱欧原本是女神赫拉的巫女。赫拉的丈夫天神宙斯爱上了美丽的爱欧，把爱欧变成了一头小牛。嫉妒心重的赫拉派“百眼巨人”阿耳戈斯监视爱欧，宙斯却命荷米斯神杀了阿耳戈斯。震怒的赫拉又

派出牛蝇日夜骚扰爱欧。为了躲避牛蝇的骚扰，爱欧走遍各地，最后到了埃及，在这里才终于又变回人形，并产下一名男婴，取名为艾帕佛斯。爱欧成为了埃及女神伊西斯，而艾帕佛斯则成了牛神阿庇斯。艾帕佛斯被赫拉掳走，来到了朱拜勒（黎巴嫩海岸的迦巴勒）。爱欧紧追在后，在朱拜勒与艾帕佛斯重逢，成为了腓尼基的女神阿斯塔蒂。

这个神话与希腊的阿耳戈斯与埃及、腓尼基三个地方有关，的确反映了古代地中海贸易，但登场的人物全部都是神。把这个神话转换成发生在人类世界的事件，并将始作俑者归咎于腓尼基人，这便是希罗多德为了将神话转变为史实所动的手脚。

第二个事件原本也完全是神话。与前一个神话相同，偷袭腓尼基的泰尔城、掳走了欧罗巴公主的克里特岛上的希腊人其实就是宙斯。神话当中欧罗巴是腓尼克斯（含有“腓尼基人”之意）的女儿（后来传说是腓尼基国王阿革诺耳的女儿）。宙斯爱上了美丽的欧罗巴，化身成一头白色的牛接近欧罗巴，让她骑在自己的背上，带着她过海来到了克里特岛。欧罗巴在克里特岛生下了克里特未来的国王米诺斯等人。米诺斯死后成了冥界的国王。

宙斯在希腊人进入希腊之前就被认为是天神，然而克里特岛的宙斯却不同。克里特岛的宙斯指的是他们在希腊人进入前就拥有的信仰，也就是爱琴文明的神。而“欧罗巴”原本也不是人的名字。“欧罗巴”在希腊文中含有“眼

宽的女神”之意，与赫拉的称呼（牛眼女神）相同。欧罗巴是住在克里特岛的人所信奉的女神。腓尼基人的确曾在克里特岛上进行海上贸易，而希罗多德同样把原本是神话的故事刻意改成发生在人类世界的事件，说明这是发生在腓尼基人与住在克里特岛上希腊人之间的事件。

第三个故事中的美狄亚公主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女主角。她是希腊色萨利地区所信奉的女神，专门掌管魔法。她出现在“阿尔戈英雄航海记”（搭乘阿尔戈号的船员们）寻找金羊毛的冒险神话中。

色萨利的伊奥科斯王子伊阿宋，他父亲所留给他的王位被叔父所夺，在叔父的命令之下，伊阿宋前往黑海另一端，从科尔基斯地方的埃亚取回金羊毛。金羊毛拥有飞天的魔法，挂在埃亚军神阿瑞斯的圣林里，由火龙日夜看守。为了这趟冒险，希腊打造了第一艘军船阿尔戈号，并召集了五十名勇士。在历经重重困难，经过多个国家之后，船终于到达了科尔基斯。科尔基斯国王答应送上金羊毛，但条件是伊阿宋必须将牛轭套在鼻孔喷火、长着青铜蹄的牛上犁田，并种下巨龙的指甲。爱上伊阿宋的美狄亚公主帮助他完成了这些艰难的任务，并打败了种下巨龙的指甲后所冒出来的士兵。趁着美狄亚公主用魔法让巨龙沉睡的时候，伊阿宋拿走了金羊毛，与美狄亚公主一起逃上了阿尔戈号。美狄亚公主将幼弟斩成碎片抛向海里，顺利摆脱了科尔基斯国王派来的追兵。回到伊奥科斯之后，伊阿宋背

叛了美狄亚，娶了新的妻子，美狄亚一气之下杀了自己所生的孩子们与伊阿宋新的妻子，回到了科尔基斯。

这个传说反映出了希腊人的黑海贸易，但腓尼基人并未登场。

至于希罗多德所引用的第四段故事，当然就是荷马著名的史诗《伊利亚特》中所写的特洛伊战争。

色萨利国王佩琉斯与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邀请了许多神来参加，但唯独“不和女神”埃里斯没有被邀请。埃里斯怀恨在心，在婚礼上抛出了一颗金苹果，上面刻着“最美丽的东西”。赫拉、雅典娜以及阿芙罗狄忒三个女神都认为自己才是最配得上这颗金苹果的人，彼此争论不休。天神宙斯将这个难题交给了帕里斯，即亚历山大（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是达达尼尔海峡安纳托利亚沿岸特洛伊城（又名 Iliupersis）的王子，当时他正在艾达山放羊。为了得到最美丽女神的称号，赫拉答应给帕里斯王权，而雅典娜则答应授予帕里斯勇气。然而，帕里斯选择了答应让他得到世界上最美丽女人的阿芙罗狄忒，把金苹果给了阿芙罗狄忒。此举点燃了赫拉与雅典娜的怒火。帕里斯在阿芙罗狄忒的帮助下与亚该亚（希腊的古称）的斯巴达王国王妃海伦陷入热恋，两人一同逃往了特洛伊城。由于特洛伊人拒绝归还海伦，于是斯巴达王国的墨涅拉俄斯国王向亚该亚境内各个城市要求援军，组成了讨伐特洛伊的大舰队。亚该亚大军在墨涅拉俄斯的兄长，也就是迈锡尼王国的阿

伽门依国王的指挥之下进攻特洛伊城，众神分别加入双方的战营。亚该亚大军包围了特洛伊城长达十年，但始终没能攻下。亚该亚大军佯装退军，留下了一只巨大的木马。当特洛伊人打开城门将木马拖进城时，藏在木马内的亚该亚大军一跃而出，终于攻破了特洛伊城，杀光了所有特洛伊人。

这个特洛伊战争的传说反映出了被称为亚该亚人的民族，从公元前 13 世纪至公元前 12 世纪活跃在东地中海一带的时代情势。这件事情本身也许是事实，然而希罗多德前面所写的三个故事与特洛伊战争故事的性质不相同。最初的两个完全是神话，而第三个故事则是以魔法为主题的童话故事。

而且四个故事发生的地点都不相同。第一个故事发生在阿耳戈斯与腓尼基，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克里特岛与腓尼基，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伊奥科斯与阿耳戈斯，第四个故事则发生在斯巴达与特洛伊。因为腓尼基人掳走了阿耳戈斯的公主，所以伊奥科斯人不愿意归还科尔基斯的公主，这本身就不合逻辑。

就算可以把希腊整合成一块，但对手的腓尼基（黎巴嫩）、科尔基斯（高加索）以及特洛伊（安纳托利亚）的整合要到公元前 6 世纪，等到阿契美尼德王朝波斯帝国支配整个地区之后，而这些神话和传说早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流传。

希罗多德其实也知道自己的说明有些勉强。他将“亚洲与住在亚洲的非希腊诸民族”归成一类，并强调“亚洲与欧洲和希腊是不同的个体”是“波斯人的说法”，这是为了掩饰这其实都是自己的“看法”这件事。

对立的历史观

希罗多德所写的《历史》借波斯学者之名提出的看法将世界划分成欧洲与亚洲，主张欧洲与亚洲从很久以前开始就不断地对立与抗争。这样的看法成了地中海世界首部历史书的基础论调，“欧洲与亚洲的敌对关系”，这样的历史观成了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这样敌对的历史观贯穿西欧的古代、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现代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论调。由于这样的论调过于普遍，反而让西欧人、日本人或是其他国家的国民不自觉将世界笼罩在这样的历史观之下。然而，希罗多德的历史观与所创造出的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至今为止在世界上引发了许多不幸的事件，从今以后恐怕也将会是其他许多悲剧的主因。

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是希腊人用希腊文写的第一本历史，当中却没有记载任何希腊人的历史。书中写的全部都是波斯帝国的历史。一开始写的是吕底亚王国（安纳托利亚，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46年）的故事，之

后是米底亚王国（伊朗北部，公元前 8 世纪至公元前 550 年）的故事。这两个王国被接下来的波斯王朝首代君主居鲁士整合，这个部分是叙述波斯帝国兴起（公元前 550 年）的前言。

之后叙述的是居鲁士国王征战的故事，他征服了安纳托利亚海岸的希腊人城市和巴比伦，在远征马萨革泰人的时候战死（公元前 529 年）。第二代的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公元前 525 年）。在这里，希罗多德详细描述了各地方的情势。接下来说明波斯军远征利比亚（非洲）与各地情势之后，希罗多德终于进入了《历史》的正题。

波斯军攻陷了希腊北方的色雷斯和马其顿，一步一步向希腊逼近。于是，希腊人的城市联合起来准备对抗波斯军。这时波斯帝国第四代的薛西斯国王召集了帝国内的所有民族，亲自率领一百七十万大军，于公元前 480 年出发远征希腊。在赫勒斯滂（达达尼尔）海峡分别用三百六十和三百四十只船搭起了两座船桥，波斯大军就这样进入了欧洲。

希罗多德是这么叙述的：

大军一抵达阿拜多斯（靠近安纳托利亚一侧），薛西斯便兴起了阅兵的念头。接受到王命的阿拜多斯人在小山丘上搭建起了一座用白色大理石所做的眺望台，国王坐在这里眺望海滨，陆上

部队和舰队全部一览无遗。国王在阅兵的时候突然决定让舰队划船竞赛。竞赛的结果由腓尼基的赛顿人获胜，国王心满意足地眺望竞赛和威风凛凛的军威。

薛西斯看到赫勒斯滂的海面上被舰船覆盖，海岸与阿拜多斯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自己的军队，感恩自己受到上天的祝福，不禁潸然泪下。

旁边的人问国王为什么流泪，国王如此回答。

“这里有这么多的人，但一想到没有一个人可以长命百岁，感觉人是多么渺小，让我不禁悲从中来。”

薛西斯进入欧洲之后，看着大军渡海的样子。远征军不眠不休地花了七天七夜渡海。薛西斯越过阿拜多斯后，一个住在阿拜多斯的人这么说道，“宙斯啊，如果你想要灭掉希腊，为什么要借波斯人之手、薛西斯之名，且带上了世界上其他所有人？不用这么大费周折，你还是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波斯大军进到希腊境内，在温泉关战役中击败了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率领的希腊联军，占领雅典。正当希腊人被逼入绝境之时，在萨拉米湾海战中希腊人击败了波斯舰队，逼迫薛西斯紧急退兵。希罗多德的《历史》（研究）

就在希腊人对抗波斯帝国赢得胜利的章节中画上句点。

从《历史》一书的大纲中也可以清楚看出，希罗多德的“研究”对象并非希腊人的世界，而是横跨亚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他想要描述的是面对几乎支配全世界的强大波斯帝国，甚至尚未完成国家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在绝望中找到一线曙光，最后奇迹似地获得胜利。

由于希罗多德的著述是地中海文明所孕育出最初的历史，很不幸地确立了“亚洲与欧洲的对立是历史的主题。而对于亚洲，欧洲的胜利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种看法一直到今时今日，都持续影响地中海世界和西欧人对于亚洲的态度。

《旧约圣经》的历史观

除了希罗多德之外，还有一部对地中海世界人们的史观留下深刻影响的著述，那就是《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大家都知道是犹太教的文献。公元1世纪，基督教脱离犹太教，而基督教在公元391年被罗马帝国的法律定为国教，《旧约圣经》就这样成为了地中海文明中极度重要的文献。

犹太教的《旧约圣经》可分为律法书（Torah）和先知书（Nevim）等两个部分。律法书又被称为《摩西五经》，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

《申命记》。先知书指的是《约书亚记》之后的篇章。无论是律法书或先知书都是将古老时代的事情依照时间顺序书写。《旧约圣经》看似是一本历史书，但事实上并不是具有像希罗多德的《历史》般性质的历史。这与《旧约圣经》的内容有关。

《旧约圣经》主要部分发生的时代在公元前 7 世纪末，地点则是在巴勒斯坦的犹大王国。在此之前的公元前 13 世纪初，希伯来人的游牧民族从北阿拉伯的沙漠向东，逐渐进入了巴勒斯坦的农耕地带。这个时代，巴勒斯坦的海岸地带被从海上入侵的非利士人占据，希伯来人一开始也是在非利士人的统治之下。到了公元前 11 世纪末，巴勒斯坦南部的便雅悯家族出现了一位名为扫罗的领袖，统一希伯来人的十二个部族，建立以色列王国，成为第一位君主。当时，被选为监视十二个部族同盟契约的神是雅威（耶和华）。然而，此时耶和华还不是以色列人唯一的神，以色列人也并不是一神信仰的教徒。他们信奉的是巴勒斯坦先住民族的众神，包括巴力神、希拉女神、阿斯塔蒂女神等。

扫罗最后被非利士人击败，战死沙场。出身南部犹大部族的大卫继承王位，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第二任国王。他击败非利士人，将首都定在位于南部二部族与北部十部族中间的耶路撒冷。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了耶和华的大圣殿，当作统一的保证。

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在位期间虽然确保了南部与北部的

统一，但在所罗门王过世后，王国随即南北分裂。南部的犹大王国效忠大卫家，由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登上王位，而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则有了新的王朝，两个王国并存了将近二百年。到了公元前 720 年（一说，公元前 722 年。——编者注），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灭亡，北部十部族的人们被迫移居帝国各地，最后终于被同化消灭。巴勒斯坦只剩下以色列的犹大王国。

公元前 627 年，亚述帝国的亚述巴尼拔王死后，亚述帝国很快就被灭亡了。犹大帝国的约西亚王趁机夺回了被亚述帝国占据近百年的北部领土。这个胜利同时也属于统一之神耶和华的胜利。

约西亚王在公元前 621 年着手修复位于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圣殿，从圣殿里发现了《申命记》的副本。内容记载，以色列的人民与耶和华签订契约，发誓不信奉耶和华以外的神明。然而，以色列人却违背这项契约，耶和华一怒之下决定惩罚以色列人，消灭以色列的王国。这原本是部族联盟的契约，但在新的解释之下，这份契约成了一神信仰的契约。耶和华消灭的虽然是百年前就已经灭亡的北部王国，但刚收复以色列王国故土的约西亚王仍然十分认真看待《申命记》中所写的内容。于是，约西亚王破坏了全国诸神的祭坛与神像，流放祭司，一神信仰的王国就此诞生。

除了《申命记》之外，《旧约圣经》中其他的律法之书也在这时候渐渐编纂完成。《创世记》描述以色列人的始祖

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相遇的故事；《出埃及记》描述的是摩西从耶和华手中获得圣约石板的故事；《利未记》《民数记》描述的是耶和华将律法交给摩西的故事，两者是在一神信仰改革时期所编纂的篇章。这些文献以古时候多神教时代开始传承下来的故事为基础，把这些故事全部改写成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交换圣约的背景故事。

《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书也同样如此。《约书亚记》描述的是耶和华遵守圣约将巴勒斯坦的土地赐给了以色列的十二个部族。然而实际上，如前所述，是扫罗王统一了十二部族，建立同盟，而耶和华是以色列同盟的神。十二个部族并非一开始就结为同盟一起进入巴勒斯坦。这也是经过改写而成的故事。

《士师记》描述的是以色列人违背契约，信奉先住民的众神，激怒了耶和华，从此陷入悲剧的命运。之后出现了效忠耶和华的领袖，拯救了以色列人。这主要是在描述公元前12世纪中至公元前11世纪末巴勒斯坦的状况。有趣的是，这个时候十二部族的同盟尚未成立。

《撒母耳记》描述的是扫罗王和大卫王时代，耶和华的祭司撒母耳身为先知的事迹。《列王传》描述的是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造耶和华圣殿的原委以及所罗门王后世诸位犹大国王与耶和华的关系。

就像这样，《旧约圣经》的律法书与先知书描述的是古时代的故事，乍看之下的确像是一本历史书。然而，书中

从头到尾一贯的主题都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的契约关系，只有与耶和华签订契约的人才是以色列人。因此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等于是耶和华所创造的，并不是因为拥有相同的体验（政治）才让他们成为以色列人。这是神学，不是历史。就算让步称其为历史的一种，但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旧约圣经》仅限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最多只能称为国史，而且是十分偏颇且充满假想的国史。

《旧约圣经》比起希罗多德的《历史》早了一百四十年左右。相较于希罗多德的《历史》描述的是横跨亚洲与非洲的波斯帝国与代表欧洲的希腊之间的对立，属于真正的世界史，《旧约圣经》的视野较局限。自然，这样的《旧约圣经》会对从希罗多德开始的地中海文明历史文化造成影响，当然是透过基督教的力量。

《启示录》的历史观

约西亚王的一神信仰改革后仅三十五年，犹大王国就遭到灭亡。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帝国的尼布甲尼撒二世攻陷耶路撒冷，破坏耶和华圣殿，将犹大王国的人民带到了巴比伦。相较于一百三十六年前被亚述帝国迁移的以色列王国人民与当地人同化，种族也逐渐消灭，被移居到巴比伦的犹大王国人民在之后的半世纪间，在囚虏生活中依旧保有种族的独特性。

四十八年后的公元前 538 年，打倒新巴比伦帝国的波斯国王居鲁士解放了犹大王国的人民，允许他们回到巴勒斯坦。他们回到巴勒斯坦后重建了耶和华的圣殿。他们虽然丧失自由被迁移到异地，但却能够保有种族的独特性完全是拜约西亚王的一神信仰改革所赐。他们拥有“唯有信仰耶和华者才是犹大王国的人民（犹太人）”这个明确的身份，而这个身份与政治无关，完全属于宗教性质。犹太人身份的确立正是从被巴比伦囚虏的时代开始。

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等到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打倒波斯帝国之后，犹太人转而被马其顿人统治。公元前 167 年犹太人叛乱，到了公元前 140 年，犹太王国终于独立，建立了哈斯蒙尼王朝。这时距离犹大王国被灭已经过了四百四十六年。这个犹太王国一直到公元前 63 年才成为罗马帝国的附庸国。

公元 44 年，亚格利帕王死后，犹太王国最终遭到废除，成为罗马帝国的一省。然而，罗马国教的皇帝崇拜与犹太人激进的一神信仰相互对立。犹太人多次叛乱，终于在公元 70 年，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破坏了耶和华的圣殿。

公元前 586 年犹大王国被灭，从那时候开始的巴比伦囚虏时代算起，犹太人多舛的命运已经持续了长达六百年。到了罗马时代，巴勒斯坦犹太人不满的情绪到达极点，渴望有一位受耶和华之命的救世主（弥赛亚）可以拯救他们。这时，犹太人的耶稣与以他为中心的教团出现在世人眼前，

耶稣被他的信徒认为是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耶稣自己于公元30年左右被罗马人处刑，耶稣犹太人的弟子西门·彼得开始向那些没有严守律法、严格来说不能算是犹太人的人们宣扬耶稣是弥赛亚，这就是基督教的起源。在这个阶段，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支派，而且是具争议性的异派。

当时的罗马帝国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埃及的公元3世纪初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有人将《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让《旧约圣经》可以普及于看不懂希伯来文的犹太人之间。因此，当基督教在非犹太人之间广为流传时，地中海世界会说希腊语的人能够很容易地理解《旧约圣经》的内容。

然而，耶和华是以色列人的神，《旧约圣经》的内容也过于狭隘，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法顺利说明横跨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帝国当中各式人种的政治经验。集结耶稣的传记与弟子们的信件而成的基督教《新约圣经》，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讲述耶稣是犹太人期待已久的弥赛亚，与现实的历史没有关联，这一点比不上《旧约圣经》。唯一的例外是《新约圣经》的《启示录》。这份基督教文献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观。

《启示录》是在公元1世纪末，也就是罗马皇帝图密善在位时所写的预言文献。图密善的父亲维斯帕先正是讨伐犹太人的叛乱，于公元70年攻陷耶路撒冷，破坏耶和华圣殿的皇帝。也就是说，《启示录》是犹太人对于罗马的憎恶

程度达到最高峰时所写的文献。《启示录》的内容与《旧约圣经》非常不一样，取代唯一的神耶和华，出现了代表善的“真神”与代表恶的“撒旦”两个伟大的神，而世界是这两个神的战场。这个二元论的思想完全来自于波斯的祆教，从此可以看出犹太人受波斯文明影响之深远。

比起这个二元论，《启示录》的终末论与“千年王国”的思想，更深刻影响了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观。《启示录》中预言，死过一次的弥赛亚耶稣即将以原本的王者之姿再度临世，统治世界千年，之后便是世界末日的到来。

在世界终了之日神大怒。神的使者在以色列十二个部族各一万二千人，总计十四万四千“神仆人”的额头上留下“永生神的印记”。七个灾难依序发生，毁灭世界。神的使者与撒旦的使者展开大战，撒旦终将被击败。耶稣·弥赛亚骑着白马率领天兵出现在世上。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它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那些因为给耶稣作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首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罗马皇帝）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它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头一次的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一千年完了必须暂时释放恶魔，但魔鬼又会被扔在硫黄的火湖里。所有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接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不承认耶稣为弥赛亚的犹太人），他就

被扔在火湖里，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在新的天地里，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神的荣耀光照代替了日月光照，神仆人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简单而言，《启示录》想说的是，这个世上是善神与恶神对抗的地方，最终善神将获胜，时间将停止，世界将毁灭。在此之前，在弥赛亚的王权之下，信徒们（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将可享受一段幸福的时间，以作为苦难的补偿。在此，“千年的王国”与“新耶路撒冷”看似是两个理想世界的重复，但时间一旦停止，忠诚信徒获得补偿的快乐与不信者获得惩罚的苦难都将不存在，为了消除这样的矛盾，所以才特别在世界末日之前，设置了千年的时间。

《启示录》在公元1世纪末完成，当时基督教还只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文献中会出现诅咒破坏耶路撒冷耶和华圣殿的罗马，以及对向罗马屈服的犹太人问罪的激烈语句，也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像这样，《启示录》是针对犹太人命运的预言，丝毫不关心世界上的其他人类。

公元132年，犹太人再度叛乱。罗马帝国花了三年的时间平乱后，禁止犹太人再度进入耶路撒冷。大部分的犹太人离开了巴勒斯坦，移居罗马帝国各处。在此同时，原本属于犹太人宗教的基督教在犹太人以外的罗马人之间宣扬开来，罗马帝国也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在殉教者的事迹当中，确认是事实而非传说的事迹皆发生在公元2世纪

后半叶之后。

顺道一提，传说公元64年罗马市大火之后，皇帝尼禄以放火的是基督教徒为由对基督教进行了最初的迫害，但这完全是子虚乌有，没有任何尼禄迫害基督教徒的史实。当时在罗马市内，几乎还没有基督教徒。

无论如何，基督教终究成为罗马帝国一般人所信奉的宗教，到了公元391年，狄奥多西皇帝立法将基督教定为国教，禁止其他的宗教。如此一来，原本是为了犹太人所写的《启示录》也成了预言全人类命运的文献。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受到基督教教化的地中海世界，历史原本是从耶和华与以色列人（犹太人）签订的契约开始，现在成了“弥赛亚出现后契约便终止。不久后弥赛亚再度出现，时间停止，历史终结”，这样的历史观变成了主流。

然而基督教的历史观原本是只针对犹太人的历史观，视野十分狭隘。希罗多德的历史观在此之前是地中海世界的主流，他主张历史是欧洲与亚洲的对立，这与罗马帝国的现实情况十分吻合，规模也十分庞大。但基督教的历史观却与希罗多德的历史观完全矛盾。为此，后世的西欧人身为受到基督教教化的罗马帝国后裔，被夹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历史观之间，左右摇摆。

东西的对立

不幸地，希罗多德主张对立的历史观与基督教的历史观有一个重要的共通点。那就是《启示录》中所主张的，世界是善与恶的战场，也就是善恶二元论。当善恶二元论与希罗多德主张的欧洲与亚洲对立重叠时，也就是说，欧洲是“善”，属于“神”的阵营。相反地，亚洲是“恶”，属于“撒旦”的阵营。世界是欧洲的善与亚洲的恶相互对立的战场。欧洲被赋予神圣的天命，获得神的帮助，与被视为恶魔的亚洲对抗，打倒并征服亚洲。当欧洲打倒亚洲获得最后胜利时，对抗解除，历史也就完结。这成了欧洲人的思想。公元 11 世纪，这个思想在欧洲高涨，十字军进攻伊斯兰正是这个思想之下的产物。不仅如此，到了公元 15 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时代，进入亚洲、非洲、美洲的欧洲人，他们的历史观还是基督教的历史观，完全没有改变。就算到了现代，“对立的历史”这个地中海型的世界观依旧是造成欧洲与亚洲对立、摩擦、冲突的最大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属于“神”阵营的美国、西欧与属于“撒旦”阵营的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等对立关系持续了长达半世纪。以 1990 年为界，当美国与欧洲确定了他们的胜利之后，又开始在亚洲寻找别的恶魔。此时发生的便是 1990 年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侵略。美国与西欧

难得联手一同参与海湾战争，正是因为这是一场“神的使者与撒旦的使者”相互间的战役。

海湾战争的结果由欧洲（美国与欧洲）获胜。欧洲在打倒亚洲（伊拉克）之后，对于在战争中提供极大帮助的日本却露骨地提高了警戒，这也纯粹因为日本是亚洲的国家。“无论表面如何，只要是亚洲的国家就是美国与欧洲潜在的敌人”，这是地中海世界基督教历史观之下所得出的结论。除非日本不是亚洲的国家，或是日本可以创造出比基督教的历史观更强大的历史观，否则无论日本在国际社会中如何努力，还是无法逃脱被美国与欧洲敌视的命运。

那么，日本有可能创造出比地中海文明的基督教历史观更具说服力的历史观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有历史的文明，也就是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第3章 皇帝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司马迁的《史记》

日语的“历史”一词虽然用汉字书写，但这并不是起源于中国的词汇。我认为，现代中文的“历史”一词其实是借用日语而来。日语的“历史”是在明治时期所创造的新词汇，用来当作英语“history”的翻译语。公元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学习的清朝留学生将“历史”一词带回了中国。

汉字的“史”是在“中”字下面加一个“又”字。象形文字“中”，代表在有盖或有柄的容器内放进一片用来书写文字的木简（细长的木板）。“又”则是代表右手的象形文字，“又”加“口”就成了“右”。“又”与“右”的发音也相同。也就是说，“史”代表用右手捧着文书的人，是负责记录的事务官。“史”“事”“使”的意思与发音皆相同。“史”原本的意思是官员记事的簿子，与现在的“历

史”意思不同。“史官”负责将每天发生的事写进簿子里，以史官的记录为基础，发展出了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中国文明的“历史之父”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史记》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完成，晚于地中海世界的希罗多德约三世纪半。《史记》现在已经是历史书的代表著作，原本的书名为《太史公书》，共一百三十篇。书中的记述从最初的“天子”黄帝开始，直到司马迁侍奉的汉武帝为止。

根据司马迁《史记》最终篇的《太史公自序》所言，司马家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朝的太史公（史官长），主掌“天官”（占星术）。西元前110年，汉武帝登上泰山祭祀天地，举行了“封禅”的仪式。当时，司马谈未被允许参加仪式，羞愤而死。司马迁于两年后，二十八岁时当上了太史公。

四年后的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年号为“太初”。该年阴历十一月（子月）的朔日刚好是六十干支最初的甲子日，而且当天夜半时刻又正好是冬至。根据中国历法，这与宇宙万物刚形成时的状态相同（甲子朔日冬至）。于是，在司马迁的提议之下，修改历法，制定“太初历”，取代至今为止都被当作年首的十月（亥月），改正月（寅月）为年首。“太初”与开创天地相同，代表宇宙结束一个循环，开始新的循环。

司马迁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公元前104年开始撰写《史

记》。公元前 99 年，司马迁因为替被匈奴（中央欧亚草原的游牧帝国）击败请降的将军李陵辩护，遭到汉武帝降罪，被去势成了宦官（编注：汉景帝时代开始有“死罪欲腐者，许之”之法，而太史公司马迁是遭受了宫刑，但不是宦官，作者怕是误解了）。《史记》是在这个时期前后完成，记述的内容至公元前 97 年为止。

无论如何，司马迁之所以会着手撰写《史记》，必定是因为他认为宇宙在公元前 104 年回到了最初的状态，历史已经完结。司马迁的这种想法并不仅来自于历学的理论，更反映出当时皇帝制度发展到极限的现实。历学的知识是在这样的现实中，用来划分时间。

《史记》的构成

下面依序介绍《史记》所记载的内容。

《史记》的构成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本纪》记载帝王在位期间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表》记载政治势力之兴亡与交替的时间关系。《书》记载制度、学术、经济等文明面的概论。《世家》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地方王家与统一中国之后的历代诸侯事迹。《列传》则记载了著名人士的事迹。当中，《本纪》与《列传》是《史记》的基础，因此后代的中国历史学称《史记》的体裁为“纪传体”。

五帝

《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内容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个“帝王”的事迹。

《五帝本纪》一开始的黄帝，其事迹与汉武帝的事迹十分雷同。首先，司马迁强调黄帝巧妙地利用战争平定“天下”（中国世界），接着巡视天下的东南西北边境。另外还特别记载黄帝登上东方的泰山，并驱逐了北方的荤粥（匈奴）。这些全部都与汉武帝的事迹相同。当中提到“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正是说明了黄帝是汉武帝投影的最佳证据。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修改历法之时，将年首从以往的十月改成正月，也意味着从“水德”转换为“土德”。

根据公元前3世纪前半叶哲学家（阴阳家）邹衍所倡导的宇宙论，时代可用木、金、火、水、土的五“德”（能量）划分，而这五个时代不断地轮流交替。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时采用了这套理论，认为从黄帝开始的五帝属于“土德”，五帝之后的夏朝属于“木德”，之后的商朝属于“金德”，接下来的周朝属于“火德”，而取代周朝的秦朝则属于“水德”。由于“水德”与四季当中的冬季对应，因此秦朝以冬季为最初的月份，也就是阴历十月为年首。这是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宇宙循环进入最终的

时代”为基础的想法。

秦始皇取代了至今为止“王”的称号，改用了“皇帝”（“功过之皇，德兼五帝”）的称号，这就是皇帝制度的开始。秦始皇认为，从黄帝的“土德”开始，经过“五德”的一个循环，进入“水德”这个宇宙循环的最终时代，代表秦朝的政权将会延续不断，直到永远。秦始皇一开始就把自己死后的称号（谥号）定为“始皇帝”，勒令“后世以此开始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但事实上，秦朝传到二世皇帝时即被灭亡。

汉高祖刘邦打倒秦朝登上了皇位，但他似乎不认为时代已经改变，因此所有的制度皆比照秦朝办理。直到公元前104年修正历法为止，一直将十月当作年首也正是这个原因。

汉高祖之后，有人开始提出不同的想法，认为“水德”的时代并非宇宙循环的终止，现在应该是回到了一开始的“土德”时代。公元前165年，汉高祖的儿子文帝原本准备正式采用“土德”的主张，但最后还是作罢。直到二代之后的汉武帝，才终于在公元前104年付诸实行。事实上也是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黄帝这个神话中的天子突然间受到大家的推崇。因此，也不难想像身为汉武帝臣子的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的《五帝本纪》中，将汉武帝的事迹投影在黄帝的身上，并将“土德”时代理想化。

《五帝本纪》中的第二帝颛顼是黄帝的孙子，第三的帝喾是黄帝的曾孙，第四的帝尧则是帝喾的儿子。

帝尧是一个如阳光般耀眼的人，他正确计算日出和日落的时间，将一年定为三百六十六天。帝尧在位期间国内发生了大洪水，洪水以冲上天的气势淹沿了高山与丘陵，地上的人们面临了灭绝的危机。帝尧命鲧（意指“蛋”）治水，花了九年的时间却没能成功。帝尧为了表示负责决定退位，命舜摄政。舜是颛顼的第六代子孙，他观察星象，摆正日月五星的位置，进而祭祀天上诸神。舜并以刑法治天下，建立社会秩序。

帝尧死后，舜将共主之位让给尧的儿子，但在各诸侯的支持之下，顺应天意，登上了天子之位。五帝之五便是帝舜。

说到这里，到底什么是“帝”？

在“帝”字下面加一个“口”便是“敵”“嫡”“適”等字的偏旁。“帝”的发音原本也与这些字相同。从此可以判断，“帝”原本的意思是指“配偶”。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中国世界）之前，每个城市国家都有各自的地母神作为守护神。地母神是天神的妻子，产下了城市国家皇家的始祖。地母神的“配偶”天神，也就是“帝”。

从《五帝本纪》中记载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五帝原本都是神，治理的也都并非是现实的人类世界，而是属于神话世界。五帝虽然属于虚构，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司马迁要在《史记》这个人类历史的开头，写上五帝的故事呢？

《五帝本纪》的特征在于，从人类（中国人）历史的开

端起，便将“天下”（中国世界）视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单位。然而，《史记》中《五帝本纪》之后的《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也就是所谓的“三代”王朝，却看不见如五帝时代中国世界的统一。

东夷的夏

《夏本纪》的内容如下。

颛顼的儿子是鲧（意指“蛋”），鲧的儿子是禹（意指“蛇”），而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

在此之前的帝尧时代，鲧因为整治淹没人类世界的大洪水失败而被处刑。摄政的舜起用禹取代鲧治水。禹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不眠不休地努力，平定高山大川、开九州（黄河的平原）、通九道（交通道路），又在久泽（沼泽）筑堤防，并决定了九山（山脉）的位置。

帝舜指名禹为自己的后继。帝舜死后，禹打算将帝位让给舜的儿子，但在天下各诸侯的要求之下，继承天子之位，改国号为夏后（“后”与“侯”同音，是城市国家的君主）。禹在巡视东方领土时死于会稽（浙江省绍兴市）。禹死后，他的子孙继承王位，开启了君主世袭之制，直到第十七代的桀，才被殷汤王所灭。

《夏本纪》中大洪水的故事，从叙述的方式可以明显看出这是夏朝的建国神话，禹也不是人类世界的君王，而是

创造人类世界的神。他的名字代表“蛇”，这也不是偶然。关于夏朝的帝王们，有许多与龙相关的传说，龙是东南亚人信奉的水神，“龙”字的发音在古时候与“江”相同，代表“水路”。长江（扬子江）以南所有的河川皆称为“江”，这是受到泰语的影响。

另外，古记录中，夏人所有的城市都沿着北纬三十五度线，位于黄河流域与淮河、长江分水岭的秦岭山脉南方的位置。顺河南下便可出淮河或经汉江出长江，到达浙江的海岸。

根据《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篇记载，越王族的祖先是禹，第六代夏后少康的庶子在会稽建国，这便是越国的起源。禹死于会稽，在那里有禹的墓。与司马迁同时代的越人住在浙江、福建、广东海岸。他们在身上刺龙，巧妙地操控船只，从事捕渔和水稻栽培。就算到了今日，住在这一带的中国人，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中还是可以明显看出泰语的痕迹。

虽然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夏朝的遗迹或遗物，但几乎可以确定是夏人将东南亚文化带进了北方，为后世的中国文明打下最古老的基础。他们从南方利用水路乘船北上，在船只可及的地方建立了各个城市。无论是大洪水的传说，或是从“蛋”而生的“蛇”创建国家的传说，都可看出夏朝这个最初的城市国家，水与龙的关系密切，更说明了夏朝是由东南亚系统的人们（东夷）所创建的。

北狄的殷

《史记》的《夏本纪》之后是《殷本纪》。殷朝始祖的母亲为简狄（“狄”是北方的狩猎民族），是有戎氏（“戎”是西方的游牧民族。有戎氏，《史记》本作有娀氏。——编者注）之女，帝喾的妃子。有一天，简狄在野外与两个女子沐浴的时候，天上掉下了一颗燕子蛋。简狄吃了燕子蛋之后，怀孕生下了名为“契”的男婴。契在商地建国，成为了殷朝的始祖。

契的第十三代子孙是汤。由于夏王桀暴虐无道，于是汤率领诸侯讨伐，在有戎之丘大破夏军。汤也因此受到诸侯们的推崇，登上王位，建立殷朝取代夏朝。另外，夏朝历法定春天最初的月份（寅月）为正月，而汤改冬天最后的月份（丑月）为正月。服装的颜色为白色（五德中“金德”的代表色）。

汤王的子孙世袭王位，但到了第三十代的纣王，由于他的残暴不仁，被周武王率领诸侯讨伐，在牧野之战中战败。纣王自杀而死，武王取而代之，登上了天子之位。

从上述的《殷本纪》中可以看出，殷人无疑是出身于北方的狩猎民族（北狄）。女神在野外沐浴，因为吞了从天而降的鸟蛋而怀孕，生了一名男婴，这是北亚狩猎民族与游牧民族共通的始祖传说。女神的名字简狄也代表狩猎民

族的意思。殷的的确确是实际存在的城市国家，但应该是从蒙古高原经山西高原南下，征服了河南的夏国。

西戎的周

《殷本纪》之后是《周本纪》。周朝始祖的母亲为姜原（“姜”与“羌”相同，是西方的游牧民族），是有邰氏（陕西省武功县，西安市之西）之女，帝喾的妃子。有一天，姜原外出时发现巨人的足迹，她开心地踩着巨人的脚印，突然间身体震动了一下，没多久就怀孕，足月产下一名男婴。然而，姜原却觉得这名男婴是不祥之兆，于是把他丢弃在一个窄巷里。没想到所有经过的牛马都避开这个婴儿，没有踩到他。姜原于是把婴儿丢在树林里，但树林里却突然间来了很多人。姜原又把婴儿丢在一条结冰的河面上，没想到却飞来了一群鸟，用翅膀替婴儿取暖。姜原大呼不可思议，于是把婴儿捡回来扶养。由于姜原一开始打算把婴儿丢弃，于是取名为“弃”。弃就是周朝的始祖。

弃的儿子住在戎狄之间。子孙当中可以看见皇仆（“仆”是驾车的御者）、高圉、亚圉（“圉”与“御”相同，同样指驾车的御者）等名字。亚圉的孙子名为古公亶父，被戎狄侵扰而迁居岐山之下（陕西省西部），从此一改戎狄式的生活型态（游牧），建立了城市。古公亶父的孙子便是西伯昌（周文王）。

西伯昌在陕西建立了一股强大的势力，拓展至与河南为境的地方，自称获得天命。在接受天命后的第七年，西伯昌死去，他的儿子发，继承他的遗志。发也就是周武王。

接受天命后的第十一年，周武王率领大军入侵河南，从洛阳市北部的孟津渡黄河北上，在殷朝首都商的郊外牧野与殷军交战，大败殷军，纣王自杀而死。周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殷朝。武王是周朝的第一位君主，王位由他的子孙继承。

周朝第五代的穆王发兵远征犬戎（西方的游牧民族）。由于第十代的厉王暴虐无道，引起了周国人（首都的市民）的叛乱，逼走了厉王。在厉王出走的情况下，由负责辅政的周公与召公代为执政，号“共和”（史称共和行政）。《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将这件事表记为公元前 841 年，是最初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厉王死后，他的儿子宣王即位。宣王与姜氏的戎（西方的游牧民族“羌”）交战大败。宣王的儿子幽王，由于王位继承者的内部纷争不断，被犬戎人攻杀。幽王的儿子平王将至今在陕西的根据地向东移，定都洛邑（河南省洛阳市）。这是公元前 770 年的事，之后便进入了春秋时代。周王朝势力衰微，大诸侯开始合并小诸侯，最终进入战国时代，周朝东西分裂。公元前 256 年，西周被秦歼灭，到了公元 249 年，东周也被秦所灭。以上就是《史记·周本纪》的内容。

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西方游牧民族出身的周，取代了北方狩猎民族出身的殷。不仅如此，从《史记·秦本纪》中可以得知，消灭周的秦也是出身于西方的游牧民族。

西戎的秦

根据《秦本纪》记载，五帝之二的颛顼，他的子孙当中有一个名为女脩的女子。有一天，当女脩在织布的时候，突然飞来了一只燕子产下一颗蛋。女脩吞下这颗蛋后怀孕，生下了大业。大业的子孙住在西戎，后来为周朝第八代的孝王养马，才移居到秦（甘肃省清水县）。之后的历代子孙不断地与西戎征战。周平王放弃陕西移居河南之后，秦获得了岐山以西的陕西、甘肃领地，正式成为诸侯。春秋时代的秦穆公（公元前 659 至公元前 621 年在位）将领土推进到黄河的湾曲部。往西则击败了戎王，获得了十二座城市与千里的土地，成为了西戎的霸主（“霸”与“伯”相同，意指年长者、首领）。进到战国时代之后，秦的惠文王于公元前 325 年首度称王。惠文王四代后的子孙便是为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 年，征服其他城市国家，首度统一“天下”（中国世界），成为了第一位皇帝。

从《史记·秦本纪》之后的《秦始皇本纪》，一直到叙述汉武帝时代的《今上本纪》《孝武本纪》为止，是于公元前 221 年初成立的中国世界历史。真正的中国世界历史可说

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换句话说，《史记》从《五帝本纪》到《秦本纪》的开头五篇是中国以前的历史。司马迁特别强调从最初的君主黄帝开始到夏朝的禹、殷商的汤，他们都登上了“天子”之位。“天子”与“皇帝”有着相同的意义。统治“天下”的皇帝之位，虽然实际上是从秦始皇开始，但司马迁在史记中想要强调的是，皇帝在历史的最初便以其他的名称存在，也因此，以皇帝为中心的“天下”（中国世界）也是从历史之初便存在了。

然而，与司马迁的主张相违背，以客观的角度阅读《史记》的叙述，会发现五帝无论怎么想都是神，而最早的夏王朝是拥有东南亚文化特征的“东夷”，征服夏的殷商是东北亚狩猎民族的“北狄”，征服殷商的周则是北亚游牧民族的“西戎”，征服周的秦也同样是“西戎”。也就是说，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尚未形成可以被称为“中国”的世界，更没有可以被称为“中国人”的民族。

实际上，夏、殷、周也称不上是一个王朝，只不过是在多数城市国家当中属于军事武力稍强的国家罢了。

当中的周朝建立“封建”制度。乍看之下，好像是统一天下，天子将国土分封给诸侯。然而，“封建”原本的意思是武装移民从母城市出走，在新的土地上建立子城市。“封建”下的子城市从母城市中独立，经营独自的政治生活，不受母城市的支配。从被周朝分封在山东的鲁国记录

《春秋》中可以看出，《春秋》将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481年的纪元以从鲁隐公到鲁哀公为止的历代鲁侯在位年数表示，而非以周王的在位为基准，这就是最好的证据。由此可见，中国世界（天下）尚未成立，国家也尚未统一。

正统的理论

就算如此，《史记》以“正统”理论为基础，还是将夏、殷商、周与实际统治中国的秦始皇以及汉朝历代皇帝并列，一起写进了《本纪》之中。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势力，只靠实力是无法统治国家的。为了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必须要有法的依据。在中国世界里，这个依据正是“正统”的观念。天下间存在着唯一的“正统”（中国世界的统治权），而这个正统由五帝传给夏，夏传给殷商，殷商传给周，周传给秦，秦再传给汉。“正统”的传承便是“传统”。

“传统”的手段原则上是“世袭”。五帝是黄帝和他的子孙，而帝尧传给帝舜，帝舜传给禹采用的是“禅让”，因此也没有问题。问题是武力扳倒夏的殷商汤王，以及打倒殷商的周武王，要如何承认他们的“正统”呢？当王朝的“德”（能量）衰微，“天”将革除王朝的“命”（“革命”），而新的王朝接受“天命”（“受命”），“正统”转移，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说明。

而且，以宗谱而言，夏商周三代王朝皆为黄帝的子孙。夏禹是颛顼的孙子，而颛顼是黄帝的孙子。殷商始祖的契，他的母亲是帝喾的妃子，而帝喾是黄帝的曾孙。周的始祖弃，他的母亲也是帝喾的妃子。不仅夏商周三代，秦的王族也被认为是颛顼的子孙，因此秦始皇依旧保有黄帝所传下的“正统”，是接受“天命”的天子。

旧城市国家的王族问题也许不大，但建立汉朝的高祖刘邦完全是一介庶民，因此正统的根据完全必须仰仗接受“天命”（“受命”）、革除“王命”（“革命”）的理论。然而，天命十分抽象，因此，自然的怪异现象（“符瑞”）就成了天命最重要的证据。正因为这个原因，汉武帝时代，祭祀、占卜以及预言的风气异常盛行。后世的王朝也不输给汉朝，为了证明从前代王朝继承“正统”、保有天命，以包括伪装“禅让”的形式、夸示得到象征前朝帝权的遗物等方式，想尽办法将“革命”“受命”正当化。

传说秦始皇的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汉高祖得到玉玺，汉朝世代传承，称“汉传国玺”。汉朝之后，这个玉玺也继续成为主张“正统”的君主相互争夺的对象，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在辛亥革命中接受清朝宣统帝禅让的中华民国，在失去大陆移居台湾之后，仍不愿放手北京故宫里收藏宋、元、明、清的皇帝秘宝，用来证明自己才是接受历代“正统”，中国唯一的政府。另一方面，在台湾的问题上，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退让一

国一政府的原则，要求废止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国旗，这也是在“正统”只有一个的思想之下，如果承认另一个中国人国家的存在，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丧失“正统”政权，也就失去了建国基础。就像这样，哪一个政权从哪一个政权继承“正统”，是中国人特殊历史观的中心思想，这种观念在中国世界最初的历史《史记》当中就已经成形。

这个“正统”的历史观也表现在时间的计算上。以君主在位年数为基准为年取名的纪年法，将君主即位之年（即位称元）或即位隔年（逾年称元）当作元年，这代表了君主是时间的支配者。最初，一代只有一个元年，但到了汉文帝在位的公元前164年时，发生了太阳在一日之内二度通过子午线的现象（日再中），于是汉文帝定隔年为第二的元年（改元）。接下来的汉景帝也二次改元，汉武帝更是每六年便改元一次，并趁公元前110年封禅的机会，将新的元年定为元封元年。这是年号的开始。此后，不使用皇帝的年号者就等于不承认皇帝具有支配时间的权力，被视为与皇帝敌对的反叛者。后世，日本的遣唐使从来不将国书带回日本便是因为国书上必须标明日期。如果日期使用唐朝的年号，那么就等于承认日本的天皇是唐朝皇帝的臣子。但如果使用日本的年号，那又等于是公然与唐朝皇帝作对。

与年号相同，颁布历法也代表皇帝拥有支配时间的权力。决定哪一个月是正月、哪一日是朔日，这是皇帝才有的特权。接受皇帝颁布的历法称为“奉正朔”，是表明成为

皇帝臣子的行为。司马迁于公元前 104 年修改历法，建立太初历，便是重新确认汉武帝为宇宙的中心。

司马迁的《史记》便是架构在这样的“正统”观念之上，结合神话中黄帝的“天下”与现实中汉武帝统治的中国世界，将中国世界统一前的夏、殷商、周列入《本纪》之中。

在《史记》中与《本纪》并列的《列传》，其内容并不是个人生涯的叙述，非我们一般所想的传记。书中人物出身年份的记载草率，很多人甚至没有卒年的记载。《列传》的主题是该人物与哪一个皇帝有什么样的关系与互动，叙述的是在皇帝制度之下，该人物身为官吏的生涯。因此，《列传》其实也是皇帝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特征在《史记》以后的“正史”中愈来愈明显，《列传》的内容仅是官吏的履历与呈给皇帝的奏表。

《史记》除了中国人的传记之外，还包括《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在我们看来像是叙述外国历史的一群“列传”。然而，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世界，因此没有国境的观念，当然也就没有外国的观念，仅分为皇帝直辖的地区与非直辖的地区。因此，叙述皇帝与皇帝直辖地以外的居民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互动，便是这些特殊“列传”的宗旨，这些仍旧是皇帝历史的一部分。

《三国志·魏书·东夷乌丸鲜卑传》《倭人》条，也就

是《魏志倭人传》，也具有相同的特征。内容是《三国志》作者陈寿以对晋朝有利的笔触，叙述自己侍奉的晋朝皇帝和先祖与倭人之间的关系。他的目的并非是为后世人留下关于倭人的客观历史记录。

总而言之，《史记》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历史特征。皇帝统治的范围称“天下”，也就是世界，只有“天下”才是历史记述的对象。换句话说，中国文明的历史是皇帝的历史，也是永远不变的“正统”历史。另外，每个时代公认的“正史”全都沿袭《史记》的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记述以皇帝为中心的世界（中国）。

班固的《汉书》——儒教

话说如此，仍有一项改变。《史记》记述的时代范围从五帝开始，经过夏、殷商、周、秦诸王朝，直到与作者司马迁同时代的汉武帝中期为止。后世的中国历史学称这种横跨多个朝代的历史书为“通史”，而只叙述一个王朝的历史书则称为“断代史”。

司马迁死后约一百八十年，班固（公元32至92年）写了《汉书》百篇。这本历史书与《史记》不同，体裁为断代史，记述从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即位起，至王莽篡汉的公元23年为止的汉史。也就是说，实质上只有汉朝一代的历史。《汉书》之后的“正史”全部都属于“断代史”。然

而，《汉书》中关于汉高祖至汉武帝的部分，基本上都是沿用《史记》的内容。为什么班固不延续《史记》的内容，采用“通史”的体裁，而使用“断代史”的体裁，重新记述汉朝的历史呢？这是由于班固是儒学家，而《汉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记述王莽将儒教定为中国政治指导原则的原委。

儒教的总部在山东的曲阜，在那里主要是培养中间管理者。但在秦始皇时代，甚至进到汉朝之后，儒教对于政治都没有实际上的影响。《汉书·武帝纪》关于公元前136年的记述中，有一篇《置五经博士》的文章，一般认为这代表儒教成为了中国的国教。然而这是非常草率的说法。“五经”指的是《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属于儒教的经典。“博士”指的是教授这些经典的官职。不仅是儒教的经典，各个主要学派都设有教授经典的博士官职。因此，《置五经博士》这篇文章仅代表在此之前不被承认的儒教，在公元前136年首度与其他学派并列，得到公认罢了。所谓的国教是像罗马的狄奥多西皇帝于公元391年以法律明令禁止除了国教以外的宗教。然而，在《史记》中完全找不到有关汉武帝颁布法令，定儒教为中国唯一宗教的记录。不仅如此，就算在《汉书》之中也有下列这一段记载，证明儒教的政治地位低微，根本称不上是国教。

汉元帝（公元前49至公元前33年在位）虽然八岁就当上皇太子，但长大成人后个性依旧软弱，推崇儒教。他

的父亲宣帝（公元前74至公元前49年在位）重用法家，实行信赏严罚的统治方针。有一天，元帝在宴席上向宣帝进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板起脸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根本为霸王道，只是加以应用。只论德教的周朝政治，有什么用呢？而且俗儒不懂现实，只会称古好，批评现今，迷惑大众，让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这样的人何足委以政治重任？”并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编注1 参见八十六页）

这是记载在《汉书·元帝纪》中的故事，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由此可见，就算在设置五经博士的百年之后，儒教的评价还是很低。

宣帝不祥的预感成真，在推崇儒教的汉元帝死后短短的四十年，汉朝的帝位就被元帝皇后的外甥王莽篡夺。

学问的终极目的应该在于预测未来，公元前1世纪的儒教，综合当时各种科学，发展成能够预知未来的一大学问体系。王莽是儒教热烈的推崇者，依照儒教的预言篡汉，遵循儒教理论执政的结果，导致中国世界大乱，王莽自己也招致灭亡。王莽灭亡后，刘秀（东汉光武帝）重建汉朝，他同样推崇儒教，确立了儒教成为东汉政治指导原则的地位。换句话说，儒教的兴盛拜王莽所赐。

《汉书》最后有一篇《叙传》，叙述作者班固自己的出身以及著作的意图，当中可以明显看出班固对王莽的好感。

根据《叙传》记载，班固的始祖来自山西北部与蒙古

高原交接地带，拥有数千头的马、牛、羊，是地方的望族。班固的曾祖父班况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儿子名叫班穉，也就是班固的祖父。

汉元帝的皇后（元后）王氏生下后来的汉成帝。公元前33年，元帝死后，二十岁的成帝登基，封母亲元后的哥哥王凤为大将军，掌握政治大权。王氏势力大增。王凤的弟弟是王曼，而他的儿子便是王莽。

班穉的长兄班伯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习《诗经》，在大将军王凤的举荐之下，当上了汉成帝的中常侍，这也与班伯的姐姐曾是汉成帝的妃子有关。

王莽与班穉兄弟同辈，交情很好。王莽尊敬班穉的仲兄如自己的兄长，疼爱班穉如自己的弟弟。班穉的仲兄死的时候，王莽还特地着丧服，并赠与高额的奠仪。班穉的儿子班彪便是《汉书》作者班固的父亲。

汉成帝没有留下子嗣。公元前7年，成帝死后由外甥的哀帝继承皇位，但哀帝即位六年便过世，同样没有留下子嗣。面对这样的危机，哀帝的祖母元后挺身而出，将政治全权委托王莽，并与王莽商议，让哀弟年仅九岁的表弟平帝坐上皇帝的宝座。这是公元前1年的事，五年后王莽篡汉。

就像这样，《汉书》作者班固的家世属于汉朝皇家的外戚，与王莽的王氏并列贵族，班固自己的祖父也是王莽的好友。班固自豪地将自己的家世写进《叙传》当中，与

《汉书》著作的由来做串连。

另外，班固还在《汉书》的《元后传》中记述王莽高贵的出身，内容如下。王莽是黄帝的后裔。黄帝的八代子孙是帝舜。帝舜的子孙在周武王时期当上了陈国的君主。十三代子孙亡命齐国，当上了齐国大臣，使用“田”姓。之后十一代的田和夺齐国政权，二代后称王。最后的齐王建，虽然被秦所灭，但在秦始皇死后，项羽册封建的孙子安为济北王。汉高祖兴起之后，安虽然失去了王位，但齐人仍称他们一族为“王家”，这就是王氏的由来。

与王氏显赫的家世相比，《汉书》最初的《高帝纪》中所记载的皇帝一族全部都是庶民，也不知他们的祖先为何人。《高帝纪》完全出自司马迁《史记》的《高祖本纪》，感受不到班固的用心。班固对汉朝皇室的冷淡与特别记述王莽辉煌的祖谱并提及受王莽喜爱的祖父班驩，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

班固非常推崇王莽。儒教能够在班固所生的东汉初成为中国政治的指导原则，便是王莽的功绩。身为儒家的班固实际上就是为了赞扬王莽的功绩才写了《汉书》。然而，仅记述王莽的事迹不足以被列为历史。由于王莽是汉朝的外戚，掌握汉朝实权，为了说明事情的原委，无论如何都必须提及汉朝皇帝的历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便确立了历史的体裁为纪传体。《汉书》当然也可以写成是《史记》的续篇，但如此一来便是从汉武帝时期的中途开始

写起，不是非常的适当。因此，从汉朝初代的高祖刘邦开始记述，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区分。基于上述的理由，《汉书》采取的是“断代史”的体裁。这些完全都是为了记述王莽功绩上的方便，并非一开始就打算采取“断代史”的型态。

正史架构的定型

《史记》与《汉书》确立了中国型的历史文化。之后直到公元 1735 年的《明史》为止，历代王朝皆延续相同形式的纪传体，以及以皇帝为中心的“正史”历史观记述历史，总称“二十四史”。

然而，体裁与历史观虽然已经定型，但中国文明的命运之后也不断地流动与变动。

首先，推崇儒教的东汉天下持续了不到二百年。公元 184 年正逢六十干支最初的甲子年。那一年，中国全国各地同时发生了秘密结社的叛乱（黄巾之乱），人口从原本大约五千万人一口气锐减至大约四百万人，华北平原地带的居民几乎绝迹。

这个导致中国文明崩坏的黄巾之乱，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预言为口号，这是相信世界末日的典型千年王国运动。这也是末世论首度出现在中国世界。参加黄巾之乱的秘密结社信仰的是道教。黄

巾之乱让儒教丧失了权威与信仰内容，成为了没有实体的宗教。道教取而代之，成为了中国思想的主流。

道教教派之一的五斗米道（又称正一道、天师道），有一本名为《正一天师告赵昇口诀》的经典，当中记载了教祖张陵下列的预言。人类的罪恶让上天震怒，决定毁灭世界。公元 144 年会发生大洪水，洗去人类的罪孽。只会剩下二十五万人的“种民”，名单将于公元 153 年截止。公元 184 年，大战争、大疫病、毒蛇猛兽的三大灾难降临清理世界。公元 190 年末，“太平”（最高境界的和平）终于到来，死者的灵魂将回归肉体，白骨再起，血液流通，隔天将张开眼睛。然而，没有“种民”证明“九光符”者，将再度死亡，在三官（天官、地官、水官）的引领之下获得解脱。太上老君（救世主）降临“太平”之世，在他的统治之下，人类不再面临死亡，寿命长达一万八千岁。

这个末世论的内容与《启示录》几乎完全相同，从中可以看出波斯祆教的影响。同样的千年王国运动之后也不断反复地出现在中国世界。当中，公元 14 世纪的红巾军之乱中，颠覆元朝蒙古帝国的白莲教，更明显是出自祆教体系。出身红巾军的朱元璋（明朝太祖洪武帝），后来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大明”，这与白莲教主张在世界末日出现的救世主“小明王”相呼应。

不过，秘密结社的千年王国思想，并没有对中国文明的历史观造成影响。这是因为历史的架构早在黄巾之乱很

久以前的《史记》与《汉书》中就已经定型。为此，“历史终了”这个观念并没有反应在“正史”的历史观上。既然时间和历史都没有终了，那么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时间的价值都没有改变，一年就是一年，价值完全相同。换句话说，历史并不会随着时代发展，也就是没有发展的阶段。从黄帝到孔子的“圣人”（可以预知未来的人）已经创造出了文明，只要皇帝遵守文明的基准（道德），无论是哪一个时代，都可以创造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这就是中国文明不变的历史观。

中国文明中的历史以“正统”的皇帝为中心记述世界，这一点长久以来都没有改变。然而中国的现实世界却与中国不变的“正史”观不同，不断地在改变。因此，“正史”的架构随着时代的进步，变得愈来愈不合时宜。然而，因为找不出可以取代《史记》《汉书》所确立的架构，因此后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只能在汉朝的规范之中记述历史。

正史架构的裂痕

如刚才所说，中国第一波的变化是伴随公元184年黄巾之乱而来的人口锐减。经历过这个中国文明实质灭亡的东汉大学者郑玄提出了天道（宇宙循环）的循环周期为一千三百二十年的历史理论。从周文王取代殷商朝接受天命的甲子年（公元前1137年）算起，一千三百二十年后的公元

184年，刚好是一个循环的结束。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人是如何严肃看待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

随着中国世界的全面崩坏，东汉也失去了实质上的政权。经过长时间的内战，公元220年魏的曹丕（文帝）、公元221年蜀的刘备、公元229年吴的孙权相继称帝。结果造成了中国世界出现三个皇帝，应该是唯一的“正统”却一分为三。

这个情况直到公元280年晋朝的武帝（司马炎）统一三国才终告落幕。之后，陈寿（公元233至297年）所写的《三国志》六十五卷，是分裂时代中国世界的“正史”。记述的对象是三国，内容当然也就分为《魏书》《蜀书》《吴书》三部。然而，只有《魏书》当中有皇帝的《本纪》，无论是《蜀书》的刘备或是《吴书》的孙权，他们的事迹都仅被放在《列传》之中。这样不公平的待遇表现出的政治主张是，“正统”的传承从东汉到魏，再从魏到现在的晋。

以唯一的“正统”皇帝为中心的中国世界历史观在此已经出现裂痕，接下来中国第二波的变化，更加深了裂痕。

公元2世纪末，中国人几乎灭绝，魏文帝以石头为标识，围起了河南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将这个区域取名为“中都之地”，将仅存的领地内的居民移居此处，估计居民总数最多不超过二百五十万人。

为了填补现在无人居住的华北地区，文帝的父亲曹操

将在内蒙古西部游牧的匈奴人迁移到山西高原。之后，晋朝好不容易于公元 280 年再度统一中国，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公元 300 年，发生了八王之乱，中国再度陷入内战的泥沼。匈奴的王族刘渊趁乱于公元 304 年在山西打着反乱的旗号自称汉王。匈奴军于公元 311 年占领晋朝的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二年后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西安）即位。然而公元 316 年，长安也被匈奴军攻破，晋愍帝被俘。隔年的公元 317 年，整整有一年间的时间，中国世界没有“正统”，就连个皇帝也没有。这是中国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件。

到了公元 318 年，晋朝皇族司马睿（东晋元帝）在长江南方的建康（南京）称帝，恢复了皇帝的称号。这时候的江南地区尚未中国化，中国人的大型村落只有南京和武汉。东晋被宋取代，宋被南齐取代，南齐被梁，梁又被陈取代。南朝的历代都只不过是在非中国人地带建立的亡命政权。从“正统”的历史观来看，东晋的建国者是“正统”的晋朝皇族，东晋的皇帝也必须是“正统”的皇帝。如果东晋是“正统”，那么继承东晋的宋、南齐、梁、陈自然也就是“正统”。

这件事本身其实就十分滑稽。当力微势薄的南朝在江南地区苟延残喘之时，华北的情势有了重大的改变。从公元 304 年刘渊叛乱开始，与匈奴同样移居华北地带的多个游牧民族参与了这场长达一百三十五年的五胡十六国之乱。

终于，到了公元 439 年，游牧民族鲜卑人所建立的北魏渐渐统一华北，这就是南北朝的开始。约百年之后，北魏东西分裂，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又被北周取代。最后，北周灭了北齐，北周又被隋取代。这些全部都是鲜卑一族所建立的王朝。终于，隋文帝于公元 589 年兼并了南朝的陈，统一中国。原本非汉人的鲜卑族，重建了中国。

隋朝统一中国还不到三十年，第二代的隋炀帝便在公元 618 年被杀，隋朝也跟着灭亡。同样属于鲜卑一族的唐太宗于十年后再度统一中国。唐朝编纂了南北朝时代的“正史”——《南史》与《北史》（两者皆于公元 659 年完成），两者皆立有《本纪》。这代表了承认两个不同系统的皇帝，也就等于是有两个“天命”与两个“正统”。

对于同为鲜卑族的唐朝而言，除了承认北朝的“正统”之外别无他法。有趣的是，《北史》一开始便记述了北魏帝室的出身，记录“祖先是黄帝。黄帝的儿子昌意，他的最小的儿子在北方建国。北方有座大鲜卑山，因此以鲜卑为号”。这是模仿司马迁的《史记》，追溯鲜卑族的北朝至历史的开端，主张北朝与中国人的南朝拥有对等的“正统”资格。这其实是非常勉强的说法，到了唐朝以后的时代，以“正史”的架构记述历史的时候，说法变得愈来愈勉强。

公元 552 年，阿尔泰山脉的游牧民族突厥人在中央欧亚的草原上建国，逐渐成长为可以与匈奴匹敌的大游牧帝国。这就是突厥汗国。当时的华北地区，鲜卑分裂成东魏与西

魏、北齐与北周，相互抗争，各阵营为了占有优势，纷纷寻求与突厥汗国结盟。公元 584 年，突厥汗国东西分裂，蒙古高原的东突厥汗国与隋朝结盟。隋炀帝末年，中国陷入内战，担任山西太原留守的李渊（唐高祖）也跟着起兵。李渊派使者前往东突厥汗国，向可汗称臣。李渊的儿子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中国后二年的公元 630 年，灭了东突厥汗国。

这时，草原游牧民族的首领们选出唐太宗为自己的共同君主，献上了“天可汗”的称号。此后，唐太宗在写给西北地方的所有书信上，全部署名“天可汗”。这是中国的“皇帝”首度兼任中央欧亚游牧帝国的“可汗”。换句话说，中国至此为止的历史舞台都仅限于中国，这个革命性的大事件首度让中国横跨中央欧亚地区。然而，以“正史”的架构处理这个重大的变化，却让中国的史官无所适从。

正史的缺陷

唐朝拥有完整的记录编纂，可以当作历史的材料。每一个皇帝死后都会编纂“实录”，依照年月日记载皇帝在位期间所发生的事。“实录”的材料是每日皇帝所批阅的公文，由最高层级的机关向皇帝提出。这个“实录”在王朝结束之后，成为下一个王朝编纂“正史”时的基本资料。到了后世，王朝还健在的时候便会以这些“实录”为基础，

编写“国史本纪”与相对应的“国史列传”。这层层关卡看似非常值得信赖，然而当中其实有几个重大的陷阱。第一，关于国家最高方针的重要决定，都是由下级机关呈报上级机关，很少以公文的方式裁定。一般都是由皇帝身边的少数人决定，基本上不会留下公文，因此无论是在“实录”“国史”或是“正史”上都不应该会留有记录。

第二个陷阱在于担任“正史”编纂的史官性格。隋朝开始举办科举考试，以作诗、作文的能力当作选用官吏的基准。到了唐朝，科举及第者（进士）当中特别优秀的人会被分派到翰林院，为皇帝颁发的诏令代笔，当中也有担任编纂历史的史官。科举考试的范围为儒教的“五经”。虽然儒教被道教取代，对于现实的政治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但儒教的政治用语和观念依旧保留了下来，影响了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在整理历史时的价值判断。也因此，唐朝以后的“正史”出现了许多非现实的面向。轻视历史的军事面便是最好的例子。

中国无论哪一个王朝，其政权的基础都是军队，真正的最高权力通常掌握在围绕皇帝身边的军人手里。然而，军人不具有文字的知识，与记录更是无缘。因此，军人的说法通常不会出现在“正史”之中。相反地，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充其量不过是皇帝的佣人，他们所写的“正史”却给人科举官僚才是支撑皇帝权力的基础，中国政治是科举官僚的文人政治，这样的错误印象。这虽然只是反

映出了佛教的理想论，但殊不知这对于理解中国文明历史文化的真相造成多大的妨碍。

鲜卑人的唐朝在公元 880 年被黄巢的叛军攻破首都长安（西安），从此一蹶不振。在不久之后的公元 907 年，唐朝被黄巢叛军之一的朱全忠（后梁太祖）篡夺灭亡。统治华北的后梁在短短的十四年后被突厥人的后唐所灭。而后唐又在十三年后的公元 936 年被契丹帝国所灭，由同是突厥人的后晋统治华北地区。十一年后，契丹人再度入侵，后晋因此灭亡。同是突厥人的后汉取而代之，但只维持了四年。后汉之后，汉人的后周统治了华北地区约十年。这个混乱的半世纪被称为五代，当中有三个朝代属于突厥人的王朝。

编纂鲜卑人唐朝“正史”的是突厥人的后晋。公元 945 年，完成了《旧唐书》二百卷。然而，《旧唐书》仅仅集结了唐朝文人官僚编纂的记录，评价不高。沿用《史记》的架构，模仿《史记》的《匈奴列传》，硬是把突厥汗国的记述列进了《突厥列传》之中，完全不理解公元 630 年，唐太宗被游牧民族选为“天可汗”这个重大事件的意义。历史的舞台依旧仅限于中国，采取一贯的态度，“历史是中国的历史”。

唐朝的“正史”除了《旧唐书》之外，还有经过重新编纂的《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这是由五代之后统一中国的宋朝（公元 960 至 1126 年）于公元 1060 年完成。由于宋朝是汉人的王朝，因此《新唐书》的历史观与《旧唐书》相

同，一样以中国为中心，对于突厥汗国依旧漠不关心。

然而，现实的历史舞台不断地在扩张。公元630年唐太宗被选为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天可汗”，半世纪后，突厥人在蒙古高原重建了后突厥汗国。后突厥汗国后来被回鹘汗国（公元744至840年）取代。而回鹘汗国又被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吉尔吉斯人推翻。回鹘汗国之后，契丹人从东方越过兴安岭山脉而来，建立了契丹（辽）帝国（公元196至1125年），渐渐发展成为从满洲横跨蒙古高原，领土遍及中央欧亚地区的大帝国。契丹帝国统治的范围南方仅限沿着长城的北京和大同一带，但到了公元12世纪，女真人的金帝国（公元1115至1234年）取代契丹帝国，从宋朝夺取了淮河以北的华北地区。之后，与金帝国同盟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国，他的儿子窝阔台汗灭了金帝国。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元世祖）则灭了留在华中与华南地区的南宋（公元1127至1276年）。就像这样，中央欧亚草原自六世纪以来，由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帝国不断成长，终于到了公元13世纪，完全吞没了隋唐以来的中国世界。

由忽必烈汗所建立的元朝，各代大汗当然都有自己属于中央欧亚草原帝国的自觉。他们热衷于编纂历史书，于公元1345年完成了《辽史》《金史》《宋史》三种汉文的“正史”。三本历史书当中各自都列有“本纪”。宋朝是中国的王朝，但辽和金属于中央欧亚地区的帝国。在三本历史书中分别列“本纪”，代表了蒙古人认为与继承隋唐以来中

国“正统”的宋朝并列，中央欧亚也拥有独自的“正统”，从辽传给金再传给蒙古。将历史舞台从中国向外扩展，把中央欧亚地区也列入“正史”的对象，这是因为蒙古人才得以完成的事情。

然后，之后的发展却不尽如人意。公元 1368 年，忽必烈家族的元朝从中原退回蒙古高原，取而代之的是汉人的明朝（公元 1368 至 1644 年）。相较于蒙古人的元帝国统治了亚洲的东半部，政权中原的明朝其统治范围十分狭隘，几乎只有中国长城以南的地区。明朝以汉文编纂《元史》，记述蒙古人的历史，在建国隔年的公元 1370 年便完成。

《元史》记述的年代从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开始，直到公元 1370 年乌哈噶图汗（元朝庙号为惠宗，明朝谥号为顺皇帝）死在内蒙古为止。原本公元 13 世纪至 14 世纪，统治东从日本海、黄海、东海，西至黑海、地中海广大领土的蒙古帝国都应该是记述的对象，然而实际上，《元史》是根据元朝的宫廷记录编纂，关于公元 1260 年忽必烈汗即位之前的记述并不详细。结果，《元史》正如其名，仅是记述蒙古帝国中元朝部分的“正史”。

元朝是整合东亚多数地区的大帝国，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蒙古高原，中原不过是元朝的殖民地之一。为了有效统治中原地区，元朝将行政中心设在大都（北京），所有统治中原的相关文书都在这里。另一方面，统治中原以外地区的相关文书则在内蒙古的上都。公元 1358 年，红巾军攻陷内蒙古的

上都时，相关文献几乎全部被烧毁或遗失。因此，《元史》的内容只有在中原发生的事件，几乎没有提及在蒙古高原、满洲、西藏、中亚所发生的事。结果，《元史》依旧跳不出《史记》《汉书》仅以中国为对象的传统“正史”框架。元朝就好像是蒙古人进入到中原建立王朝（所谓的“征服王朝”）一般，经常被人误解，这是受到《元史》的影响。

元朝并非在公元1368年失去中原领土后就灭亡。蒙古人绝不承认明朝的皇帝为“正统”。在中央欧亚地区各处都可以看到成吉思汗的王家子孙们，在蒙古高原上称号元朝（北元），王朝一直持续到公元17世纪，直到末代可汗的遗孤向满洲人的君主投降，蒙古帝国的统治权才移交到清朝（公元1636至1912年）手里。清朝统一了比过去元朝还要广大的地区，成为了统治欧亚大陆东半部的大帝国。最后一本“正史”的《明史》便是由清朝编纂。

清朝于公元1644年征服中原，《明史》是在九十年后的公元1735年完成。《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为明朝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所写的“实录”，而负责编纂《明史》工作的人，同样是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僚。为此，《明史》的内容轻忽了实际掌握明朝实权的军人和宦官，倾向强调甚至夸大文人官僚的功绩。

话说如此，清朝不愧是继承元朝的“正统”，因为《明史》将明政权与蒙古政权的关系列入《外国列传》，以“鞑靼”为题。开宗明义写道“鞑靼即蒙古，故元后也”。清楚

指出蒙古是元朝的后裔，在中国人的历史学中等于承认了蒙古的“正统”。由于明朝是中原政权，因此《明史》也必须是以华夏为中心的“正史”。

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正史”，从最初到最后都是中国世界的“正统”历史。在历史的舞台超出中国范围的时代，“正史”的框架多少有扩展，但基本上几乎没有改变。中国的历史是停滞的历史，因此经常有人误解，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到清宣统帝宣布退位为止，中国世界的特征以及中国人这个民族的实体几乎看不到称得上是变化的变化。然而事实上，不变的是“正史”的框架与表现手法，中国的实体随着时代不断变化。

如果想要将中国史列入世界史之中，创造出真正的世界史，那么就不能再被“正史”所迷惑，是时候正视不在“正史”框架内的现实。为此必须重新审视一直以来强烈影响中国世界的中央欧亚世界的历史，从这个角度重新排列组合出真正合逻辑的中国史。

编注1 《汉书·元帝纪》：“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第4章 创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

草原的游牧民族

地中海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书中第一卷记载了波斯王朝首代君主居鲁士远征马萨革泰的故事。这是关于中央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最古老的记录。

根据记载，居鲁士王在征服新巴比伦帝国（公元前 539 年）之后，下一个目标便是马萨革泰人。马萨革泰人居住在里海之东，阿拉斯河（伏尔加河）的广大平原（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占地广、人口多，是非常勇猛的民族，被认为与黑海北方的斯基泰人同族。

希罗多德介绍马萨革泰人的风俗如下。

马萨革泰人的服装与斯基泰人非常相似，生活样式也相同。打仗的时候有时会使用马，有时不会。他们同时拥有骑兵和步兵。他们另外还有弓箭兵和枪矛兵，战斗时习惯使用两刃斧。无论

什么兵器都用金和青铜制造。矛头、箭头、战斧主要使用青铜制造，头饰、腰带、束腹等则主要使用金装饰。马也一样，除了保护马胸的马铠‘当胸’是用青铜制造之外，马辔、马衔、额饰等皆为金制。完全不使用铁或银。这是因为这个国家拥有无尽的金和青铜资源，但完全不出产铁和银。

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如下。男子一人可娶一位妻子，但男子们共用彼此的妻子。马萨革泰的男子只要对一个女子有肉体上的欲望，便会将自己的箭簇挂在女子住的马车前，肆无忌惮地与女子交欢。

这个国家虽然没有年龄的限制，但如果男子活到非常高龄，亲戚一族便会聚集在一起将男子杀掉，同时杀一只家畜，一同烹煮来吃，这被认为是最幸福的事。他们不吃病死之人的肉，而是将他们埋在土里。不能健康活到被杀的高龄，被认为是非常不幸的事。

马萨革泰人完全不农耕，而是吃家畜和鱼过活。在阿拉斯河可以捕获大量的鱼。另外他们也不喝乳以外的饮料。

马萨革泰人敬拜的神只有太阳神，他们会杀马祭太阳神。会这样做是因为要用世上跑得最快

的动物来祭拜天上跑得最快的神。

公元前 529 年，居鲁士王率兵进攻勇猛的马萨革泰人，被托米丽司女王率领的军队击败战死。

从希罗多德的记述当中可以清楚看出马萨革泰人是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不住在固定的房屋当中而是住在马车上，方便迁徙。完全不农耕，过着畜牧生活。丈夫不能独占妻子代表了女性的自主性强，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男子，这也是游牧民族社会的特征。另外，包括重视马、擅骑马以及使用黄金和青铜制的武器、饰品、马具等，这些都是古时代游牧民族的文化。接下来还会详加说明，东从蒙古高原，西至黑海北方，这些文化普及在广大中央欧亚草原的每一个角落。

到了公元前 513 年，第三代波斯王大流士一世率军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伊斯特尔河（多瑙河），进攻黑海北方斯基泰人的国家，但不敌斯基泰人的游击战，最终宣告失败。希罗多德将这段征战记载在《历史》第四卷中，当中另外详细记载了斯基泰人的风俗。

根据记载，这个时代的斯基泰人，他们的居住地西从伊斯特尔河（多瑙河），东至塔奈斯河（顿河），也就是从现在的罗马尼亚至摩尔多瓦、乌克兰、北高加索一带。斯基泰人是亚洲最早的游牧民族，但不敌马萨革泰人的侵扰，于是渡阿拉斯河（伏尔加河），移居黑海北岸。原本住在这

里的辛梅里安人面对大举来袭的斯基泰人，向南逃亡，进到了亚洲（现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安纳托利亚半岛），移居黑海南岸的锡诺普半岛。斯基泰人跟着辛梅里安人的脚步，经高加索南下，入侵米底亚（伊朗高原），统治了二十八年之后，退回了黑海北岸。这是公元前8世纪末的事。

根据斯基泰人的传说，从前有三兄弟，有一天从天上掉下了黄金制的锄头、轭、战斧以及酒杯。老大第一个发现这些宝物，准备接近取走宝物的时候，黄金突然起火。老大离开后，换老二接近宝物，结果发生同样的事情。就像这样，黄金起火让老大和老二都无法靠近，但不可思议的是，当老三接近时，黄金的火瞬间熄灭，老三便将宝物带回家。老大和老二看到这样的情形，同意将王权让给老三。

这三兄弟是不同部族的祖先，老三的子孙便是斯基泰人的王族。历代君王小心翼翼地保管那些黄金制的宝物，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祭典，向供奉神明一般祭祀这些宝物。传说在祭典的时候，负责在郊外捧着这些黄金宝物的人如果不小心睡着了，那么他在一年之内必死无疑。也正因为责任重大，担任这个角色的人会被赐予马匹奔跑一日可以到达的范围的广大土地。

斯基泰人的君主死后，斯基泰人会将遗体涂满蜡，剖开肚子取出内脏，塞满香草后再重新缝合。遗体在绕行统治各国一圈之后，沿着现在的第聂伯河中游，运进王陵。

王陵中有一个四角形的大洞穴，地上铺着草席，遗体就被安置在这里。遗体两旁会插上枪矛，上面再铺上树枝和稻草。王陵内还会绞杀君主的一位妾室陪葬，并选出奉酒、料理、马佚、随从、传话等侍臣、马匹、其他各式物品以及黄金的酒杯一同埋葬。绝对不使用银或青铜制的酒杯。最后再在墓穴上面建造巨大的墓塚。

一年过后，再从过世君王的侍臣当中选出与君王最亲近的五十人和最优秀的马五十四，绞杀后清除内脏，塞入米糠后重新缝合。另外再用粗棒穿过马的身体，两端架在用半个车轮所做的支架上，使马的四肢悬空。套上马具，将缰绳套在前方的木头上。五十四马背上放上五十具侍臣的遗骸，用棒子沿着背骨穿过颈部，插在下方马身上的粗棒上。这些已死的骑士被放在王陵附近。

从上列的记述中可以清楚看出，斯基泰人与马萨革泰人相同，喜好黄金与青铜器，是擅长骑马的游牧民族。关于斯基泰人，希罗多德曾说过这样的话。

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他们的人。另外，除非他们被敌人发现，否则无论是谁都抓不住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建造任何的城市或要塞，骑上马就可以移动，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们非常善于弓箭，生活不仰赖农耕而是靠家畜。他们住在靠猛兽拖拉的车上。这样的民族，不要说战胜

他们了，就连与他们接触都十分困难。

中央欧亚草原之道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斯基泰人国东境塔奈斯河（顿河）的东方住着不隶属斯基泰国王统治的别种斯基泰人。到塔奈斯河为止的地区土壤肥沃，土地平坦，但往东却是充满小石和岩石的不毛之地。过了这个不毛之地就到达了高山（乌拉尔山脉）的山脚，这里住着阿尔吉帕人。这个种族的人无论男女，一生下来就是秃头。狮子鼻、宽下颚，服装虽属斯基泰风格，但说着独自的语言，以坚果为食。他们夏天住在树荫下，冬天则在树下盖毛毡取暖。

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也曾经造访过阿尔吉帕人的国度。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再往东还住着伊塞顿人。

正如之前所述，斯基泰人是遭到马萨革泰人的攻击移居黑海北方。但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斯基泰人之所以会迁移，不是受到马萨格泰人的攻击，而是受到伊塞顿人的攻击。

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有一个名为亚里斯提的希腊人，在他所做的叙事诗（《阿里玛斯庇亚》（Arimaspea））中写到，自己受到阿波罗神的召唤，前往伊塞顿人的国度。伊塞顿人的邻近住着独眼的阿里玛斯普人，附近还有一群守

着黄金的狮鹫兽，再过去则住着希柏里尔人（意指“在北风之外的人们”），再过去就是海。除了许珀耳玻瑞亚人之外，包括阿里玛斯普人在内的各个种族，都不断攻击附近邻族。伊塞顿人被阿里玛斯普人赶走，斯基泰人又被伊塞顿人赶走，而住在南方海（黑海）的辛梅里安人又受到斯基泰人的压迫而移居他处。

根据斯基泰人的传说，伊塞顿人的风俗习惯如下：一家的父亲如果死亡，亲戚们会带着家畜聚集在一起。他们将家畜的肉剁碎，混着死亡父亲的肉，烹调之后用来宴客。将死者的头除去毛发，经过整理后，铺上金箔，将人头当作祭拜物。他们每年都会举办盛大的祭典祭拜。在这个国家，男女拥有同等的权利。

伊塞顿人再过去住着独眼的阿里玛斯普人以及有一群守着黄金的狮鹫兽，这段记述是斯基泰人从伊塞顿人那里听来，又传给了希腊人。希罗多德指出，斯基泰语中的“阿里玛”代表“单一”，而“斯普”代表“眼睛”。

从希罗多德的记述当中可以看出伊塞顿人和马萨革泰人十分相似。伊塞顿人的居住地是乌拉尔山脉东方，马萨革泰人则是伏尔加河东方，两者皆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将死者的肉与家畜的肉混合食用的部分也相同，且女性的权利大这一点也一样。可见这是同一个种族的情报经由不同的途径传到希腊人耳里。“伊斯顿”是斯基泰语的称呼，而“马萨革泰”则是“波斯语”的称呼。

亚里斯提所说“攻击伊塞顿人，将他们赶到哈萨克斯坦草原”的独眼阿里玛斯普人，他们是哈萨克斯坦草原东方准噶尔盆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半部）的游牧民族。从这里再往东，越过阿尔泰山脉便是蒙古高原。

阿尔泰山脉便是守着黄金的狮鹫兽所居住的地方。黄金在突厥语中称“Altun”，蒙古语中称“Altan”。而中国史书《后汉书》，在关于公元91年的战争记述中称阿尔泰山脉为“金微山”，这座山的名称与“黄金”非常有缘分。

既然如此，狮鹫兽再过去的许珀耳玻瑞亚人也必定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而“许珀耳玻瑞亚人的居住地再过去就是海”的这个记述，斯普所谓的“海”指的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贝加尔湖。贝加尔湖在中国司马迁的《史记》中被称作“北海”。

亚里斯提的叙事诗《阿里玛斯匹亚》，原文现在已经失传，但由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引用了部分字句，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贝加尔湖向西，经过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直到乌克兰的中央欧亚草原之道在公元前8世纪就已经开通，游牧民族经由这条草原之道向西方迁徙。像这样的游牧民族西移，在之后的各个时代中也不断发生。

印欧人

其实，游牧民族经由草原之道的迁徙并非公元前8世纪初才开始的事。现在的欧洲大陆全境、西南亚的伊朗高原、南亚的印亚大陆的大部分都住着说印亚语族的人，而这些人原本住在中央欧亚内部的某个地方。他们是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便从原本的居住地向西或向南迁徙。到了公元前1000年初，西台人进入到了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建立了古王国，而西台人留下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印欧语记录。

与西台人同一时期在欧洲，希腊人从巴尔干半岛南下，定居在现在的希腊。希腊语当然也属于印欧语系。在希腊北方，从多瑙河向西、阿尔卑斯山脉向北到比里牛斯山北方，住着说印欧语的凯尔特人。然而在现在的欧洲，只有在最西端的部分还保留凯尔特语（爱尔兰的盖尔语、不列颠群岛的威尔斯语、布列塔尼半岛的布列塔尼语），中央欧洲、西欧等过去的凯尔特语地带，被后来的日耳曼语（德语、英语）和罗曼语（法语）所占领。另外，凯尔特人在领先所有印欧人进入欧洲之前，欧洲就已经有人住了，这些人的语言是现在保留在比利牛斯山中的巴斯克语。

在凯尔特人进入西欧的大约同一个时期，同样说印欧语的雅利安人南下进入了印亚大陆北部，消灭了说达罗毗

茶语、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等城市。达罗毗荼人的语言成为将来吠陀语、梵语等印度语系的祖先。

在这样大规模的迁徙之前，印欧人原本的居住地到底在哪里？至今尚未确定。然而，有一个名为吐火罗语的语言，它与西台语的特征最为接近，在与中国南北朝、隋、唐同期的公元6至8世纪时，住在塔里木盆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南半部）绿洲城市的人使用的就是吐火罗语。吐火罗语之后被突厥语取代，消失了踪影，但在绿洲城市发现了许多以吐火罗语书写的资料。留下吐火罗语资料的虽然是新的时代，但从古代的印欧语可以留到后世这一点来看，最初使用印欧语的人们应该就是这一带的原住民。他们应该是从塔里木盆地向北越过天山山脉，属于准噶尔盆地的草原游牧民族。如前所述，准噶尔盆地在公元前8世纪被独眼的阿里玛斯普人从东方入侵，将原本居住在这里的伊塞顿人赶到了西方的哈萨克斯坦草原。

回到之前的话题，斯基泰人的王国统治从顿河到多瑙河的广大草原，维持了将近一千年的繁荣，到了公元3世纪中，被从西北方入侵的日耳曼族的哥德人所灭。哥德人以德涅斯特河为境，分成东西两个王国。东哥德王国统治从德涅斯特河至顿河为止的领土，而西哥德王国的领土则是从德涅斯特河至多瑙河为止。

到了公元370年，名为匈奴的游牧民族从东方经由中央

欧亚草原之道入侵，首先征服了北高加索的奄蔡人（今北奥塞梯共和国的奥塞梯人），接着渡顿河征服了东哥德人，掌握了黑海以北的草原。公元 375 年，西哥德人渡多瑙河，逃往罗马帝国的领地。日耳曼人的大迁徙也从此开始。引起日耳曼人大迁徙、改变欧洲命运的匈奴是从遥远东方的蒙古高原迁移而来的。讲到这里，暂且离开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转向中国世界的历史。

匈奴帝国的出现

如同第 3 章所述，从司马迁《史记》的《本纪》中可以看出，夏人属于拥有东南亚文化的种族（东夷），沿着内陆的水路而来，在河南的黄河流域中游建造了东亚最古老的城市国家。这是公元前 21 世纪前半期的事，他们的文化成为后世中国文明的基础。

征服夏人城市的是公元前 21 世纪中期，从北方入侵的狩猎民族（北狄）殷人。从与黄河中游北岸连接的山西高原一直到山西高原以北的内蒙古东部为止，古时候是枫树、椴树、桦树、红松、槲树、核桃树、榆树茂密生长的森林地带，这片森林向东北延伸，与满洲、西伯利亚的森林连接。殷人原本就居住在这片森林之中。

而征服殷人城市的是公元前 21 世纪末期，从西方草原入侵的游牧民族（西戎）周人。周人与其同盟部族统治了

华北黄河流域平原的众多城市，城廓内混杂了东夷、北狄以及西戎人。另一方面，出身山地农耕民族（南蛮）的楚人在华中的湖北建立王国，统治长江、淮河流域，与华北各国相互竞争。最后，到了公元前3世纪，西北西戎出身的秦国相继征服了华北与华中的城市国家，于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秦王嬴政（秦始皇）首度采用皇帝的称号。这是中国世界以及中国世界皇帝制度的开端。

就像这样，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操控中国过去城市国家时代的人都是从中央欧亚地区反复入侵的狩猎民族或游牧民族。他们所带进的中央欧亚文化，与基础的东南亚文化交叠，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同时，形成了中国文明。若没有中央欧亚的刺激，黄河流域的城市国家是无法成长的，中国文明也不可能成立。

在中央欧亚力量的推动之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统一帝国，在此同时，中央欧亚本身也出现了最初的草原游牧帝国，那就是匈奴。

根据中国世界“历史之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匈奴列传》篇的记载，匈奴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家畜当中最多的是马、牛、羊，比较少见的则有骆驼、驴马以及骡马等，为了寻找水与草而不断迁徙。虽然没有城市、固定的房子或是农耕地，但各自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文字少，多半

用口头传递命令。儿童也擅长骑羊，会用弓射鸟或鼠。稍微长大一点之后，便会猎狐和兔来吃。力量大到可以把弓拉断的人，都成为骑兵。太平时照顾家畜，猎取鸟兽为生。战时每一个人都是战士，随着出征，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远距离战使用的武器是弓和箭，近距离战使用的武器则是刀和枪。战况对己有利时勇往直前，不利时则向后退兵，他们不以遁逃为耻。从君主起，所有人都吃家畜的肉，穿家畜的皮，盖毛毡或毛皮。壮年者吃的是肥美的肉，老人则吃剩下的部分。壮年且力强者受人尊敬，老年且力弱者则受人轻蔑。父亲死后，儿子与继母结婚。兄弟死后，其他兄弟与寡妇结婚。习惯上可以直呼名讳，没有姓也没有字。（编注2 参见一一九页）

匈奴君主的称号为“单于”。冒顿单于首度统一蒙古高原是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后、项羽和刘邦（汉高祖）二分天下相互竞争的时期。冒顿单于的势力日益茁壮，拥有战士三十万余人。

冒顿单于建立的匈奴帝国是众多游牧民族部族的联盟。根据司马迁的记述，单于之下是左贤王与右贤王，之下是二十四个部族首领。部族首领之下各有骑兵，多则一万，少则数千人，被称为“万骑”（万人队长），这些大臣的地

位皆为世袭。部族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呼衍氏族和兰氏族，接下来是须卜氏族。这些部族首领分为左方和右方，左方的部族首领住在蒙古高原的东部，主掌北京以东，满洲和朝鲜半岛方面的前线。右方的部族首领则住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主掌陕西以西，中亚方面的前线。单于的营帐位于中央位置，与山西前线相望。单于以下的大臣都有各自的土地，在范围之内迁徙寻找水和草。二十四个部族首领之下有千长（千人队长）、百长（百人队长）、什长（十人队长）等不同官职。

每到阴历正月，单于的营帐中便会举行小规模的庆祝仪式。在夏季的阴历五月，会在名为“龙城”的地方举行集会，祭拜祖先与天地诸神。到了秋高马肥之时，会在名为“带林”的地方举行集会，统计人口和家畜的数量。战争时，斩杀有位阶的敌军者可以获得战利品，战俘成为俘虏者的奴隶。为此，战争时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深入敌军诱敌也在所不辞。发现敌军时，为求己利的人就好像乌鸦一般蜂拥而至，等到情势不利之时，所有人又会立刻消失地无影无踪。在战场上处理战死者尸体者，死者的所有财产皆可归为已有。

司马迁所描写的匈奴风俗，与千百年后的蒙古人一模一样。不仅是风俗习惯，就连东翼掌管东方、西翼掌管西方，以及身分地位从万人队长以下至十人队长为止，采取十进法的匈奴帝国制度，都被之后历代的游牧帝国所继承，

成为一项传统。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也相同，东方的部族由左翼的万人队长指挥，而西方的部族由右翼的万人队长指挥。部族首长被称为千人队长。下面各设百人队长和十人队长。

匈奴帝国面对中国的汉朝，在军事实力上一直处于优势。公元前200年发生了最初的冲突，汉高祖在大同东方一个名为白登的地方被冒顿单于的大军包围，最后是因为赠送厚礼给单于的皇后，才得以脱困。以此为契机，匈奴与汉朝之间开始和亲，约定长城以北的游牧民族归属于单于，以南的住民则归属于汉朝皇帝。汉朝把皇族女儿嫁给单于，每年还固定赠与匈奴丝织品、酒、米、食物等，单于与皇帝成了兄弟。像这样将中国皇家的女儿嫁给匈奴和亲、每年赠送物资，以及君主间的兄弟之交一直持续到公元13世纪，游牧民族与政权中原的和亲关系成了惯例。

公元前176年，冒顿单于写了一封信给汉文帝，通知汉朝他们击败了西方名为月氏的民族，掌控了天山山脉北边准噶尔盆地的游牧民族和南边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正如希罗多德所述，游牧民族再度从蒙古高原经过草原之道向西迁徙。

游牧帝国的理论

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在统一之后就立即开始征战有其

特殊的理由。游牧民族原本的生活形态，在平时没有团结的必要。一年的降雨量少，草的生长状况也不是很好，因此如果定居在一个地方，家畜马上就会把那里的草吃完，让他们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为此，游牧民族从春天嫩草刚长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迁徙，一路上让家畜吃草，从夏天到秋天慢慢在草原上迁徙。等到冬天便会向南移到山谷里，躲避寒冷的北风。像这样一边迁徙一边畜牧便称作游牧。虽说是迁徙，但并不是漫无目的地随便走动。他们多半有固定的越冬营地和避暑营地，一般而言是往返于两地之间。

这是游牧生活的特征，如果人口集中在一地，那么草量便会不足，无法饲养足够的家畜过活，因此一起游牧的最多也只有几个家庭。换句话说，游牧民族不需要大型的组织或社会整合便可以生活，只要有家畜就足够了。也因此，独立自主的游牧民族爱好自由，自视甚高。另一方面，农耕民因为必须共同插秧、灌溉、收割，因此必须屈就于组织之下，两者之间非常不同。

让游牧民族团结的契机是与农耕民的交易。人类所需的营养不仅仅是肉类和乳制品，也需要能量来源的糖类。然而，干燥的蒙古高原不适合农耕，无法取得谷物。另外，也因为不适合养蚕，无法取得用来做衣服的丝织品。为此，在游牧地带与农耕地带的交界开始了交易，游牧民族首先带来的交易品是马。

马可以用来拉战车或让骑兵乘用，对军队来说非常重

要，然而华北平原既没有养马，也没有繁殖马匹的环境。因此，无论是中国以前的城市国家或是统一后的中国，每年都必须从蒙古高原引进马匹。另外，食盐也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在华北平原很难取得。另一方面，蒙古高原上有许多盐湖，可以取得大量优质的食盐。其他包括毛皮、羊皮、羊毛、皮革制品等都是蒙古高原的特产，游牧民族将这些东西运到农耕地带，交换必需的谷物和丝织品。

这样的交易如果能够一直和平顺利进行，游牧民族以家庭为单位，可以各自过着独立自由的日子。然而，只要中原出现强大的统一帝国，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边境贸易是中原皇帝管辖的范围，无论在哪一个市场，商品的价格都必须相同。而且，游牧地带的物品便宜，但农耕地带的物品价格受到控制，居高不下，这对游牧民族而言十分不利。如果游牧民族对于不正当的削价行为有所抵抗，中原就会停止供给生活必需品。就算被逼迫诉诸武力，以游牧民族的现况，完全不是中原军力的对手。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游牧民族必须团结，为向中原交涉或战争做出准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后，蒙古高原马上就出现了匈奴最初的游牧政权，正是因为他们必须对抗中原，以冒顿单于为中心的游牧民族团结后的结果。然而，游牧政权的本质是部族的联盟。联盟的核心是在单于军旗之下奔走的亲卫军，他们同时也是单于的宫殿、游牧政权的中央政府。就像这样，单于的身边总是聚集了

许多人，为了养活这些人，聚集了更多的家畜。这么多人和家畜全部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给家畜吃的草当然也就不够。为了弥补不足，必须从农耕地带获取大量的谷物。

再加上人们既然追随了君主，当然期待君主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丰衣足食，君主向追随自己的游牧民族征收财物是不可能的事。相反地，君主必须靠自己的能力从外面找来财物，并将这些财物分给大家。如果无法做到，那么就没有资格当游牧民族的君主。这一点从匈奴的单于开始到蒙古的可汗为止都没有改变。得到可以分给人民的财物，最快的方式便是以军事实力威胁中原政权提供经济援助，如果还是不够，那么便入侵中原政权边境掠夺。不顾与汉朝的和亲关系，匈奴从公元前 166 年起数度大规模入侵汉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对于匈奴的入侵，汉朝完全束手无策。到了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即位，虽然数度派遣大军前往蒙古高原讨伐匈奴，但只是为汉朝带来莫大的死伤，并没有实质的效果，无法逼迫匈奴的单于向汉朝皇帝称臣。这是因为，游牧民族的军队全都是骑兵，移动的速度非常快，而农耕民出身的军队大多为步兵，行军的速度慢，无法准确掌握敌军的踪迹。再加上农耕民出身的军队，他们的主食是谷物，在草原地带无法取得。因此，在主力部队的进军路上，必须事先用牛车队搬运大量的粮食到各个要点。这些没有防备的运输部队，成为了敌军最佳的攻击目标。因此，在蒙古高原上

的战争，人数少的游牧民族却往往比农耕民出身的大军更能占据有利的地位。

到了公元前1世纪中期，为了争夺单于之位，匈奴发生内乱，一方的呼韩邪单于与汉朝结盟，于公元前51年前往长安（西安）拜访皇帝，受到了至高无上的礼遇。游牧帝国的君主自动前往拜访中原皇帝是因为匈奴内部的分裂，才会发生这样史无前例的事。

呼韩邪单于于公元前33年第三次拜访长安，当时的汉元帝将贵族的女儿王昭君嫁给了单于。王昭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氏的亲族，也就是二十五年后夺取汉朝皇位的王莽一族。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结婚后产下一子，呼韩邪单于死后与下一位单于再婚，生下了两个女儿。

至此为止，匈奴的单于与汉朝的皇帝属于对等的关系，等到王莽篡汉后，蛮横地单方面将单于当作中国的地方行政官对待。王莽的立场是，根据儒教教义，单于属于皇帝的臣下。当然和亲也告吹，匈奴连年入侵中原政权，兵扰北方边境。王莽为了讨伐匈奴召集大军，此举反而引起国内的叛乱。公元23年，王莽灭亡。国内的叛乱也严重打击了中原。根据公元2年的统计，当时人口达59594978人，也就是大约六千万人，但王莽时代的内乱让人口减半，王莽灭亡后持续的内乱让人口再度减半。东汉光武帝于公元37年重新统一中国时，人口仅剩一千五百万。光武帝过世的公元57年，人口数虽有恢复，但仍是半世纪前的三分之

一，仅有 21001820 人。

同一时期，匈奴内部再度发生纷争，以戈壁为境，分裂成外蒙古的北匈奴和内蒙古的南匈奴。南匈奴与东汉结盟，沿着长城游牧，单于则住在黄河河曲的南侧，接受东汉驻扎军队的护卫。

到了公元 1 世纪末，别的游牧民族鲜卑族从东入侵外蒙古，于公元 87 年杀了北匈奴的单于。趁此机会，东汉与南匈奴的联军于公元 89 至 91 年向外蒙古进军镇压，在“金微山”（阿尔泰山脉）击败了向西逃的北匈奴单于。北匈奴单于逃亡，不知去向，据推测应该是从准噶尔盆地向哈萨克斯坦草原方面逃亡。外蒙古被移居而来的鲜卑族占据，留在北匈奴的十万多家族，全部改称自己为鲜卑人。

另一方面，东汉朝社会繁荣富裕，在公元 156 年的统计中，人口超过五千万人，宗教秘密结社的革命思想以城市为中心，流行在下层阶级中，终于到了公元 184 年，全国爆发了“黄巾之乱”。反叛军虽然立即被镇压，但政府军的将军们为了争夺政权引发了内战，东汉政府实质上已经消亡。内战持续半世纪的结果：中国的人口从原本的五千多万锐减至四百多万人，华北平原的住民几乎灭绝。存活下来的中原人之中，有二百多万人被魏王曹操集中到了河南地方。一百数十万人在东吴孙权的统治下，集中在湖北武汉和江苏的南京等地。剩下不到百万人则在蜀汉刘备的统治下，集中在四川的成都盆地，这就是三国时代中原的状况。

由于人口锐减，魏王曹操为了补足人手，积极将乌桓（乌丸）、鲜卑、南匈奴等游牧民族迁移到无人的中原内地。南匈奴从内蒙古被迁移到了山西高原。终于，魏、蜀、吴三国在公元280年被晋统一，中国也终于在分裂百年后重新恢复统一，但仅仅二十年的时间，皇族将军的内战“八王之乱”让中原再度陷入混乱。

公元304年，山西的南匈奴趁乱宣布独立，其他的游牧民族也跟着在华北各地揭竿谋反，开始了持续一百三十五年的五胡十六国之乱。南匈奴军于公元311年占领洛阳，俘虏了晋朝皇帝。接着又在公元316年占领长安，俘虏了下一个皇帝。到隔年公元317年的一年间，中国没有皇帝。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当上最初的皇帝开始，直到公元1912年清宣统帝宣布退位为止的二千一百三十二年间，只有空前绝后的公元317年，中国没有任何一位皇帝。

匈人的出现

匈人现身哈萨克斯坦草原，横渡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黑海北方草原，征服东哥德王国，正是中国发生五胡十六国之乱的公元370前后。匈人也就是匈奴人，自从北匈奴的单于在阿尔泰山脉被击败、消失踪影，一直到匈人出现在北高加索山，这中间经历了二百八十年的时间。另外，从南匈奴与东汉结盟，一直到南匈奴灭晋朝为止，经历了

二百六十六年，两者的时间长短大致相同。

公元 434 年，匈人的卢阿王死后，由他的外甥贝里达和阿提拉继承大业。东罗马帝国的狄奥多西皇帝每年支付兄弟七百磅的黄金，换取边境片刻的和平。匈人于是将活动方向西移，于公元 436 年消灭了莱茵河畔由沃尔姆斯的日耳曼人所建立的勃艮第王国。这场战役在日耳曼人间流传，成为著名中世纪中古高地德语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的主题。

公元 444 年左右，贝里达被杀，阿提拉成为了所有匈人的君主。阿提拉曾一度入侵西罗马帝国的高卢，两度入侵意大利，但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果，于公元 453 年骤逝。阿提拉死后的公元 455 年，日耳曼部族格皮德人的阿尔达里克王击败了匈人，杀了三万人。阿拉提的长子埃拉克也战死。此战之后，匈人在多瑙河方面的势力被消灭，但黑海北方的匈人在阿提拉幼子邓吉西克的率领之下存活了下来。两世纪后的公元 680 年，邓吉西克的子孙阿斯巴鲁赫率领保加尔人进入巴尔干半岛，建立了保加利亚。

就像这样，匈人从东方入侵的结果，在欧洲引起了日耳曼人的大迁徙。西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各部族的践踏，阿提拉的重臣，也就是日耳曼人的埃迪古，他的儿子奥多亚塞曾是罗马帝国的佣兵，于公元 476 年罢黜西罗马帝国的罗慕路斯·小奥古斯都皇帝。这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欧洲的古代也在此画上句点，开启了中世纪。

罗马“帝国”的虚构

在这里要做出声明。虽然使用了“罗马皇帝”或是“罗马帝国”这样的字眼，但事实上，罗马并不存在皇帝，因此也从来不曾是一个帝国。

所谓“罗马帝国”的正式名称在拉丁语中称“*res publica*”，意指“元老院与民众的共有财产”。“*res publica*”是英语“*republic*”和法语“*république*”的语源，这个词汇是从公元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起，才从原本的“王国”转变成“共和国”的意思。

另外，在“*res publica*”，以实力掌权的“奥古斯都”们，他们正式的资格仅是“元老院的首席议员”。因为中国没有元老院，所以才以中国式的思维，将“奥古斯都”翻译成“皇帝”，这其实是错误的。罗马的“*provincia*”（行省）有些属于元老院，有些则属于奥古斯都的管辖范围。两者加起来才是“*res publica*”，也就是所谓的罗马“帝国”。

日语的“帝国”是英语“*empire*”和法语“*empire*”的翻译语，两者皆是从拉丁语的“*imperium*”演变而来。“*imperium*”在拉丁语中含有“命令权”之意。罗马人的官吏，根据其地位的不同，发号施令的权限也不同，这就是“*imperium*”。也就是说，每一个官吏就是一个“*imperium*”，罗

马“帝国”中的“imperium”相当于官吏的数量。“imperium”要到公元14世纪初才开始被当作“帝国”之意使用，而且当时指的是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

另外，英语的“emperor”和法语的“empereur”，在日本被翻译成“皇帝”，两者皆是从拉丁语的“imperator”演变而来，意指“发号施令的人”。然而，在罗马时代，“imperator”并非奥古斯都的称号，而是抵抗外敌获胜的将军们受部下推崇的非正式称号，且将军们“imperator”的称号，也只能用到回罗马举行凯旋仪式为止。

因此，罗马“帝国”与罗马“皇帝”两者皆是错误的翻译，这是在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将中国史的知识套在西洋史上，试图了解西洋史之下的产物。这样错误的翻译，一直到现在都留有不好的影响，让日本人对世界史产生误解。

回归正题，公元476年之后罗马的小奥古斯都遭到罢黜，在西欧属于罗马人的时代也随之完结，开始了日耳曼人的时代。这是历史主角的交替，同时也代表了历史舞台从地中海世界扩展到了西欧世界。在这个层面上，古代的地中海世界与中世纪的西欧世界并不具有连贯性，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划分，而这个划分是由从中央欧亚草原入侵的匈奴人所引起的。换句话说，创造西欧世界的是草原的游牧民族。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东方的中国世界。匈奴于公元316

年一度中断了中国皇帝的“正统”。有皇帝才有中国，因此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第一阶段在五百多年后结束。

第二阶段的中国——鲜卑

中断中国皇帝“正统”的匈奴，与引起了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结束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匈奴是同一种族的人。另外，取代罗马人成为西欧世界主角的日耳曼人，相当于中国世界的鲜卑人。鲜卑人一开始平定了五胡十六国之乱，统一华北，之后又统一了南北朝，开启了第二阶段全新的中国。

王沈（？至公元 226 年）于公元 3 世纪中叶所写的《魏书》现在虽然已经失传，但陈寿的《三国志》引用了《魏书》中有关乌丸（乌桓）与鲜卑族的记述，在注解中可以看到部分内容。根据记载，乌丸和鲜卑都是蒙古高原东方大兴安岭山脉方向的游牧民族。中国人最先知道的是靠南的乌丸，这是在公元前 1 世纪前半叶的事情。至于靠北的鲜卑则要到公元 1 世纪中叶，中国人才知道他们的存在。根据王沈的说法，乌丸与鲜卑的语言和习俗皆相同。

他们擅长骑马与射箭，为寻求水与车而游牧，没有一定的居所，以圆形屋檐的小屋（穹庐，也就是蒙古包）为家，入口一定朝东。平时狩猎鸟

兽，吃肉，喝乳酸饮料，以毛皮为衣。他们尊敬年轻人，轻视老年人。性格暴躁，一气起来会杀害父兄，但绝不会危害母亲。这是因为如果杀害母亲，母亲娘家的人有可能来寻仇，但肩负为父兄复仇义务的人，除了自己之外别无他人。部族当中具有勇气且强势，能够仲裁纠纷的人会被选为“大人”（领袖）。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长老，但并非世袭。数百或数千个部落是一个部族。大人下达召集令时，会在木头上刻纹为证，从一个部落传到另一个部落。虽然不是文书，但部族中没有一个人会违背命令。没有固定的姓氏，以优秀大人的名字为姓。大人之下，每个人都饲养自己的家畜，不会相互征收劳力。

他们成亲前会先恋爱，男子将女子夺走，经过半年或百日，透过中间人赠送马、牛、羊等当作聘礼。丈夫住进妻子的娘家，见到妻子家里的人，无论长幼尊卑，丈夫都要站起来行礼，对于自己的父母则不用行礼。丈夫在妻子家中过着男卑女尊的生活二年后，妻子的娘家会准备丰厚的嫁妆，将女儿送出门。住家和财产也都由妻子的娘家负责。为此，他们习惯所有的事情都遵从妇人的意见，只有在战争的时候，男子可以自行做主。无论是父与子或男与女，坐的时候都是面对

面跪坐。每一个人都会剃头，因为这样比较轻松。妇人在成亲的时候会将头发留长，分边绑成发髻，再戴上帽子，别上黄金或碧玉的饰品。父兄死后他们会与继母或兄嫂成亲。如果不跟兄嫂成亲，那么便要将自己的儿子给兄嫂当养子，对待兄嫂如同自己妻子的姐妹。然而女子死后，会回到最初的丈夫家。

生病的时候会点艾草，或是烧热石头给身体加温，又或是焚烧地面后躺在上面。他们也会用刀将患部切开放血，向天、地、山、川的诸神祈求帮助。没有针或药。他们尊敬战死者，会将遗体收棺。人刚死时他们虽然会哭泣，但在葬礼上会唱歌跳舞，送死者最后一程。他们会把狗养肥，用各种颜色的绳子套住，另外也会将死者生前骑的马、穿的衣服或用过的饰品一起烧给死者。祈求狗会护卫死者的灵魂回到赤山。赤山位于辽东（辽宁的辽阳）西北的数千里外，就像中国人认为死者的灵魂会回到泰山（山东的山）一般。葬礼当日的夜里，亲戚和友人会齐聚一堂，乘着犬或马拉的车绕过每一个人的座席，把肉丢给在唱歌或哭泣的人。两个人念着祝词，祈求死者的灵魂能够一路顺风，就算路上遇到困难，也能够不被其他的亡灵影响，平安到达赤山。他们信仰天上

诸神，祭拜天、地、日、月、星、山、川。另外，就算是以前的大人，或有名望的人，同样也是以牛、羊祭拜，祭拜完后会烧给死者。饮食前一定会奉上稻穗。

违背大人命令者会被判死罪，一再窃盗者也会被判死罪。对于杀人者，部落的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复仇。如果复仇又引起复仇，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就请大人仲裁。被裁定有罪的一方，要拿出自己的牛、羊等来赎死罪，停止复仇。杀害自己的父兄者无罪。对于大人发出逮捕令的逃亡者，没有任何一个部落会接纳他，会被流放到一个名为“雍狂”的地方。该地没有山，只有沙漠、流动的水和草木，还有许多蛇。“雍狂”位于丁令的西南方、乌孙的东北方（杭爱山脉与阿尔泰山脉间的盆地）。被流放者就在这里受尽折磨。（编注3 参见一一九页）

王沈所描写的乌丸和鲜卑属于同一种族的游牧民族。至于乌丸与鲜卑的区别，居住地离中原近，且先与东汉结盟的是乌丸，而居住地离中原远，且之后才与东汉结盟的则是鲜卑。乌丸在部族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就向内蒙古东部扩散，进到中原北边，成为了东汉的佣兵。公元207年，曹操征服乌丸，将他们全数迁徙到了中原内地，直属自己

的政权之下。之后，乌丸骑兵成为了中国最强的精锐部队。

鲜卑的部族也没有统一。公元1世纪末北匈奴向西方逃亡，外蒙古空虚，鲜卑趁机占领内蒙古，发展势力。到了公元2世纪中，出现了名为檀石槐（公元137至181年）的英雄。

一位名为投鹿侯的鲜卑人，为了与匈奴间的战争，从军三年。回到家中后，妻子生下了一名男婴。投鹿侯觉得事有蹊跷，正准备杀了男婴的时候，妻子却说：“有一天白天，我突然听到了雷鸣声，抬头看的时候，不小心吞进了一口冰雹。不久之后我就怀孕，怀胎十月后生下了他。这个孩子一定是不凡的人，还是将他抚养长大吧。”投鹿侯当然不相信，于是抛弃了男婴。妻子拜托娘家把孩子捡回来抚养。这名男婴就是檀石槐，长大之后拥有过人的勇气、力量与才智。十四五岁的时候，别的部族的大人突然来袭，夺走了牛和羊。檀石槐单枪匹马追击敌人，夺回了家畜。从此之后，部族的所有人都对他心服口服，没有人不跟随他的领导。被选为大人的檀石槐，受到鲜卑其他部族大人们的支持，统治的地方东从满洲，西至阿尔泰山。他将统治区分为东、中、西部三区，各设总督的大人。檀石槐在公元181年，四十五岁的时候死去，在他之后，鲜卑族的大人地位变成了世袭。至此为止变动性强的鲜卑，改为采取永续的形态。另一方面，乌丸被鲜卑吸收、同化，在公元304年开始的五胡十六国之乱中，只看到鲜卑的踪影。

在五胡十六国之乱中，包括匈奴在内的五个游牧民族在华北地区建立势力，其中之一便是鲜卑。在鲜卑建立的国家之中，最有实力的是慕容部族的燕国，统治辽宁、北京、河北一带。公元 395 年，燕国败给同是鲜卑族的北魏，从此一蹶不振。北魏是鲜卑族中的拓跋部族，在山西高原北部的大同盆地建国，君主的拓跋珪于公元 398 年采用了皇帝的称号，而他的孙子于公元 439 年统一了其他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家。

公元 494 年，北魏的孝文帝将首都从大同迁到河南的洛阳，在首都废除了以种族划分的居住区，改成以与种族无关的官位来划分居住区。另外，在朝廷禁止使用游牧民族的语言，立汉语为共通的公用语。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完全统合说着不同语言的游牧民族各部族。选择汉语为共同语言是因为无论是哪一个部族的人都不懂汉语，因此不会有不公平的现象。另外，当时在东亚，文字只有汉字，除了使用汉字外别无他法，语汇丰富的汉语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然而，这些政策引起了留在内蒙古的游牧民族强烈的不满。终于在公元 523 年，在内蒙古六镇的军事基地发生了大规模的叛乱。五年后，六镇派的人将洛阳派的人全数丢进黄河杀死。再过了六年，北魏东西分裂。宇文泰出身六镇派，是西魏权力的佼佼者，他将手下的游牧民族和汉人整合，编制了部族组织，赐给所有人鲜卑的姓氏，重建了

三十六部族与九十九氏族。

宇文泰死后，他的儿子宇文觉废掉了西魏的皇帝，自行称帝，建立了北周。另一方面，东魏也被篡位，成为北齐。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北周统一了华北地区。四年后，北周被杨坚（隋文帝）篡夺。公元589年，隋文帝吞并了江南的陈朝。在此，南北朝对立终于结束，中国再度统一。新的中国就此诞生。

隋文帝使用“杨”这个汉人的姓氏，但杨氏的初代是在鲜卑慕容部族的燕国为臣的北京司令官（北平太守），其实是鲜卑人。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住在内蒙古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隋文帝的父亲杨忠被西魏的宇文泰赐予“普六茹”这个鲜卑的姓氏。

汉语的变迁

从后汉灭亡到隋朝再度统一中国的四百年间，汉的语言有了显著的变化。中国没有表音文字。汉字属于表意文字，无论口头上的发音如何，文字都不受影响。因此，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没有全国共通的语言，中文这个概念直到公元20世纪为止都不成立。无论哪一个汉字，与其代表的意思无关，一个发音只有一个字。也就是所谓的字音。这个字音在中国过去城市国家的时代根据学派不同，发音也不同。秦始皇首度统一了字音的念法，确立了一字一音。

汉朝也继承了这种作法。等到公元2世纪，儒教成为国教的东汉时代，洛阳的太学共有二百四十栋、一千八百五十室、学生三万人，可说是盛况空前。在那里，讲读古代经典的时候，使用的就是秦始皇统一的字音。

然而，在公元184年的黄巾之乱后，东汉垮台，儒教失去了权威，学者四散各处。如此一来，至今为止由先生口头传给弟子的字音，面临了能否保存下来的危机。因此，开始有人将与字音相似的汉字整理分类，试着写出被称为“韵书”的发音辞典。隋文帝统一中国后的公元601年，一位名为陆法言的鲜卑人，集合各种“韵书”，撰写了《切韵》五卷。从中可以看到，后汉时代字音中R的语首不见了，变成了L。这是因为中央欧亚人使用的阿尔泰语系（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中没有R开头的发音。另外，东汉时代KR、PR等双重子音也在《切韵》中消失，这也是因为阿尔泰语系没有以双重子音开头的发音。也就是说，就算只看字音，隋朝时代的新中国人也不是秦汉时代中国人的子孙，而是从北方入侵、定居中国的游牧民族的子孙。

就像这样，从中央欧亚草原入侵的游牧民族，开启了新中国世界和新西欧世界。两者皆传承了旧有世界的文明，拥有独自的历史传统。在这两个世界交会，创造出单一世界史之前，还需要经过另一个阶段。

编注2 《史记·匈奴列传》：“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駹、驴、骡、駔駢、駔駢、駔駢。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毋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鎌。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编注3 《三国志·魏书》曰：“乌丸者，东胡也。漠初，匈奴冒顿灭其国，馀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俗善骑射，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宅，皆东向。日弋猎禽兽，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贵少贱老，其性悍骜，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常推募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邑落各有小帅，不世继也。数百千落自为一部，人人有所招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部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见妻家无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为妻家仆役二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子男女，相对蹲踞，悉髡头以为轻便。妇人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著句决，饰以金碧，犹中国有冠步摇也。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墙，东墙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米常仰中国。大人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能刺韦作文绣，织缕毡罽。有病，知以艾灸，或烧石自熨，烧地卧上，或随痛病处，以刀决脉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无针药。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肥养犬，以采绳垂牵，并取亡者所乘马、衣物、生时服饰，皆烧以送之。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也。至葬日，夜聚亲旧员坐，牵犬马历位，或歌哭者，擗肉与之。使二人口颂咒文，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饮食必先祭。其约法，违大人言死，盜不止死。其相残杀，令都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自杀其父兄无罪。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

第5章 游牧帝国的成长

——从突厥到契丹

阿瓦尔人的出现

鲜卑的北魏统治华北的公元5世纪中期，在黑海北方的草原上，阿提拉被杀，匈人的势力减弱，又使游牧民族从东方大举迁徙而来。根据希腊人布里斯库（Priskos）针对公元463年左右的记述，阿尔瓦人被“狮鹫兽追逐逃亡”，赶走了可萨人，而可萨人又赶走了欧古人、欧诺古尔人、沙拉古尔人，他们被迫逃往北高加索以及黑海北岸。

阿瓦尔人是乌丸族人，而可萨人是鲜卑族人。乌丸和鲜卑早在公元3世纪就已经扩展到蒙古高原西端。将他们赶出蒙古高原，迫使他们往西方的准噶尔盆地和哈萨克斯坦迁徙的“狮鹫兽”，其实是名为柔然（又称蠕蠕）的游牧民族。

柔然最初是鲜卑的一个部族，但在公元4世纪出现了一位名为社仑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之下柔然在外蒙古独立，

以千人为一军、百人为一幢（军旗），各个阶层指派不同的指挥官。打头阵者可获得战俘和战利品，临阵脱逃者则当场被石头或鞭子打死。柔然没有文字，指挥官计算兵士的数量时会用羊屎为记号，之后再在木头上刻痕留下记录。统治的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远方的满洲，西至越过阿尔泰山脉的准噶尔盆地。

社仑采用了“可汗”这个新的王号，之后被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广为使用。蒙古的“汗”就是从“可汗”而来。

柔然到了公元6世纪中，被新兴的突厥所灭，于公元552年建立了突厥人的游牧帝国。此时华北的鲜卑分裂成东魏与西魏，之后的大约八十年间，突厥汗国与中原的东魏、西魏对立，之后又与北齐、北周对立，再经历隋末唐初的内乱时期，成长为在与中原政权的对立关系中一直处于优势的政权。

另一方面，隋朝在统一中原之后不到三十年的公元618年灭亡，山西太原留守的李渊（唐高祖）建立了唐朝，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唐太宗）再度统一了中原。

唐朝帝室的始祖传说是李初古拔。他是河南西部北魏军的司令官（弘农太守），在公元450年的战争中曾被南朝的宋军俘虏。李初古拔的儿子李买得是北魏皇族永昌王的副官（长史），是鲜卑属一属二的勇士，但在公元450年的这场战役中战死。无论是李初古拔还是李买得，姓氏虽然像是中原汉人的姓，但名字是鲜卑语，所以他们是鲜卑人。

李氏据说住在河北南部的隆尧县，李买得和他儿子的墓都在这里。西魏的宇文泰赐给了李买得的孙子李虎“大野”这个鲜卑族的姓氏。李虎的儿子李丙，他的妻子是鲜卑族的独孤氏，是高祖李渊的母亲。高祖自己的皇后也同是鲜卑族的窦氏，是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太宗的皇后同样也是鲜卑人的长孙氏，是高宗的母亲。

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出，唐朝的帝室不是中原汉人而是鲜卑人，是宇文泰在西魏重建的游牧民族部族组织中的部族。这个部族组织从西魏、北周到隋都是政权的核心，统治唐朝的贵族阶级也都出身于这个部族组织。

突厥人的出现

至此为止，匈奴以来的游牧帝国全部都兴起于东方，逐渐向西方发展。然而，于公元 552 年在蒙古高原本建国的突厥人却不同，他们是从西方进入到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中国历史书上（公元 636 年的《周书》《隋书》）有关突厥人祖先的传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如下：

突厥人的祖先原本住在西海之右，但被邻国所灭。无论男女老幼全被赶尽杀绝，只剩下一个男孩存活了下来。敌军不忍杀害这个孩子，将他的双手双脚砍断后丢弃在草原之中。有一匹母狼

总是叼肉来给男孩吃，男孩才得以生存。之后，男孩与母狼交配，母狼因此怀孕。过去的邻国再度派人来杀男孩，由于狼在男孩的身旁，于是使者试图连狼一起杀掉。但狼有如神明附体般，一瞬间逃到了东海的山上。这座山位于高昌国的西北方（天山山脉），山下有一个洞穴。狼逃进洞穴后发现一片茂密的草原，面积广达方圆数百里。之后，狼产下了十名男婴，十名男婴各有一姓，其中一人的姓氏为阿史那，由于他最聪明，所以当上了君主。突厥人会在阵营的门前竖起狼头图腾的军旗，就是为了要纪念祖先。之后有一位名为阿贤设的领袖，率领部族从洞穴而出，之后世世代代成为柔然的臣子。”（编注4 参见一四八页）

祖先是狼所生的这个传说是突厥人固有的传承，但被敌人赶尽杀绝只剩一人，以及从洞穴而出，走向世界的传说不仅是在突厥人中，而是在北亚都十分典型的传说。另外，狼产下十名男婴，代表了建国当初的突厥人是十个部族的联合。

向柔然称臣时代的突厥人住在金山（阿尔泰山脉）一带，从事炼铁业。根据中国史书记载，金山的形状与头盔“兜鍪”相似，而他们称兜鍪为“突厥”，因此自称“突厥”。然而事实上，汉语的“突厥”与日语的“土耳其”，

原形皆是突厥语的“türk”，与突厥语的兜鍪“tulga”，和蒙古语的兜鍪“Дуулга”相异。唯一的解释是中国人因为两者音近，所以才把“兜鍪”与“突厥”联想在一起。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突厥人的故乡位于阿尔泰山脉与天山山脉间的准噶尔盆地。

突厥阿史那氏族的首领土门于公元 551 年与宇文泰结盟，与西魏的公主结婚。隔年，突厥打败柔然，逼柔然可汗自尽。土门称号伊利可汗，建立了突厥汗国。突厥汗国第三代的木杆可汗于公元 555 年灭了柔然，将根据地移到了蒙古高原。伊利可汗的弟弟室点密（又称塞帝米）经过中央欧亚草原之道，将突厥人的势力向西推展，征服了中央欧亚，直到伏尔加河为止。突厥人的西进迫使于公元 436 年被柔然赶出蒙古高原的阿瓦尔（乌丸）人离开哈萨克斯坦草原，进入地中海世界。

阿瓦尔人在公元 557 年的冬天现身于地中海世界。与此同时，华北宇文觉废掉西魏的皇帝，自行称帝，建立北周。当时，阿瓦尔人从东方的哈萨克斯坦草原渡伏尔加河，进入北高加索奄蔡人的土地，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还派遣使者前来与阿瓦尔人结盟。双方约定以每年定额的金钱为交换，阿瓦尔人必须替罗马帝国讨伐威胁帝国边境的游牧民族。到了公元 562 年，阿尔瓦人的拜恩可汗现身多瑙河下游，让当地的斯拉夫人俯首称臣，并击败多瑙河中游的格皮德人，又迫使多瑙河上游的伦巴底人向意大利迁徙后

又加以合并，征服的领土范围东从顿河开始，西至易北河和亚得里亚海。

公元626年，拜恩可汗的儿子动员了包括阿瓦尔人、斯拉夫人、格皮德人、伦巴底人在内的大军，与萨珊波斯帝国结盟，进攻东罗马的首都拜占庭。但他们在这场战役中败战，阿瓦尔人的势力也因此开始衰弱，最后于公元796年，奉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之命的丕平粉碎了阿瓦尔人的势力。然而，一部分的阿瓦尔人在多瑙河中游东方的草原存活了下来，在公元9世纪末匈牙利人迁徙而来的时候，依旧住在同一地区。

斯拉夫人的出现

阿瓦尔人之后兴起的是斯拉夫人。斯拉夫人原本是住在乌克兰德涅斯特河上游的民族。匈人在公元5世纪中期灭亡之后，斯拉夫人开始向四方扩散，一部分人南下住进了多瑙河下游流域。之后，阿瓦尔人入侵，征服了斯拉夫人。斯拉夫人跟随阿瓦尔人进攻拜占庭，一部分人渡多瑙河南下巴尔干半岛，另一部分人则乘着圆木舟渡爱琴海，入侵克里特岛。经过猛烈的攻击，到了公元7世纪中期，希腊全境几乎都成了斯拉夫人的居住地，会说希腊语的只剩下拜占庭附近地区的居民。

另外，斯拉夫人在东北夺取了波罗的人（拉脱维亚人

与立陶宛人的祖先）的居住地，公元6世纪又入侵了伏尔加河上游芬兰人的土地。这些是东斯拉夫人，是之后俄罗斯人的祖先。至于在西方的斯拉夫人，在征服了阿瓦尔人之后，进到了日耳曼人迁出后属于无人状态的中欧地区，到达了易北河。一部分人渡易北河，留下了莱比锡这个斯拉夫语的地名。

与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一同进攻拜占庭的保加尔人是北高加索草原的游牧民族。其中一派的保加尔人在公元679年阿瓦尔人势力衰微之后，在阿斯巴鲁赫汗的带领下，占领多瑙河下游流域，征服了原本住在这里的阿瓦尔人，这就是保加利亚建国的开始。现在的保加利亚语是斯拉夫语，这是因为保加尔人使用了原住民的语言。

另一派的保加尔人从北高加索沿着伏尔加河北上，在伏尔加河中游建国。这一派的保加尔人使用的是突厥语。伏尔加河在突厥语中称埃提尔河，现在伏尔加河的名称是俄罗斯语，因为这里曾经是保加尔人的国家。

就这样，突厥汗国的发展在西方引起了阿瓦尔人的迁徙，影响了地中海世界和西欧世界。至于在东方，对突厥汗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在突厥汗国建国的同一时期，华北东西方有两个鲜卑政权正在相互对立斗争。木杆可汗最初与西魏结盟，在宇文觉夺取西魏建立北周后，又与北周结盟，北周第三代的武帝还娶了木杆可汗的女儿为皇后。在北周与北齐的战争

之中，突厥一直与北周并肩作战。面对强大的突厥，弱小的北周为了维持双方结盟的关系，除了每年赠与十万缎的绢、锦来讨突厥的欢心外，别无他法。另一方面，北齐也为了与北周抗衡，想尽办法收买突厥。据说突厥汗国第四代的佗钵可汗曾自豪地说过：“只要我在南方的两个儿子善尽孝义，物资无虞”。“两个儿子”指的就是北周与北齐的皇帝。

突厥汗国的沙钵略可汗与北周的千金公主结婚。之后，北周被杨坚所夺，杨坚建立了隋朝。千金公主为了复仇，怂恿沙钵略可汗与隋朝开战。然而，当时因突厥汗国内部发生了东西分裂而作罢。

突厥人统治了广大的领土，东从满洲的辽河开始，西至伏尔加河。这么大的游牧帝国，至今前所未有。然而，由于领土过于辽阔，而且帝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崛起，所以统治的力量薄弱，逐渐出现了东西分裂的倾向。东突厥主掌的是以阿尔泰山脉为境的蒙古高原，而西突厥则主掌准噶尔盆地与哈萨克斯坦草原。这时又发生了可汗王位继承之争，公元583年，西突厥的达头可汗与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开战。被逼到绝境的沙钵略可汗与隋朝和解，将根据地移到了内蒙古，东突厥和隋朝成为了同盟国。公元589年，隋灭陈朝完成统一，强弱关系对调，东突厥变成了在隋朝保护之下的国家。

公元617年，中原陷入内乱，各地群雄蜂起。隔年，隋

炀帝被身边的人所杀。中原群雄纷纷发誓效忠东突厥的始毕可汗，接受可汗的分封。在山西太原举兵的唐高祖便是其中一人，他派遣使者向始毕可汗称臣，接受了东突厥的援兵。

高祖之后的唐太宗于公元 628 年恢复了中原的统一，之后立刻推翻了与东突厥的臣属关系。公元 630 年，唐朝灭了东突厥，俘虏了东突厥最后一个可汗，这是突厥汗国的灭亡。接着，唐高宗的军队于公元 657 年在哈萨克斯坦的楚河击败了西突厥的可汗。落荒而逃的可汗在隔年被塔什干人俘虏，交到了唐朝的手里。就像这样，游牧帝国的可汗与鲜卑的中原皇帝，两者相互较劲的结果，最后是鲜卑获得了胜利。

东突厥灭亡之后，唐高宗被游牧民族的君主们选为共同的“天可汗”。从此以后，唐高宗在写信给中央欧亚的君主们时，使用的都是天可汗的称号。这件事代表了唐朝的天子对中原政权而言是中国皇帝，对中央欧亚世界而言则是游牧帝国的可汗，身兼二职，而这两个世界有了共同的君主。然而这个空前的状态只维持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

突厥文字

公元 682 年，内蒙古的突厥人骨咄禄从唐朝独立，自称颉利可汗，在蒙古高原建立了后突厥汗国。这个游牧

帝国维持了六十三年。这个帝国对中央欧亚的历史而言，有一个重大的意义。那就是游牧民族首度拥有了表达自己语言的书写文字。

在此之前的突厥汗国据说使用的是粟特语，留下了用粟特语刻的碑文。粟特是以现在乌兹别克的撒马尔罕为中心的地区，这个地方以前的居民使用的是波斯语。粟特人从以前开始就会到蒙古高原或中原做生意，他们使用的文字是粟特文字。这种文字属于字母系统的一种，原本是从普及于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亚兰字母而来。

然而，后突厥汗国所留下的碑文使用的是改良自粟特文字的字母，首度写下了突厥语的文章。到这里，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首度将自己的语言以文字的方式书写，突厥语也成了汗国的公用语言。

然而，后突厥汗国的突厥语并不是纯粹的突厥语。“马”在突厥的任何一个方言中都被称作“*At*”，然后后突厥汗国的碑文却写作“*yunt*”。这应该是西伯利亚芬兰与乌拉尔语族的萨莫耶德语。也就是说这不是出自突厥人故乡准噶尔盆地，而是从更北方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带而来的语言。无论如何，后突厥汗国有了自己的文字之后，突厥语在中央欧亚地区得到发展，许多民族的人都开始使用突厥语。

西藏文字

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帝国关系逐渐变得密切的公元7世纪初，在西藏也出现了帝国。公元4世纪末，当华北正发生五胡十六国之乱时，西藏高原的西部出现了首代的君王。大约经过一百五十年，赞普松赞干布在唐朝灭东突厥的公元630年左右，统一了西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国。公元640年，他迎娶了唐朝的文成公主，成为了与唐朝并驾齐驱的帝国。

根据流传后世的西藏传说，赞普松赞干布王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前往印度学习文字。端美三菩提改良印度的文字，创造了西藏的文字。实际上，公元635年之后，西藏每年都留下文字记录，证明了赞普松赞干布的政绩以及西藏人用西藏文书写西藏语的事实。

吐蕃王国与唐朝、后突厥汗国三强鼎立，在中亚地区不断地上演争夺战。到了公元744年，在蒙古高原上，回鹘人的骨力裴罗独立，称号可汗，隔年杀了突厥最后的可汗，建立了回鹘汗国。

这时在中亚地区，从公元710年代起，伊斯兰教徒的阿拉伯人已经逐渐进入中亚。公元751年，在现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怛罗斯河畔，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帝国将军阿布·穆斯林击败了由高句丽人将军高仙芝所率领的唐军。接着在

公元755年，发生安史之乱，迫使唐朝从围绕中亚的国际竞争中退出。

回鹘人的祖先

建立回鹘汗国的回鹘人采用突厥语为公用语。然而，回鹘人与从西方准噶尔盆地而来的突厥人不同，他们最初是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

关于回鹘人祖先的传说，在公元13至14世纪的中国和波斯古籍内都有记录。根据记载，外蒙古的土拉河和色楞格河间有两棵树。受到阳光的照射之后，其中一棵树的树根隆起，就好像孕妇的肚子一样，终于在十个月之后，树根裂开，从中生出了五名男婴。五兄弟中最小的卜古可汗就是回鹘王族的始祖。

这个传说与突厥的传说不尽相同，他们的祖先与狼无关，而是从怀孕的树中出生。从这个传说当中可以推测回鹘人原本起源自森林地带。在现代西伯利亚境内布里亚特蒙古人萨满（巫师）家中，正中央会有一棵“母树”，从烟囱延展出去。附近还有一棵“父树”，用绳子与母树连结。他们相信，天神的灵魂将借由这棵树传给萨满。“巫”的突厥语称“卜古”，蒙古语称“卜”，是回鹘人祖先的名字。从这个传说可以推测，回鹘人原本是西伯利亚森林的住民，南下之后进入了蒙古高原的草原。就像这样，森林的狩猎

民族来到草原成为游牧民族的戏码不断地在中央欧亚地区上演，蒙古人也是其中之一。

公元 744 年建国的回鹘汗国介入安史之乱，支持唐朝皇帝换得人情，取得了强势的地位。

引起这场安史之乱的安禄山，他的父亲是粟特人，母亲是突厥人。安禄山获得唐玄宗的信赖，兼任辽宁、河北、山西的节度史，终于从唐朝独立，在北京自称大燕皇帝。安禄山死后，史思明杀了安禄山的儿子取而代之。史思明的父亲是突厥人，母亲是粟特人。另外，这两个人手下的将兵大部分也都并非汉族人。公元 763 年，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被杀，安史之乱宣告平定。然而，之后这些非汉族的军人们成为了地方军阀，占据华北，无视唐朝皇帝的统治，唐朝的全国统一只是有名无实，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变得十分低微。因此，从安史之乱开始的大约一百五十年，直到公元 10 世纪初为止，实际操控中国政治的是出身中央欧亚地区的人们。

至于蒙古高原上的回鹘汗国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繁荣，于公元 840 年被从西北入侵的吉尔吉斯人推翻，回鹘人四散各处。当中有些人逃往内蒙古，有些人逃往甘肃，还有些人逃往天山山脉。逃到天山山脉避难的回鹘人在天山北麓现在乌鲁木齐东方的庭州，建立了新的家，统治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市。正因如此，回鹘人带进来的突厥语取代了这些绿洲城市原本使用的吐火罗语。塔里木盆地又称“东

突厥斯坦”（突厥人的国家）也是这个原因。

吉尔吉斯人使用的是突厥语，原本住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与鄂毕河之间。现在的吉尔吉斯斯坦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天山山脉西部。吉尔吉斯人是在公元16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在蒙古族哈萨克人的带领之下，从西伯利亚南下迁徙到了天山。

公元9世纪打倒回鹘汗国的吉尔吉斯可汗，将根据地设在了萨彦岭南方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相当于现在图瓦共和国的土地。然而，吉尔吉斯人统治蒙古高原的时间很短，不久之后，来自蒙古高原东北部游牧民族的鞑靼人就将吉尔吉斯人赶出了蒙古高原，成为了高原的新主人。这些鞑靼人有些是后来的蒙古人。

回鹘汗国灭亡后二年，也就是公元842年，西藏吐蕃王国年仅十岁的赞普赤达玛乌东赞被宰相一党所杀，为了争夺王位，吐蕃王国分崩离析，中央政府已不存在。西藏自此开始大约有一百五十年，进入了没有记录的黑暗时代。

中国的突厥人

回鹘汗国与吐蕃王国灭亡后不久，唐王朝在公元875年发生了黄巢之乱。黄巢是河南的汉人，公元880年接连攻下洛阳和长安（西安），给唐朝以巨大的打击，他自称大齐皇帝。然而，黄巢身边的汉人将军朱全忠转而投效唐朝，再

加上受到突厥人将军李克用的反击，黄巢于公元 884 年战败身亡。

李克用是在内蒙古游牧的突厥沙陀部族的人。李克用的父亲被唐朝封为大同的节度史。李克用本身因为在公元 883 年从黄巢手里夺回长安有功，受封太原。此后在华北地区，占据山西高原的沙陀突厥军阀和以河南平原为根据地的朱全忠军阀相互对立，争斗不断。终于在公元 907 年，朱全忠废掉了唐朝最后的皇帝，自行称帝，将首都设在河南的开封，这就是后梁。

这是被称作“五代”时代的开始。虽然鲜卑人的唐朝灭亡，华北在睽违六百年后出现了汉人的王朝，但并不表示中国世界的主导权回到了汉人的手上。在仅仅十六年后的公元 923 年，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攻陷开封，灭后梁称帝，在洛阳建立了后唐。这使得华北全境落入了突厥人之手。

契丹帝国

同一时期，契丹人已经开始从东方进入蒙古高原。契丹人是大兴安岭山脉东斜面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名字从公元 4 世纪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出现在记录之中。根据公元 10 世纪契丹人的口耳相传，以前有一个乘着白马的男子沿着老哈河（辽河上游）而下，与乘坐灰色牛车顺西拉木伦

河而下的妇人在木叶山交会，结成了夫妻。他们是契丹人的始祖，生下了八个儿子，成为了各部族的祖先，这就是契丹八部族的起源。

木叶山位于现在辽宁省与吉林省的交界处。这一带在隋炀帝和唐太宗时期是皇帝军队进攻高句丽王国的必经之路。皇帝军队的基地设在现在的北京，从北京经过契丹人的住处，前往辽河远方的高句丽。由于北京位于满洲与华北的接点，高句丽战争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战略上的重要城市。到了唐朝，北京成了防卫中国东北边境的中心，安禄山便是以此为根据地引发了安史之乱。这里的唐朝军队混杂了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粟特人、突厥人，当中也有许多契丹人。

契丹人部族联盟的政治组织以选举的方式选出君王，一任为期三年，八部族的首领轮流当王。然而，耶律阿保机（太祖）利用在自己保护之下的汉人移民的经济实力累积军力，整合了所有部族，成了终身的君王。公元916年，自称皇帝，建立了契丹帝国。契丹帝国使用的国号为“辽”，这是取自部族故乡土地上的辽河。契丹人使用两种文字来书写自己的语言。其一是改良汉字的“大字”，属于表意文字。另一种则是独特的“小字”，属于表音文字。两者至今都尚未能解读。

契丹人建立契丹帝国的时候，西方的内蒙古和南方的华北都在沙陀突厥人的手里。为此，阿保机避开这两个地

方，转而瞄准西北方鞑靼人的居住地。公元 924 年，阿保机亲自率军进到了鄂尔浑河畔过去回鹘人的卜古罕城废墟。从南跨越戈壁沙漠，攻击了回鹘人位于甘州（甘肃省张掖）的国家。二年后，阿保机远征并灭了满洲东部的渤海王国，在回国的途中死亡。继承阿保机帝位的是次子德光（太宗）。太宗继承父亲的政策，继续入侵外蒙古。公元 928 年，征服了肯特山脉以东的鞑靼人，在这里驻扎了契丹人的军队。契丹人称这个地方的鞑靼人为“乌古”。

这段期间在中原后唐内部，太原的沙陀突厥人与洛阳的朝廷间相互对立。公元 936 年，太原的突厥人石敬瑭宣布独立，并与契丹结盟。辽太宗亲自率领契丹军援助石敬瑭。因为有了契丹军的援助，石敬瑭得以攻陷洛阳，灭掉了后唐，自行称帝，建立了后晋。辽太宗要求后晋割让从山西北部到河北北部的土地（燕云十六州）当作谢礼，并约定后晋每年必须赠送三十万匹的丝绸。

公元 936 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使契丹人得到了中原人口的北京和内蒙古地区。这个事件明显表示出从突厥汗国、回鹘汗国以来，北亚帝国与中原政权间的竞争终究以北方帝国处于优势，而中原处于劣势的方式收场。从此以后，北方帝国的优势日益渐长，最后蒙古帝国终于吞没了整个中原。

当上后晋皇帝的石敬瑭将朝廷从洛阳移到了开封，结果造成了开封的朝廷与太原沙陀突厥人间的对立。辽太宗

趁机于公元 946 年亲自率领契丹军远征开封，灭了后晋。之后，太原突厥人的刘知远当上了皇帝，在开封建立了后汉。然而，后汉仅维持了短短的四年，刘知远的后汉就被身旁的汉人郭威所灭。郭威在开封建立了后周，同时消灭了华北平原地带沙陀突厥人的势力。在太原，沙陀突厥人所建的北汉虽然残留了下来，但充其量不过是在契丹帝国保护之下的小国。如此一来，由突厥人掌握中原主导权的时代，在经历二十八年后宣告结束。

开封的后周又被汉人的赵匡胤（宋太祖）于公元 960 年所篡，建立了宋朝，首先合并了南方其他割据政权。宋太祖之后，由他的弟弟宋太宗继承皇位，在南方大致统一之后，于公元 979 年攻陷太原，灭了北汉。宋太宗虽然一股作气攻打北京，但在南郊的高粱河被契丹军打得溃不成军，皇帝好不容易才脱离险境，当然也无法收复燕云十六州。

公元 982 年，十二岁的辽圣宗即位，由他的母亲承天皇后（萧太后）摄政，派远征军前往外蒙古，攻击肯特山脉以西的鞑靼人，于公元 1000 年征服了该地。契丹人称这个地方的鞑靼人为“阻卜”。契丹帝国于公元 1004 年在鄂尔浑河畔过去回鹘人的卜古罕城废墟建立了名为镇州建安军的军事基地，当作统治外蒙古的中心地。

同年，承天皇后与辽圣宗亲自率军入侵华北，逼近宋朝的首都开封。契丹军到达黄河北岸的澶州（河南省濮阳县西）时，宋军被契丹军的气势震慑，宋真宗提出和议，

与辽圣宗互称兄弟，承天皇太后也成了宋真宗的叔母。约定宋朝每年要付给契丹帝国丝绸二十万匹，银子十万两。两国的关系从此转为安定，大约一百二十年，直到契丹帝国灭亡为止，两国相安无事。

契丹帝国的制度与至今为止的游牧帝国不同，结合了游牧型的政治组织和中国型的城市文明。这是因为契丹人的故乡在大兴安岭山脉的东斜面，雨量多，除了游牧之外也适合农耕，很容易就可以建立城市。这个以游牧和城市为两大支柱的制度之后被蒙古帝国继承，是蒙古帝国制度的基础。

契丹帝国将被称为“五京”的五个城市当作五个主要民族的中心地。契丹人的中心地是上京临潢府（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与契丹人同族的游牧民族奚人的中心地是中京大定府（赤峰市的宁城县），渤海人的中心地为东京辽阳府（辽宁省的辽阳），汉人的中心地为南京析津府（北京）、沙陀突厥人的中心地则在西京大同府（山西省的大同）。帝国的游牧民族依部族编制，定居民则编入州、县。官僚组织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掌管游牧民族，南面官则治理定居民。契丹皇帝以下的皇族、贵族各自拥有领地，领地内的居民包括游牧民和定居民。契丹皇帝的领土称“斡鲁朵”，就像是一个财团般的组织，皇帝死后，斡鲁朵依旧存在。斡鲁朵又指皇帝住的营帐，或是朝廷臣子们所住的营帐群。皇帝也是游牧民，不住在某一个固定

的城市，而是带着自己的宫廷，春夏秋冬分别前往不同的营区，过着游牧的生活。

基督教传向蒙古高原

在契丹与宋朝缔结和议后三年，基督教首度从西方传到了蒙古高原。在契丹建造镇州建安军的外蒙古鄂尔浑河畔地区是鞑靼人克烈部族的牧地。克烈族可汗有一天在积雪深的山林中打猎，结果迷路了。正当克烈族可汗放弃希望的时候，一个圣者出现在他的眼前，对他说：“只要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那么我就拯救你，为你指引方向。”克烈族可汗发誓归附基督，于是圣者替他引路，将他带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克烈族可汗回到自己的营帐之后，向滞留在当地的基督教商人询问了基督教的教义，知道了想要成为基督徒必须受洗，于是他首先从商人那里拿了一本福音书，每日礼拜。之后，克烈族可汗写了一封信给梅尔夫（现在的土库曼斯坦马雷）聂斯脱里教派基督教的首都总主教，希望他能够派遣祭司来为自己洗礼，并说已经有二十万人追随自己，准备接受洗礼。梅尔夫的首都总主教向巴勒斯坦的大教长报告这件事，遵照大教长的指示，派遣了两名祭司和助手，帮助可汗和其他克烈人进行洗礼的仪式。这是发生在公元 1007 年的事。这件事记录在叙利亚文的教会史中。

随着契丹人在外蒙古建立城市，打开了外蒙古通往中原的交通，西方的基督徒商人开始经由草原之道进入外蒙古。商人所带进来的基督教信仰不仅影响了蒙古的克烈部族，也扩展到了内蒙古的汪古部族。这两个游牧部族在之后的二百年，成为蒙古高原上最有实力的基督教政权。就算到了公元 13 世纪的蒙古时代，成吉思汗一开始追随的是克烈族的脱里汗，而元世祖忽必烈汗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是脱里汗的侄女，也是基督教徒。唆鲁禾帖尼的牌位在元朝时代被安置在甘州（甘肃省张掖县）的基督教会中。蒙古人相信上天授予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神圣使命，而蒙古人关于上天的观念是否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

西方商人带来的不仅是信仰，同时也带入了文字。不仅是基督教，拥有经典的宗教组织一旦扩展，文字的使用一定也会跟着扩展。聂斯脱里教派基督教的公用语是亚兰语，经典是用亚兰字母写成。随着基督教在中央欧亚草原游牧民族间扩展，亚兰字母也跟着扩展，游牧民族开始使用亚兰字母书写自己的语言。就像这样，亚兰字母应用在突厥语上成了回鹘文。回鹘文到了公元 1204 年被成吉思汗应用在蒙古语上成了蒙古文。蒙古文又在公元 1599 年被清太祖努尔哈赤应用在满洲语上成了满文。也就是说，公元 1007 年克烈族可汗改信基督教，此举有助于字母普及，这一点对于中央欧亚的文明产生深远的影响。

党项人

另一个游牧基督教王国的汪古部族是沙陀突厥人的后裔，在内蒙古西部的阴山山脉游牧，担任契丹帝国西南边境最前线的防卫。南方的黄河上游地区，相当于现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党项人是出身四川西北部、西藏边境山林的游牧民族。王室的姓氏为拓跋，与鲜卑北魏的帝室相同。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出，党项人原本是鲜卑族人。公元8世纪的安史之乱后，唐朝为了边境防卫上的方便，将党项人迁移到了宁夏。公元883年，党项人的拓跋思恭参加了从黄巢反叛军中夺回长安的战役有功，赐姓唐朝帝室的李姓，并获封夏国公，成为独立的军阀。高梁河战役中，契丹击败宋，夏国公李继迁宣布独立，与契丹结盟。公元990年，契丹帝国的辽圣宗封李继迁为夏国王，这就是西夏王国的建国。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于公元1038年采用大夏皇帝的称号，将首都定在银川。西夏王国使用特殊的西夏文字书写党项语，但至今尚未能充分解读。另外，党项人是佛教徒。

可萨汗国

公元7至11世纪，在东方，游牧帝国与中原政权的对

立，游牧民族逐渐占领上风。在此同时，西方的黑海北方矗立着强大的可萨汗国。

可萨并不是一个单一种族，而是在西突厥的统治之下，众多游民部族整合而成的联盟名称。他们共通的语言是突厥语。西突厥的政权在公元 630 年左右开始出现动摇，也就是在东方唐朝灭掉突厥汗国的同时，可萨人出现在北高加索，开始与保加尔人一争长短。不久之后，征服西突厥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入侵北高加索，袭击可萨人的城市巴兰札尔，之后大约百年的时间，阿拉伯与可萨之间的纷争不断。公元 737 年，阿拉伯大军逼近可萨人位于伏尔加河下游的根据地，逼迫可萨可汗改信伊斯兰教。但这只维持了一阵子，阿拉伯向北的征战最终止于现在达吉斯坦共和国的杰尔宾特。

可萨汗国统治的范围以伏尔加河下游和北高加索为中心，东从乌拉尔河，西至德涅斯特河为止，与东罗马帝国为了克里米亚的土地互不相让。就算如此，东罗马帝国为了抵抗阿拉伯帝国，确保北方边境的安全，还是选择了与可萨汗国结盟。公元 732 年，可萨可汗的女儿齐查克公主与东罗马帝国利奥三世的儿子君士坦丁（后来的皇帝君士坦丁五世）结婚，产下一子利奥，也就是日后的皇帝利奥四世。东罗马帝国皇帝娶“蛮族”之女为皇后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由此可见当时对于东罗马帝国而言，与可萨结盟是多么重要的事。

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初，可萨的布兰可汗（Bulan）改信犹太教。可萨汗国的统治阶层纷纷效仿，许多民众也跟着改信犹太教。可萨人盖起了犹太会堂，也邀请许多犹太教的著名学者，另外还限制只有犹太教徒才能够继承可汗之位。虽然如此，可萨人遵循犹太教的传统，对于其他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可萨汗国七个裁判官当中，二人依照“托拉”（摩西五经）的律法判决可萨人的事件，二人负责判决伊斯兰教徒的事件，二人负责判决基督教徒的事件，剩下一人则负责判决异教徒的事件。实际担任国政的是由出身花刺子模的伊斯兰教徒伊朗人所组成的可汗亲卫队。中央欧亚东西连结的草原之道与南北连结伏尔加河与里海的水路，可萨汗国由于占据两者的交叉点，与地中海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非常发达。

现在，有许多犹太人住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说着南德的方言（意第绪语），希伯来语称他们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被认为与斯基泰人有关）。这些人与以前的可萨犹太教徒没有关系。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原本住在波兰。公元十八世纪，波兰被俄罗斯帝国合并，他们才移居俄罗斯和乌克兰。公元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的犹太人主要就是这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移民。

罗斯人的出现

到了公元9世纪，北方出现了名为罗斯的民族，开始对可萨汗国和东罗马帝国造成威胁。在公元12世纪初以俄罗
斯文写成的《原初年代记》当中有一段关于公元862年的
记载。

人与人之间没有正义，部族与部族之间彼此争斗，相
互开战。他们争论不休，吵着“我们要为自己寻求可以统
治我们、可以依法执法的大公（族长）”。于是他们渡海到了
了罗斯人的土地。芬兰人、斯拉夫人向罗斯人说道：“我们
的国家很大也很丰饶，然而却毫无秩序可言。请你们成为
我们的公，统治我们。”三兄弟与他们的部族被选出，带着
罗斯所有的一切来到了芬兰人与斯拉夫人的土地。老大留
里克坐镇大诺夫哥罗德。老二西努斯和老三楚佛尔不久之
后就死了，因此留里克执掌所有的权力，将土地分封给自
己的臣子。

留里克的二位臣子阿斯科尔德和基尔获准带着自己的
族人前往拜占庭。他们沿着第聂伯河南下，停留在基辅，
统治了波利亚内人（平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在此之前，基
辅是向可萨汗国进贡的国家。二人在公元866年向东罗马帝
国进军，连结二百艘船包围拜占庭，但因暴风雨来袭，征
战宣告失败。留里克死后由同族的奥列格继承公位。公元

881年，奥列格率领大军进入基辅，杀掉了阿斯科尔德和基尔，自己成了基辅的大公。

以上是《原初年代记》的记载内容，年代方面有些不正确。罗斯人是在公元860年代攻打拜占庭，而留里克兄弟来到东斯拉夫人的土地是在公元862年之前的事。话虽如此，可以确定的是，首度在东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建立王朝的不是东斯拉夫人自己，而是从海的另一方斯堪的纳维亚远渡而来的日耳曼系诺曼人。这些外来的诺曼人征服者被称为罗斯（俄罗斯的语源），罗斯人征服的国土称作俄罗斯，而被罗斯人征服的人则被称为俄罗斯人。这个事实说明了俄罗斯民族的身份，从一开始就是借别人的土地、人民而来的。

罗斯人沿着伏尔加河南下，反复攻击可萨汗国，终于在公元965年，罗斯人的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攻进了可萨汗国的中心城市萨克尔。可萨汗国受到严重打击而衰弱，但未因此而消灭，直到公元11世纪末，都留在北高加索。

打倒可萨汗国之后，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大公（一世）与东罗马帝国联手。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与罗马皇帝巴希尔二世的妹妹安娜结婚，并受洗成为基督徒。根据《原初年代记》记载，伊斯兰教徒的保加尔人劝说弗拉基米尔大公信仰伊斯兰教，然而大公因为伊斯兰教徒必须行割礼，且不能吃猪肉或饮酒，所以拒绝改信伊斯兰教。德意志人劝弗拉基米尔大公归依罗马教皇，

但大公也回绝。从可萨来的犹太人劝弗拉基米尔大公改信犹太教，然而大公却以听说犹太人激怒神而遭到亡国，犹太人四散各处为由，同样加以回绝。最后，东罗马帝国的学者向弗拉基米尔大公保证，只要受洗就可以复活，大公终于下定决心受洗，毁掉了罗斯的众神像。当然，这是基督教徒所编的故事，并非史实，但弗拉基米尔大公改信基督教是之后俄罗斯正教会的起源。

罗斯人所接纳的基督教是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正教，然而教会的公用语不是希腊语而是斯拉夫语。因此，俄罗斯正教的修道院被翻译成斯拉夫语的希腊语文献，完全是基督教神学的著作，希腊哲学、文学、科学的古典书籍都没有被翻译。也正因为如此，罗斯人虽然接纳了东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但西欧文明基础的古希腊、罗马精神却完全没有影响罗斯人或东斯拉夫人。这与将来俄罗斯文明的命运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可萨汗国垮台，但并不代表黑海北部草原就归罗斯所有。可萨人之后，同样说着突厥语的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从东方入侵，锐不可挡。公元 972 年，打倒可萨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被佩切涅格人所杀。佩切涅格人将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的头贴满金箔做成酒杯，用来饮胜利之酒。到了弗拉基米尔时代，佩切涅格人的攻势依旧不减，罗斯筑起了高墙防御。然而，公元 1036 年，基辅被攻破，佩切涅格人经过基辅向西来到了多瑙河的东罗马帝国国境。佩

切涅格人之后从东方而来的是钦察人。

钦察人

钦察人又被称作库曼人，俄罗斯语称“波罗维兹（Polovtsy）”。他们来自西伯利亚鄂毕河上游的阿尔泰山脉，是说着突厥语的游牧民族。公元11世纪初经由哈萨克斯坦草原开始向西方迁徙，同世纪末到达了多瑙河。钦察人占据横跨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的广大草原地带，这片草原地带在波斯语中称作“Descht – i – Qipchāq”，也就是钦察草原的意思。

钦察人之间并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多数的可汗各自率领自己的部族。从公元11世纪末起，钦察人反复攻击东罗马、匈牙利以及罗斯，当中又以与罗斯之间的战争最为激烈。公元1185年，罗斯的大诺夫哥罗德大公伊戈尔二世被钦察人击败成为了俘虏。这段故事正是著名的古俄罗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以这段故事为基础，公元19世纪的音乐家鲍罗丁编写了歌剧《伊戈尔王子》，当中最著名的曲子是“波罗维兹人之舞”。这个曲子经常被误译为“鞑靼人之舞”，但正确的应该是“钦察人之舞”。蒙古人原本是鞑靼人其中的一个种族，俄罗斯人称蒙古人为“鞑靼”，但波罗维兹人是钦察人而不是蒙古人。蒙古人在公元12世纪时，尚未出现在钦察草原。

无论是罗斯或是钦察，他们的内部都没有统一，因此无法合力对抗外敌，两者之间的战争也始终胶着不下。对峙的状况到了公元 13 世纪，蒙古人从东方入侵，无论是罗斯或是钦察，都被蒙古帝国吞噬。

编注 4 《周书》：“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后为邻国所破，尽灭其族。有一儿，年且十岁，兵人见其小，不忍杀之，乃刖其足，弃草泽中。有牝狼以肉饲之，及长，与狼合，遂有孕焉。彼王闻此儿尚在，重遣杀之。使者见狼在侧，并欲杀狼。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回数百里，四面俱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长大，外托妻孕，其后各有一姓，阿史那一也。子孙蕃育，渐至数百家。经数世，相与出穴，臣于茹茹。”

第6章 蒙古帝国创造世界

《资治通鉴》的中华思想

蒙古高原上的游牧帝国，从突厥汗国到回鹘汗国，一直对隋唐时代的中国造成威胁。从公元 936 年中原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帝国以来，在五代、宋朝时代，游牧民族站在了有利的地位。公元 1004 年的澶州和议更确定了契丹帝国对宋朝的优势。

这个形势使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原本的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世界，而住在皇帝统治的城市之中，使用皇帝制定的汉字的人是中国人，与出身的种族无关，而且甚至没有“中国人”这个用语。秦朝的人称“秦人”，汉朝的人称“汉人”，三国时代的人分称“魏人”“吴人”“蜀人”，晋朝的人则称“晋人”。这些全部代表了属于皇帝的人，没有种族的观念。

后来发生了五胡十六国之乱。公元 316 年晋朝灭亡，皇帝制度一度消灭。从这个时期开始，汉人一直被游牧民族

出身的王朝统治，汉人成了被统治的阶级。隋朝和唐朝都是鲜卑人的王朝，进入五代之后的后唐、后晋以及后汉又是突厥人的王朝。终于到了宋朝，汉人好不容易在睽违六百年后统一中国，却又立即受到高粱河的败战与澶州和议的屈辱，被迫承认同是游牧帝国的契丹帝国的优势。

六百年来在非汉人统治之下的汉人，他们的自尊心已经受损，而这种形势更带给他们严重的打击。“中国人”在此才终于有了种族的观念，他们开始主张，武力上面也许不如“夷狄”，但文化上面远胜于“夷狄”。这个主张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但这个主张却是与事实相反。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统治阶级都比被统治阶级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当然文化水准也比较高。也就是说，就算在中国，统治阶级的“夷狄”，他们的文化水准也都胜过被统治阶级的“汉人”。中华思想是中国人弱势意识下的产物，而试图借由历史将这个思想正当化，以证明中国人优越性的史书正是宋朝政治家司马光（公元 1019 至 1086 年）所著的《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一本编年体的史书，记载公元前 403 年（战国时代初期）至公元 959 年（宋太祖即位前一年）的历史。在司马光的年代，一个“天下”（世界）有两个皇帝并列，分别是契丹皇帝和宋朝皇帝。这以司马迁《史记》的架构而言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违背了“正统”的观念。《资治通鉴》的架构反映出了宋人超越了现实的情势，把历

史理想化，希望能够挽回中国的名誉。

就像司马光的时代一样，南北朝时代也是两个皇帝并列的时代。唐朝的史官平等对待南朝和北朝，承认南北朝皇帝的正统。然而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在标明年代的时候，从头到尾使用的都不是在中国中心地建国的北朝年号，而是使用江南边境亡命政权南朝的年号。年号代表的是皇帝对时间的支配权，因此，《资治通鉴》的写法代表把鲜卑人的北朝视为契丹，且认为北朝的皇帝是假皇帝，拒绝承认北朝的正统。相反地，南朝虽然衰弱，但由于与宋朝一样都是汉人的王朝，因此南朝的皇帝才是真正皇帝，承认南朝的正统。《资治通鉴》将周朝以来的正统，经过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直接与宋朝接轨。这种写法是在强调只有汉人王朝的宋朝皇帝才有统治中国的正当权力。在这里可以看到司马光对抗契丹帝国的意识，同时也看得出自尊心受损的汉人为挽回自尊所做出的努力。

相对于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这个世界做出定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规范了汉人的种族观念。正统的观念与中华思想结合的结果，让之后的中国人愈来愈看不清中国的历史。

金帝国

契丹帝国于公元 1125 年灭亡。灭掉契丹帝国的是女真

族人（或称女贞或女直）。女真人是说通古斯语系语言的狩猎民族，住在连结辽河（辽宁省）与嫩江（黑龙江省）的东经 124 度线东侧的森林地带，长久以来都臣服于契丹帝国，每年向契丹帝国纳贡。完颜部族的族长阿骨打（金太祖）于公元 1115 年独立，即位大金皇帝，这就是金帝国的建国。国号的“金”是取自完颜部族根据地，也就是哈尔滨市东南方的按出虎河，而“按出虎”在女真语中代表“黄金”之意。女真语是之后满洲语的祖语。女真人也与契丹人一样，修改汉字创造出书写自己语言的文字。

金军对抗契丹军连战连胜，契丹帝国最后的皇帝在公元 1125 年于内蒙古被捕。金军继续进攻宋朝，隔年占领开封，俘虏了宋徽宗与宋钦宗父子。华北地区一直到淮河为止都成为了金帝国的土地。宋钦宗的弟弟宋高宗往南逃，公元 1127 年登上帝位，将临时的首都设在杭州。从这里开始的宋朝被称为南宋。

金帝国除了继承契丹帝国所有的土地之外，还追加了华北地区的领土。北方的内蒙古也是金帝国的土地，但金帝国并没有统治外蒙古地区。外蒙古地区由契丹皇族的耶律大石在公元 1124 年，将七州的契丹人和游牧民族的十八部族聚集在镇州建安军的可敦城，在这里他被选为皇帝。

耶律大石在不久之后便领着全军向西方迁徙，占领了哈萨克斯坦东部、巴尔喀什湖南方、楚河河畔城市八刺沙衮，以此地为根据地，统治了中亚地区广大的领土。这个

由耶律大石所建立的帝国被称为黑契丹或西辽。黑契丹的皇帝在突厥语中被称为古儿汗。他的军营被称为虎思斡鲁朵，据说规模之大，就算骑马，绕一圈也要花上一天一夜的时间。

八刺沙衮在黑契丹人入侵之前，从公元 10 世纪以来，这里是伊斯兰教徒突厥人所建立的喀喇汗国，在中亚拥有强大的势力。喀喇汗国首度使用阿拉伯文书写突厥语。公元 1069 至 1070 年，有一本由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著的《福乐智慧》（幸福的智慧），书中阐述君主应有的素养，是以突厥语书写的第一部文学作品。佛教徒的黑契丹继承了喀喇汗国的强大势力，在中亚统治伊斯兰教徒。

契丹人是最早成功结合游牧型政治组织与中国型城市文明的民族。这些契丹人在中亚的伊斯兰地带建立了黑契丹，将自己在东亚地区发展出的全新经营模式带进了这个地区，为之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奠定了基础。

资本主义的萌芽

女真人是森林地带的狩猎民族，住在固定的房子里，在狩猎与采集之余，同时也进行农耕。因此，相较于草原游牧民族的契丹人，女真人更容易融入中国型的城市文明。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几乎沿用契丹帝国的所有制度。然而，金帝国南部从宋朝夺来的华北是汉人的地区，当地商

业发达，需要大量的货币，这带来了新的问题。至今为止的货币都是铜币，然而现在属于金帝国领土的华北地区没有出产铜的矿山，因此无法铸造铜币，这导致了流通货币的绝对量经常不足。金帝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发行了大量的交钞，这使人们习惯以信用为本的交易，也让以信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交钞的发行也是未来蒙古帝国商业繁荣的原因之一，更影响了世界的经济变化。

无法直接掌管外蒙古的金帝国，不断受到外蒙古地区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掠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金帝国与远方的游牧部族结盟，夹击离国境近的游牧民族。金帝国选择结盟的对象之一就是克烈部族的脱里汗，而脱里汗手下蒙古部族的铁木真正是未来的成吉思汗。

蒙古人的出现

蒙古部族原本是住在现在西伯利亚与内蒙古东部境内额尔古纳河畔的游牧民族，他们的名字首度出现在公元 7 世纪初的记录当中。蒙古人在公元 1084 年再度出现在记录当中，这一年，“远方蒙古国”的使者造访了契丹帝国皇帝的宫廷。根据后世成吉思汗家族的传承，成吉思汗六代前的祖先名叫海都。邻近的札刺亦儿部族人入侵，抢走了马群并把海都的族人赶尽杀绝。当时，年幼的海都因为躲在木

柴堆里，所以独自一人存活了下来。入赘巴尔虎部的叔父纳臣把海都带到了巴尔虎。海都长大成人后，纳臣带领巴尔古津河流域的居民，推选海都为自己的君主。海都率军攻打札刺亦儿部族，收服了札刺亦儿部族。海都的势力日盛，他在巴尔古津河畔扎营，并在河上搭桥方便往来。之后，四方部族逐渐聚集在海都的手下。海都的曾孙合不勒可汗是蒙古部族最初的可汗。合不勒可汗的孙子是也速该，而也速该的儿子就是铁木真·成吉思汗。

这个故事当中的巴尔古津是从东侧流入贝加尔湖的河川名称，而巴尔古津溪谷是一片广大的平原。巴尔虎是住在这个地方的游牧民族，是现在布里亚特蒙古人的祖先。札刺亦儿部族是在南方鄂嫩河溪谷游牧的民族。从这里可以看出，蒙古人在公元11世纪时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游牧，之后开始南下，慢慢扩展至肯特山脉以东的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一带。

成吉思汗出身的乞颜部拥有蒙古部族当中最靠西的肯特山中牧地，西边紧邻克烈部族。克烈部族的脱里汗在内乱中失去了王位，带着百余骑兵投靠了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也速该后来率兵帮助脱里汗恢复王位。脱里汗为了报恩，与也速该订立了安答（盟友）的誓约。

也速该死的时候，他的儿子铁木真还很年幼。这个时候的蒙古部族尚未有文字的知识，当然也没有记录。因此，无法正确判断铁木真出生的年份。公元1195年起才开始可以正确判明铁木真的事迹。

公元 1195 年，金帝国派遣大军讨伐扰乱边境的游牧民族，同时命令结盟的部族从背后夹攻，蒙古部族的铁木真正是回应这个命令的其中一人。铁木真攻打仇敌塔塔儿部族，杀了塔塔儿部族的首长，被金军的总司令官封为百人队长。之后的铁木真在协助金帝国的同时，也开始累积自己的势力。这件事情之所以会留下记录是因为从这一年开始，铁木真与有文字的克烈王朝之间建立了关系。

这一年，克烈王国又发生了内乱。西方阿尔泰山脉的乃蛮部族首领介入，脱里汗的弟弟贾干布遭到驱逐，逃往东方肯特山脉向铁木真求救。脱里汗自己则经过西夏王国以及天山山脉的回鹘汗国，向黑契丹求救。然而，黑契丹不肯帮助脱里汗，于是他在隔年的公元 1196 年，转而向铁木真求救。由于脱里汗与铁木真的父亲也速该有安答之缘，于是铁木真尊敬脱里汗如父，成为了脱里汗的部下，二人同心协力讨伐与金帝国敌对的其他游牧民族。金帝国授予脱里汗“王”的称号，因此脱里汗又被称为“王汗”。

克烈的王汗与蒙古的铁木真一直到公元 1202 年都持续联手，外蒙古的诸部族几乎都在二人的统治之下。然而，成功也为二人带来了对立，终于在公元 1203 年的春天，王汗的军队偷袭了铁木真。铁木真向北方逃亡，以鄂嫩河北方的班朱尼湖为根据地，同年秋天一举击破王汗的本营。王汗准备逃往乃蛮王国，却被边境守卫队所杀。在此，持续二百年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克烈亡国，蒙古部族的铁木真

成了外蒙古的统治者。

隔年的公元 1204 年，乃蛮的太阳汗率领大军从西方入侵外蒙古。“太阳”是从金帝国得到的封号“大王”的谐音。然而，与蒙古军在鄂尔浑河的决战当中，乃蛮军大败，太阳汗战死。铁木真转而攻击东方的塔塔儿部族，进行了大屠杀，将塔塔儿部族彻底歼灭。

从此之后，金帝国境外的游牧民族全部归降铁木真，听从铁木真的所发号的施令。公元 1206 年春天，在肯特山脉、鄂嫩河上游附近的草原，多数的游牧部族与氏族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大会，选出铁木真为自己共同的最高领袖，献上了“成吉思汗”的称号。这是蒙古帝国的建国，也是世界史诞生的瞬间。

蒙古的发展

蒙古帝国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征服西夏王国。从成吉思汗即位前的公元 1205 年起，蒙古军就已经开始入侵西夏，终于在公元 1227 年灭了西夏。

第二阶段是天山回鹘汗国的投降。回鹘汗国原本在黑契丹的保护之下，但在公元 1209 年，回鹘汗国背弃黑契丹，转而效忠成吉思汗。

第三阶段是征服金帝国。成吉思汗于公元 1210 年与金

帝国断交，隔年开始入侵金帝国领土的内蒙古和华北。成吉思汗后继的窝阔台汗于公元 1234 年彻底歼灭了金帝国。

第四阶段是征服黑契丹。乃蛮的太阳汗战死，他的儿子屈出律逃往黑契丹，接受黑契丹最后一个皇帝的保护。公元 1211 年，屈出律叛乱，废掉黑契丹的皇帝，自己登上了帝位。就这样，黑契丹在耶律大石建国八十七年后灭亡。成吉思汗于公元 1218 年派遣大军灭了屈出律。这让蒙古帝国在西方的最前线到达了哈萨克斯坦东部。下一个阶段就是征服紧邻黑契丹西方的伊斯兰世界。

伊斯兰世界的突厥人

公元 7 世纪，西亚的伊斯兰世界上演了阿拉伯帝国的大征服。公元 8 至 9 世纪，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利法）将阿拉伯帝国推向高峰。从这个时代开始，中亚的突厥人被当作奴隶，开始大批进入伊斯兰世界。突厥人的奴隶勇敢又忠诚，是很重要的军队资源，当中也有人被提拔侍奉君主，或是登上军队司令官和地方长官的位置。

到了公元 11 世纪，哈萨克斯坦草原出现了说突厥语的土库曼人塞尔柱家族，他们改信伊斯兰教，征服了西突厥斯坦和伊朗高原。公元 1055 年，土库曼的族长克利尔贝尔进入巴格达城，被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封为“苏丹”（权力者）。塞尔柱王朝的势力曾经覆盖整个西亚，但地方的王家

分散了王朝的势力，势力逐渐衰弱，塞尔柱家族于公元 1157 年绝后，这时正好是成吉思汗出生的时期。

塞尔柱王朝是突厥人在伊斯兰世界最早建立的帝国，继承帝国东半部领土的是同为伊斯兰教徒突厥人的花刺子模王朝。花刺子模指的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西部、阿姆河从南侧流入咸海的地区。花刺子模王家的祖先は塞尔柱王朝苏丹的突厥人奴隶，后来被任命担任花刺子模的军队司令官，逐渐扩展势力。

与花刺子模王朝的对战是蒙古征服世界的第五个阶段。成吉思汗于公元 1219 年指挥全军渡锡尔河，耗时七年，终于完全消灭了花刺子模帝国，将势力扩展到北印度平原。许多参与这场远征的蒙古人都驻扎在西突厥斯坦的征服地，继续征战。

征服欧洲

蒙古征服世界的第六阶段是征服钦察草原。成吉思汗将哈萨克斯坦封给了长子术赤当作牧地。窝阔台汗于公元 1234 年任命术赤的次子拔都为总司令官，从各皇族中挑选精兵组成大军，由拔都领军，开始征服乌拉尔河以西的诸国。拔都的蒙古军于公元 1236 年征服了伏尔加河中游保加尔人的国家，接着又依序征服了钦察人的诸部族、罗斯的诸城市以及北高加索的诸种族。接着大军又进入波兰王国，

于公元 1241 年在莱格尼察击败了波兰军与德意志骑士团的联军。大军继续将匈牙利王国夷为平地，直入奥地利的维也纳新城。再往南，进入了克罗地亚的亚得里亚海岸。

蒙古军的作战目的被认为在于逐一征服西欧，直捣大西洋岸，将这些地方收为蒙古人的牧地。蒙古军队的先锋中有一位英国的贵族，这就是最好的证据。这个英国人据说是公元 1215 年逼迫英格兰国王约翰签署大宪章的贵族之一。约翰王死后，反对党的贵族们企图迎接法兰西的王子继承英格兰的王位但不幸失败，反对党被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逐出了教会。后来成为蒙古先锋的英国贵族为了赎罪，参加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来到了巴勒斯坦，之后脱队进入巴格达。由于他的教养高尚，而且可以流利地说多国语言，于是被窝阔台汗宣召封赏，加入蒙古的远征军，负责与基督教徒交涉。

然而，公元 1241 年 12 月，窝阔台汗死去，蒙古的远征军在东经十六度线突然撤军。这时，维也纳新城追击蒙古军的奥地利军队俘虏了八名蒙古军的将领，其中一人就是这个英国贵族。他的名字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如果蒙古军能够到达大西洋，那么他无疑会被任命为西欧的总督。

蒙古对欧洲的征战到此告一段落，没有发动第二次的征战。远征军的总司令官拔都在伏尔加河畔游牧，统治北高加索、乌克兰、罗斯一带。他的宫廷被称为“黄金斡鲁朵（金帐）”。伏尔加河以东的草原是拔都的长兄斡儿答和

弟弟们的牧地。术赤子孙们的领地俗称“钦察汗国”，但这其实是不正确的。正确应该称作“钦察草原的大汗们”。现在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鞑靼人、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都是与术赤家的大汗们一同移居当地的蒙古人后裔。

征服西亚

第七阶段是征服西亚。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哥汗于公元1253年，派遣弟弟旭烈兀远征西亚。旭烈兀于公元1258年攻破巴格达，杀了最后的哈里发，灭了阿拔斯王朝。蒙古军接着入侵叙利亚，企图征服埃及。当时统治叙利亚的是由夺取埃及阿尤布家政权的突厥军人所建立的奴隶王朝——马穆鲁克王朝。蒙古军于公元1260年，在巴勒斯坦的阿音札鲁特（以色列共和国提比里亚）遭到苏丹忽秃斯率领的马穆鲁克王朝大军埋伏而大败。之后蒙古人也多次尝试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但最终都没能成功。旭烈兀自称伊儿汗，将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南亚塞拜然为根据地，东从西突厥斯坦的阿姆河开始，西至幼发拉底河和安纳托利亚，北达高加索山脉，统治了广大的土地。这就是所谓的“伊儿汗国”。

继承拔都金帐汗国大汗之位的是他的弟弟别儿哥。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了争夺高加索的领地而发生了冲突。在这

样的情况之下，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选择与别儿哥联手。建立马穆鲁克王朝的突厥奴隶军原本是钦察人，被阿尤布家最后的萨利赫苏丹大量买入，带进了埃及，所以马穆鲁克王朝对统治故乡钦察草原的金帐汗国比较有亲切感。为此，马穆鲁克王朝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采用由成吉思汗订立、名为“札撒”的法典。马穆鲁克王朝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直到公元 1517 年才被奥斯曼帝国所灭。

征服南宋

第八阶段是征服华中和华南。从窝阔台汗开始，蒙古多次发动对南宋的战争，公元 1276 年，忽必烈汗派遣的蒙古军终于占领杭州，南宋灭亡。这使得中原皇帝的“正统”再度中断，中原成为了游牧帝国的一部分。与突厥、回鹘、契丹、金一同成长的另一个“正统”获胜，吞噬了中原。

此外，在东亚地区，忽必烈汗于公元 1253 年征服了云南泰族的大理王国，公元 1259 年，朝鲜半岛的高丽王国投降。西藏在当时虽然没有被统一，但公元 1260 年，忽必烈汗指派自己信奉的佛教萨迦派祖师八思巴为统治西藏的代理人，于是八思巴一族的昆氏成为了西藏实质上的统治者。

就像这样，东从日本海、东海开始，西至黑海、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包括东亚、北亚、中亚、西亚、东欧几乎所有大陆地区全部都在蒙古帝国的掌控之下。这是人类

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蒙古帝国的构造

蒙古帝国之所以可以不断扩张的主要理由在于自从匈奴帝国以来的游牧王权特征。为了维持建立的王权，君主必须不断地提供部下的游牧战士掠夺的机会，或是必须不断地赏赐财物，以确保获得众人的支持。如果不这么做，那么独立性强的部下们马上就会转而支持别的君主。因此，不断地征战，是满足部下最快的方式。

蒙古帝国内部多数游牧君主的封地并列，被称为“兀鲁思（ulus）”。一个兀鲁思的构成包括专属的游牧民族集团和他们的家畜，以及可以从专属的定居民征收财物和劳力的特权。总共有四大兀鲁思。东亚是忽必烈家的“大元”，也就是元朝。中亚是察合台家的“察合台汗国”。西亚是旭烈兀家的“伊儿汗国”。东欧则是术赤家的“钦察汗国”。这些是最大的兀鲁思，其他还有许多小的兀鲁思。经常有人说“蒙古帝国分裂为四大汗国”，但这是不正确的说法。蒙古帝国从创立者成吉思汗的时代开始就已经有许多的兀鲁思，就算是大汗，能够直接统治的只有自己直辖的兀鲁思，没有介入其他兀鲁思内政的权力。

由蒙古人组成的众多兀鲁思之所以能够统合成为蒙古帝国，是蒙古人对成吉思汗人格的尊敬，以及相信成吉思

汗被赋予神圣的天命，要来征服世界。成吉思汗也就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也就是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全境坚守被称为“成吉思汗原则”的思想，能够继承成吉思汗血统的只有父亲方的男子，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使用“汗”的称号。为此，蒙古以前各个游牧部族的名字或氏族全部消灭，取而代之的是蒙古的氏族名称。也就是说，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几乎全部被归入蒙古人的社会组织当中，变成了蒙古人。只有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是例外。原本阿尔泰山脉以西的蒙古人在进到公元 14 世纪后改信伊斯兰教，开始使用突厥语。然而，他们的思想依旧是蒙古人的思想，并没有因此变成突厥人。

蒙古帝国创造的各国国民

蒙古帝国从公元 13 世纪起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欧亚大陆的定居民有很多也受到蒙古帝国的影响，逐渐演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印度人、伊朗人、中国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他子孙的领地从阿尔泰山脉一直到阿姆河为止，但西部领土在公元 1360 年代被巴鲁刺思氏蒙古人帖木儿所夺。帖木儿将根据地放在撒马尔罕，四处征战，在他这一代就已经在中亚建立起了大帝国。但

因为他不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因此不能使用“汗”的称号。帖木儿死后，北方术赤家的乌兹别克人南下，于公元1507年消灭了帖木儿帝国。帖木儿的子孙巴布尔逃往北印度，以德里为根据地，建立了蒙兀儿王朝（莫卧儿王朝），这就是印度蒙兀儿帝国的起源。

“蒙兀儿”是“蒙古”的谐音，蒙兀儿帝国其实就是蒙古帝国。蒙兀儿帝国统合了印度大部分地方，到了公元1858年，蒙兀儿帝国最后的皇帝被英国所废，维多利亚女王成了印度的皇帝。在英国统治之下，单一的总督府首度统合了印度半岛全境，领土由公元1947年独立的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继承。因此，现在南亚的这两个国家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另外，巴基斯坦国语之一的乌尔都语是蒙兀儿帝国的公用语。“乌尔都”代表游牧君主宫廷的意思，是“斡鲁朵”的谐音，也就是“宫廷语”的意思。

在伊朗高原上，公元1335年，旭烈兀家的伊儿汗国血统中断，内部纷争不断。公元14至15世纪伊儿汗国接受帖木儿帝国的统治。到了公元1501年，南亚塞拜然什叶派伊斯兰神秘主义教团教主伊斯玛仪一世受到土库曼游牧民族九部族的支持，在过去伊儿汗国根据地南亚塞拜然的大不里士即位，建立了萨非王朝。在此之前，伊朗人的居住地伊朗高原一直到中亚的锡尔河为止，但随着说突厥语的乌兹别克人南下，中亚的伊朗人被消灭，在中亚说着伊朗语的只剩下塔吉克人。就像这样，萨非王朝的领土只有伊朗

高原，决定了现在伊朗的国土范围。因此，伊朗也是由蒙古帝国创建的继承国之一。

蒙古的继承国——中国

忽必烈家的元朝统治了蒙古高原、满洲、朝鲜半岛、中原、云南、西藏。公元 1351 年，在华中地区发生了汉人秘密结社的“红巾之乱”。红巾军受到祆教千年王国思想的影响，是白莲教徒的革命组织。到了公元 1368 年，红巾军出身的汉人朱元璋（明太祖）在南京即位当上皇帝，建立了明朝。同年，元朝皇帝乌哈噶图汗放弃中原，退回了蒙古高原。然而，元朝并非就此灭亡。蒙古高原上的蒙古人依旧拥戴成吉思汗家的大汗们，使用“大元”的国号。他们不承认明朝的皇帝，称明朝的中国为“领民的兀鲁思”，持续对立。

明朝虽然自称是元朝正统的继承者，但统治的范围只有中原和云南，事实上仅是汉的王国，并非如元朝般的大帝国。朝鲜半岛独立建立朝鲜王国。明朝将军事基地设在南满洲辽河三角洲，是为了阻挡蒙古高原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联系，但这是否代表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呢？明朝所建的万里长城只到山海关为止，辽河三角洲并不包含在内，这说明什么？

明朝的确复兴了汉人的中国，但所复兴的中国并非过

去宋朝的中国，而是经过蒙古化的中国。明朝的制度全都受到蒙古的影响。全国的人口被分类为“军户”和“民户”。军户是世袭的职业军人家族，民户则是一般人的家族。这是游牧民族和定居居民的二重组织，自从契丹帝国以来就没有改变。军户的城市称作“卫”（军团），民户的城市则称作“县”。卫之下有五个“千户所”（千人队），千户所之下有五个“百户所”（百人队）。这是自匈奴以来，游牧民族的十进组织法。民户也利用十进法编制，相当于百户所的是“里”，之下有十个“甲”。明朝的皇族率领军队在中国各地为王，这也是蒙古的兀鲁思制度。就这样，明朝的制度在中国史无前例，是蒙古帝国留下的遗产。

蒙古与儒教

另外，甚至连明朝公认的朱子学儒教，其实也是蒙古帝国的遗产。儒教在黄巾之乱、东汉垮台之后失去了权威，作为一个宗教，实际上已经消灭。然而儒教留下的经典从隋朝开始成为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汉字原本没有词性、性别、数量、格或时态之分，用汉字所写下的汉文也没有文法。如果想要解读汉文，除了参考古典中熟语的用例外别无他法。中国没有共通的口语，汉文是唯一的沟通手段。因此，对于统一中国的隋朝而言，需要大量熟知汉字使用方式的官员，科举考试就是为了要录取这些官员，因此作

诗、作文的能力成了考试的项目。作诗主要看的是押韵与平仄，测试考生是否正确知道汉字的读音。至于作文，则在测试考生是否熟记大量的古典文书。唐朝为了科举的考生编纂了儒教经典公认的注疏，这些注疏被称为“正义”。

另外，在中国取代儒教盛行的宗教是崇拜秘密结社众神的道教，以及外国居民的佛教。道教与佛教从南北朝时代开始直到唐朝，相互激烈竞争，最后获胜的是道教。而佛教自从遭到公元 845 年的大迫害（会昌法难，“武宗灭佛”）之后，从此在中国再也没有成为主流宗教。道教综合佛教和儒教的教义，创造出了庞大的体系。而宋代兴盛的新儒学，也就是所谓的宋学，完全借用了道教的体系，只是将术语改成儒教经典中的熟语而已。完成宋学的是出生于南宋时代的朱熹（公元 1130 至 1200 年）。然而，朱熹的朱子学推翻了科举用经典公认的注疏，因此被认为是异端，遭到迫害，在南宋时代终究未能获得承认。

保护朱子学的是对任何宗教都十分宽容的蒙古人。元朝在公元 1315 年重开科举考试之时，朱熹的经典注疏，首度被列入考试的范围。明朝承认了朱子学，在科举方面给予朱子学一定程度的地位，这完全是模仿元朝的作法，并非复兴了中国文化的传统。

清朝复兴蒙古帝国

明朝于公元 1644 年亡于内乱，取而代之的是满洲人建立的清朝，进入北京统治中国。满洲人就是以前的女真人。女真人的金朝在被蒙古人灭亡后，女真人依旧住在满洲的森林地带，接受蒙古帝国的统治。元朝退回蒙古高原之后，明朝将军事基地设在南满洲的辽河三角洲，授予女真人首领将校的职位，借此拉拢女真人。担任建州卫都指挥使一职的努尔哈赤（清太祖）便是其中一人。他在明军司令官的庇护之下逐渐统一女真人，于公元 1616 年宣布独立，自称后金汗国的大汗，与明朝开战，占领了辽河三角洲。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清太宗）继承父业，于公元 1635 年派军征服了内蒙古。元朝最后的正统林丹汗病死，皇后和皇子捧着过去元朝皇帝的玉玺向皇太极投降。如此一来，皇太极认为自己继承了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天命，于是于隔年在沈阳登基，当上了大清皇帝。这就是清朝的建国。八年后明朝灭亡，清朝征服了整个中国。

满洲人的清朝在公元 18 世纪统治了满洲、中原、蒙古高原、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以及西藏。经常有人误解，清朝其实并非中国的王朝，中国不过是清帝国的殖民地之一。在大清帝国，各个种族适用不同的法律。满洲人有《八旗则例》、蒙古人有《蒙古例》、西藏人有《西藏事

例》、塔里木盆地中说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则有《回疆则例》，各自有各自的法律，而《大清律例》是适用于汉人的法律。大清帝国的第一公用语是满洲语，皇帝与各种族之间的往来原则上使用满洲语，汉文只有在统治汉人的时候使用。

清朝的皇帝对汉人而言是皇帝，对其他种族的人而言，是自蒙古帝国以来的大汗。北京连接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是皇帝冬天的营地。到了夏天，皇帝会前往承德避暑，在那里住在移动式的斡鲁朵中，骑马狩猎，展现游牧民族首领的一面。

公元 1911 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隔年，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帝退位，大清帝国瓦解。中华民国主张自己是继承清朝帝国统治权的正统政权。相较于中华民国，公元 1949 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了过去大清帝国的所有领土。唯一的例外是外蒙古（蒙古国）。因此我认为，中国也是由蒙古帝国打下基础的国家，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

蒙古的继承国——俄罗斯

俄罗斯也是蒙古的继承国。俄罗斯是从斯堪的纳维亚而来的罗斯人，统治东斯拉夫人与芬兰人所建立的国家。然而，罗斯人没有统一，而是由留里克的公爵们分别掌管各自的城市，公元 1237 年遭到蒙古人入侵。之后，罗斯人

臣服于金帐汗国的大汗们，开始了五百年所谓“鞑靼枷锁”的年代。“鞑靼”是俄罗斯语，指的是说着突厥语的伊斯兰教徒蒙古人。

在蒙古的统治之下，罗斯的文化发展神速。由于蒙古人征收人头税，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户籍，并设有征税官和驻扎部队。罗斯人的城市在此首度出现了征税和户籍制度，拥有自己的行政机关。罗斯的贵族们趁着前往金帐汗国执行政务的期间，享受大汗宫廷的高水准生活，对蒙古文化充满向往。他们为了超越其他罗斯人，因此十分热衷于与蒙古人联姻，结成亲戚。另外，有很多与其他蒙古人竞争失败的蒙古贵族前往罗斯的城市避难，成为罗斯的座上宾。不仅是政治，就连军事，罗斯的骑兵在编制、装备以及战术都采用蒙古的模式。唯有在宗教，罗斯人没有接受蒙古人的伊斯兰教，维持了自己的俄罗斯正教。也正因为蒙古人对所有宗教都十分宽容，免除了教会与修道院的税并加以保护，俄罗斯正教才能够如此普及。罗斯接受蒙古人的统治五百年，几乎完全蒙古化，这就是俄罗斯文明的基础。

莫斯科在公元 1237 年蒙古大军入侵时还只是一个小小的要塞，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直到公元 13 世纪末才逐渐成长。公元 14 世纪初，莫斯科公爵伊凡一世接受金帐汗国月即别汗的庇护，公元 1328 年被授予大公的地位，成为罗斯公爵们的领袖，负责征税。根据俄罗斯教会的年代记的记载，公元 1380 年，金帐汗国发生内乱，莫斯科大公德米特

里与觊觎汗位的克里米亚蒙古贵族玛麦在顿河上游的库里科沃大战，结果德米特里大获全胜。这场战役是俄罗斯在“鞑靼枷锁”之下最初的胜利，然而这场著名的库里科沃战役在同时代各国间交换的外交文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因此其真实性十分可疑。就算确有此事，应该也只是一场非常小的战役。

当时争夺莫斯科与罗斯霸权的大国是立陶宛。立陶宛的约盖拉大公与波兰女王结婚，成为基督教徒，并兼任波兰国王。进入公元 15 世纪，约盖拉的表弟维陶塔斯大公将立陶宛的领土向东和南扩张，统治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广大地方。这个时代，在立陶宛统治之下的罗斯是现在的白俄罗斯人，而在波兰统治之下的罗斯则是现在的乌克兰人。

术赤家的皇子哈吉格来，受到维陶塔斯大公的保护，于公元 1449 年，在立陶宛和波兰的支持之下，成为克里米亚汗国的大汗。四年后，奥斯曼帝国攻打拜占庭，灭了东罗马帝国。哈吉格来汗的儿子明里格来夺取金帐汗国的汗位，将金帐汗国往伏尔加河方向西移，与克里米亚合并。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将公元 1502 年发生的事称作“金帐汗国的灭亡”，然而事实上刚好相反，金帐汗国的势力因此到达前所未有的高峰。

当时的莫斯科大公是伊凡三世，正忙着合并罗斯各公爵的领土，进行统一。公元 1552 年，伏尔加河中游的喀山

(现在鞑靼斯坦共和国的首都) 汗国发生内斗，其中一派向伊凡三世的孙子伊凡四世求援，伊凡四世就这样正大光明地进入了喀山，赖着不走。俄罗斯的历史学家称“伊凡雷帝将俄罗斯从鞑靼枷锁中解放”，然而事实上，伊凡四世并非透过堂堂正正的战争，而是用拐骗的方式取得喀山。俄罗斯历史家还说伊凡四世在接下来的公元 1556 年灭了伏尔加河下游的“阿斯特拉罕汗国”。然而事实上，阿斯特拉罕汗国只是移到了布哈拉（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城市）而已，并没有灭亡。

虽然如此，伊凡四世除了“全罗斯大公”的称号之外，又多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沙皇”称号。俄罗斯语的“沙皇 (tsar)”来自于拉丁语的“caesar”，指的不是罗马帝国的“皇帝”，而是蒙古语的“汗”。另一方面，强大的克里米亚金帐汗国在公元 1517 年进攻莫斯科，要求莫斯科进贡。此后的莫斯科一直到公元 17 世纪末为止，都持续向克里米亚进贡。

伊凡四世在公元 1575 年让术赤家的皇子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蒙古名为萨因布拉特）坐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拥戴他为全罗斯的沙皇（汗）。隔年，伊凡四世接受西美昂·贝克布拉托维奇的让位，自己重新当上了沙皇。伊凡四世之所以会采取这么麻烦的手段，是由于如果遵照“成吉思汗原则”，则非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男子不能当大汗（沙皇），因此伊凡四世才会采用接受蒙古皇子禅让的形

式，赋予自己坐上莫斯科沙皇位置的正统性。如此一来，莫斯科大公首度成为全罗斯的大汗，与蒙古帝国其他的大汗们平起平坐。这就是俄罗斯帝国的起源。

伊凡四世死后不久，留里克家的血统中断，蒙古人的贵族鲍里斯·戈东诺夫当上了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沙皇于公元 1605 年死去，公元 1613 年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被选为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他是首位沙皇既非留里克家的罗斯人，也非术赤家的蒙古人。从这里开始可说是进入了俄罗斯的时代。然而，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宫廷内，依旧有许多蒙古贵族。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孙子彼得一世是从克里米亚的金帐汗国独立后第一位沙皇，公元 1721 年，采用了“皇帝 (imperator)” 的称号。

金帐汗国是在公元 1783 年灭亡，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了克里米亚。从公元 1237 年拔都率领蒙古军队入侵罗斯开始，一直到金帐汗国灭亡为止，经过了五百四十六年。公元 1945 年，斯大林摧毁了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流放了当地的鞑靼人，而这些鞑靼人正是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后裔。

自从沙皇伊凡四世以来，俄罗斯（罗斯）开始向东方的西伯利亚入侵。事情的开端发生在公元 1581 年，哥萨克人的叶尔马克占领了西伯利亚库楚汗的城市。之后不到七十年的公元 1649 年，俄罗斯已经很快扩展到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主要是利用水路向森林地带推进。实际执行俄罗斯帝国东进的哥萨克人并不是斯拉夫人。哥萨克人是顿河

下游流域的草原游牧民族，属于改信俄罗斯正教的鞑靼人，也就是蒙古人。因此，将俄罗斯向东推展的实际上是蒙古人的后裔，可以视为蒙古人试图恢复过去蒙古帝国的领土而采取的行动。征服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行动还算容易，相较之下，征服西突厥斯坦术赤家族各国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直到公元 19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才终于大功告成。总而言之，公元 13 至 14 世纪的蒙古帝国西半部属于俄罗斯帝国，而东半部则属于大清帝国的领土。因此，俄罗斯充其量不过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到公元 18 世纪彼得一世的时代为止都是蒙古文明的一环，与地中海世界和西欧世界几乎完全隔绝。

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

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与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各国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和法国切割奥斯曼帝国所创造的国家。建立奥斯曼帝国的奥斯曼家族出身于公元 13 世纪驻扎安纳托利亚的蒙古军。奥斯曼家族代代与东罗马帝国交战，公元 1365 年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以靠欧洲的埃迪尔内为首都。公元 1453 年，奥斯曼帝国进攻拜占庭（伊斯坦布尔），灭了东罗马帝国后迁都拜占庭。公元 1517 年，灭了马穆鲁克王朝，合并埃及，统治权遍及巴尔干半岛、东地中海、西亚以及北非。在巴尔干地区，苏丹苏莱曼一

世于公元 1526 年的莫哈奇之战中收服匈牙利，又于公元 1529 年亲自包围维也纳，震撼了整个欧洲。就像这样，奥斯曼帝国一步步地完成蒙古伊儿汗们的目标。

奥斯曼帝国的全盛时期大约维持了一百五十年。公元 1683 年，第二次围剿维也纳失败，失去了匈牙利，自此之后开始走下坡。公元 18 世纪，西欧开始占上风，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败战后，奥斯曼帝国遭到了解体的命运，只剩下安纳托利亚地区。然而，公元 1923 年，凯末尔·阿塔蒂尔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在安卡拉发动独立战争，公元 1923 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成为第一任总统。在此之前的奥斯曼帝国，其共通语虽然是土耳其语（突厥语），但奥斯曼混杂了许多不同种族，大家不认为自己是土耳其人。“土耳其”含有乡下人的意思，反而被当作贬低人的称呼。然而，凯末尔为了维持国家独立，以土耳其民族主义为口号，积极推动非奥斯曼化的改革运动，主张土耳其共和国的国民是纯粹的土耳其民族，这些完全与事实相反。

“民族”是公元 19 世纪才产生的新观念。现在世界通用的“国家”本身也是新的观念，古代相当于国家的是君主财产的观念。法国革命后，从领地、领民中拿掉君主的“国家”观念才首度成型，取代君主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公民（citoyen）”，诞生了公民才是国家主权者的观念。与眼睛可见、拥有明显人格特质的君主不同，所谓的公民很难掌握，到底谁是公民，谁又不是公民，之间的区分非常模

糊。因此，取代“公民”的是拥有共同国土、共同国语的“国民（nation）”。民族所构成的“国民国家（nation state）”才是真正国家的思想（国民主义，Nationalism）逐渐成形，就好像法国革命以前君主的领地和领民实际上已经是国民国家一般。

如此一来，必定会出现想要建立民族国家却又尚未能实现的一群人。这些人在日文中称作“民族”，这是公元20世纪初日俄战争后日本创造出的词汇，欧洲并没有相当于民族的词汇。现代中文中的“民族”是借用日文而来。日本国民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血统，称作“大和民族”。“民族”这个词是在长久以来保持孤立的日本才得以成立的特殊观念。为此，在国土上获得国民的认可，建立国家的“国民主义”，在日本被翻译为“民族主义”。

民族原本是没有实体的观念，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普及之后，说着同样语言的“民族”全被归属为拥有相同祖先血统的“同胞”，完全无视于过去的事。实际上，语言不是遗传的东西，只要是人类，都有能力说任何一种语言。例如，爱尔兰人以前属于凯尔特语系人，说着盖尔语，而现在说的则是属于日耳曼语系的英语。然而不会因此说凯尔特语系人的爱尔兰人变成了日耳曼语系人。什么语系的人指的是语言系统，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血统无关。然而语言的系统经常与血统混淆。

拜凯末尔·阿塔蒂尔克鼓吹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所赐，

出现了既然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共和国国民是纯粹的土耳其民族，那么大家应该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的主张。同时也诞生了在广大中央欧亚各地方说着土耳其语（突厥语）的人们皆是单一土耳其民族的思想。然而这个单一土耳其民族的思想与事实相反。的确，突厥语在公元 7 世纪成为蒙古高原上后突厥帝国的公用语，之后千年以上的时间，有非常多的种族采用突厥语为公用语。然而，这些种族的起源繁杂，在族谱上不见得每一个种族都拥有相同的血统。在出现民族观念之前，说到“突厥人”，指的仅是说突厥语的人，然而自公元 13 世纪的蒙古帝国起的时代，在伊斯兰的世界中，“突厥人”和“蒙古人”变成了同义语。直到公元 19 世纪，西欧的比较语言学发达，与印欧语系作区别，有些语言归在突厥语系，有些语言归在蒙古语系之下。因此，土耳其共和国的土耳其人，他们的身份完全是奥斯曼帝国欧洲化后的产物。

现代世界的印度人、伊朗人、中国人、俄罗斯人、土耳其人的国民全都是蒙古帝国的产物，也是蒙古帝国留下的遗产。不仅如此，现代世界经济指导原则的资本主义也是蒙古帝国的遗产。

蒙古与资本主义经济

蒙古帝国由多个兀鲁思构成，他们的共同点在于相信

成吉思汗所被授予的天命，遵守成吉思汗的“札撒”法典，拥戴成吉思汗的男性子孙为汗。蒙古帝国的文明延续自契丹帝国，结合游牧型政治与定居型的经济。蒙古大征服的结果是，欧亚大陆各个角落的交通都变得很方便，相同的文明与系统得以普及，连结各地的经济活动十分发达。在金帝国的华北地区建立起的信用交易与资本主义经济，趁势扩展到蒙古世界各地，也带给了与蒙古相邻的西欧莫大的影响。蒙古帝国强盛的公元13世纪，在地中海世界，掌握黑海与东地中海贸易权的威尼斯出现了欧洲最早的银行。从威尼斯越过阿尔卑斯山，资本主义的经营形态扩展到了西欧地区。这也是因为蒙古帝国的建立才有可能发生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最早成功发行纸币的是蒙古人。元朝的忽必烈汗为了蓬勃发展的远距离贸易的计算方便，于公元1275年发行了世界最早的法定纸币。这是元朝唯一的法定货币，除了纸币之外不使用金币、银币或铜币。蒙古纸币的信用高，流通顺畅，价值安定，通货膨胀的程度也不高。然而，公元1351年红巾之乱后，爆发了恶性通货膨胀，纸币的信用暴跌。从元朝手里夺回中国的明朝虽然仿效元朝发行纸币，但明朝的信用远不及蒙古人的元朝，纸币完全无法流通，因此中国的经济也停滞不前。等到公元16世纪中，西班牙人沿着太平洋航路到达菲律宾，墨西哥产的银大量流往中国，白银成了主要的货币，之后明朝中国的经济才逐渐好转。光从通货制度也可以看出蒙古帝

国对现代世界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

蒙古帝国的弱点在于它是一个大陆帝国。陆上运输的成本比水上运输高出许多，距离越远，差异越大。关于这一点，海洋国家只要确保港口，用比陆军规模小的海军维持海上的控制权，就可以用低价成本在短时间内运送大量的物资，经营贸易获得广大的利益。这就是蒙古帝国外围的各国开始进入所谓大航海时代的原因。

在西欧，所谓的大航海时代一般是从公元 1415 年葡萄牙人进攻直布罗陀对岸的休达，确保非洲大陆西海岸航路开始算起。公元 1497 年，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南端进入印度洋，隔年抵达印度，公元 1511 年灭了马来半岛的马六甲苏丹王朝，以此为根据地进入南海，于公元 1517 年抵达中国。紧接在葡萄牙人之后，西班牙人从大西洋绕南非大陆南端，于公元 1521 年抵达菲律宾，公元 1571 年建设了马尼拉。然而位于蒙古帝国东侧的日本早在葡萄牙人进攻休达前半世纪，就已经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东海的贸易在公元 13 世纪蒙古帝国出现之前，都由中国的商船独占。到了公元 1350 年，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贼开始在朝鲜半岛沿岸作乱，之后又移到中国大陆沿岸。倭寇沿着东海渐渐南下，与华南海岸的中国海贼会合，在公元 16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到

达中国的同一时期，倭寇的势力达到了巅峰。这些都诉说着大陆帝国时代的凋零，取而代之的海洋帝国时代。

公元20世纪末的现在，世界的三大势力分别是美国、日本、以及以德国为首的欧盟。这些国家的本质都是海洋国家。美国虽然看起来像大陆国家，但实际上美国的文明集中在大西洋和太平洋沿岸，中间的大陆地区几乎是空白，且称霸世界的根源是压倒性的海军军事力。日本无疑是一个海洋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有效利用海运，从事资源的输入和制品的输出。在西欧，大西洋出口量大的国家分别是英国、法国、德国，他们依序成功工业化，成为欧盟的核心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这些国家过去都在是蒙古帝国统治的外围逐渐发展而成的势力，同样是在资本主义之下成功的国家。相反地，过去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俄罗斯联邦等各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都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分别占据了蒙古帝国统治圈的西半部和东半部。他们长久以来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蒙古帝国和继承国的社会主义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

无论是苏联原型的俄罗斯帝国，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型的大清帝国，都不是原住民的民族政权，而是远离原住民的政权。构成帝国的众多种族，他们的代表各自向皇帝个人发誓服从，以这样的方式维持帝国的统合。除此之

外，在俄罗斯帝国，无论是什么种族出身的人，只要改信俄罗斯正教就是俄罗斯人，发誓效忠皇帝。

这样的俄罗斯和中国在公元 20 世纪时发生革命，皇帝制度被推翻之后，在此之前以皇帝的人格为中心而得以维持的领土与领民由新的共和国继承，必须要用其他的原理来抑制盛行的民族主义，避免分裂，维持统合。这时派上用场的就是马克思主张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的对立优先于民族的差异，同一阶级的利害关系超越了民族。以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公元 1922 年 12 月列宁所制定的联邦制度当中，各民族各自组成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民族区，与代表各自劳动者和农民阶级的共产党联动，进行统治。有趣的是，俄罗斯，也就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在的俄罗斯联邦）没有自己的共产党，全联邦共产党兼具俄罗斯共产党的角色。这个制度以马克思的无神论为国教，否定了俄罗斯正教，这使得俄罗斯民族失去了身份认同的根据。

日本战败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军事力统合了过去大清帝国的统治圈，他们模仿苏联的联邦方式，为了统治非汉人的地带，设置了与省并列的民族自治区。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

社会主义消逝后的俄罗斯与中国，首先资本主义在这两个国家不可能成功。俄罗斯人与中国人都住在中央欧亚草原之道两端的地区。为此，两国国民在国民形成以前，

不断地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与统治，受到深刻的影响，也造就了两国现在的样子。长久以来，俄罗斯人和中国汉人充其量不过是被统治阶级。为此，俄罗斯人和中国汉人的性格倾向无政府主义。这样的性格不适合以个人的自发性和责任感为前提的资本主义。这也是蒙古帝国统治的后遗症。

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后开始的蒙古帝国，留给了现代世界各种各样的遗产，可说是蒙古帝国创造了世界。

第7章 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

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大领域

现代日本的历史学可分为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大类，彼此之间的区隔明确。这是在欧洲的历史学中所看不到的现象，之所以会有这样明显的区隔，这与日本的大学制度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东京大学的前身是“帝国大学”，于公元1886（明治十九）年创立。隔年，帝国大学邀请犹太裔德国人的路德维格·里斯教授，在文科大学（文学部的前身）开设了“史学系”。里斯是德国伟大历史学者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弟子，他将重视实证的兰克学派历史学首度移植日本，带进了自己在东京新创立的史学系中。

两年后的公元1889年，与史学系并列，文科大学另外开设了“国史系”。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日本的大学制度中，从一开始就将西欧的“史学”与以日本史为对象的“国史学”视为两种不同的学问。之后，与国史系、史学系

并列，据说另外又开设了以中国史为对象的“汉史系”。到了公元1904年，国史、史学、汉史三系被整合为新的“史学系”，当中又分有“支那史学”和“西洋学”两个领域。之后的公元1910（明治四十三）年，“支那史学”改名为“东洋史学”。如此一来，国史、东洋史、西洋史的三大领域就到齐了。文科大学后来改为文学部，单一的史学系又在公元1919（大正八）年时分为国史学系、东洋史学系、西洋史学系三个独立的科系。

问题在于，日本为何需要区分这三个科系呢？这是因为属于日本历史学研究对象的日本文明、中国文明、地中海文明，这三大文明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历史学原本应该站在一元的世界观上，但由于受到三大文明根本性差异的牵绊，根据领域采用了不同的形式。

历史属于文化。孕育出地中海文明的历史与孕育出中国文明的历史，各自蕴含了各个区域特有文化的特征，都是从自己的区域看世界。最初创造历史的历史家，他们出生的年代与最初想要写下历史的动机，决定了历史的架构。

这就是历史最初的特征。历史在成立之初，只有作者自己的区域才是值得被称为世界的地方，然而对于认为地球整体才是世界的现代人而言，完全仰仗既成的地中海型或中国型的历史架构来书写世界史，在叙述世界史的层面上完全没有意义。如果不拘泥于这些既成的架构，现在又尚未找出属于世界史的新架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世界

史无法成立。事实上，现在“世界史”并不成立。

无论是用公元前5世纪时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观，或是用公元前2世纪末时司马迁所创造出的中国型历史观，都不足以解释现实的世界史。其实冷静想一想就会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大多数的日本历史学者却依旧努力试图用旧有历史观解释世界史，这些只是徒劳无功，终究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日本史的特征

国史学系研究的日本史从公元8世纪的《日本书纪》开始，一直到公元17世纪至20世纪初持续编纂的水户藩《大日本史》为止。“正史”的架构在日本根深蒂固，想要跳脱出来十分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古文书的研究等仅是用来辅助正史，而不是从正史中完全独立出来的研究领域。

决定日本正史架构的是日本最初的历史——《日本书纪》。从公元668年日本建国时起，日本文明就已经有《日本书纪》这样具代表性的完整历史，这是因为日本文明是从有历史文化的中国文明中独立且与之对抗的文明。

日本列岛的倭人们从公元前108年汉武帝灭了大同江畔的朝鲜王国，在朝鲜半岛设置真番郡、乐浪郡等四郡的时候开始，就被纳入了以皇帝为顶点的中国文明圈之中。然

而，公元4世纪的五胡十六国之乱让中国有一段时间没有了皇帝，东北亚的诸王国纷纷从中国独立，在日本列岛的难波地区，也出现了河内王朝（仁德至清宁天皇）的倭王。河内王朝之后由播磨王朝（顾宗至武烈天皇）继承，之后再由越前王朝（从继体天皇起）继承。这个时代，倭王可以直接统治的范围仅限京畿的中心部，并没有统治日本列岛整体。倭王的同盟国百济王国于公元660年被唐朝和新罗的联军歼灭。倭人虽派兵援救百济，但援救终告失败。公元663年在白村江战败之后，倭人被赶出了朝鲜半岛，成为当时世界的孤儿。在这样的危机之下，日本列岛的倭人与华侨为了自卫，以倭王家为中心，团结一致，建立了统一王国。公元668年，天智天皇在首都大津即位，制定了最初的成文法典《近江令》。在这法典的规范之中，倭王对外自称“明神御宇日本天皇”，在此首度诞生了“日本”这个国号，以及“天皇”这个王号。

日本的建国是倭人和华侨为了与唐帝国对抗，从皇帝的统治中自我保护所采取的措施。从这里开始的日本文明，逃不出对抗文明的宿命，构成日本文明的文化要素与中国文明几乎一样，历史的架构也是其中之一。日本最初的正史《日本书纪》是天智天皇的弟弟天武天皇于公元681年开始着手编纂，于天武天皇的嫡曾孙圣武天皇即位前的公元720年完成。《日本书纪》的内容虽然完全遵照司马迁《史记》的架构，却强调日本文明从一开始就与中国完全没

有关系，是自行发展出的文明。《日本书纪》中，日本的建国不是公元 668 年，而是将公元前 660 年即位的神武天皇视为首代日本天皇。《日本书纪》遵照东汉郑玄的理论，从实际日本建国的机缘，也就是百济灭亡的公元 660 年开始，向前追溯文明一个循环的一千三百二十年，将推算出的公元前 660 年设为日本的建国年分。另外，《日本书纪》还编造出了从天神的子孙神武天皇至十五代应神天皇为止的虚构天皇，创造出了所谓的“大和朝廷”，将这个朝廷放在实际存在的河内王朝首代的仁德天皇之前，从大和朝廷、河内王朝、播磨王朝、越前王朝，连结了一贯的血统。这是模仿《史记》从黄帝到汉武帝一脉相传的“正统”理论，主张从天而降的神为日本带来了独立的正统，万世一系的天皇继承这个正统，一直传到《日本书纪》编纂当时的天皇们。这样的叙述完全是虚构，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然而，恐怕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国史都大同小异，只有自己的国家才是世界，自己的小世界与周围的世界无关，是自行发展而成的，而国史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宣扬这样的意识形态。

现代日本的日本史学多少试图做出一些修正，但大致而言还是脱离不了《日本书纪》所编造出的日本的独自性和自主性等架构。为此，公元 1871 年“日清修好条规”之后除外。在此之前的时代，都认为中国对日本史的影响并非本质的要素，受到轻视。然而这样的态度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简单举一个例子，征夷大将军是边境驻扎军的司令

官，充其量不过是武家的栋梁。然而，为了在日本国内获得正统政权的地位，理论上必须获得其他国家在国际上的承认。如果无视于明朝的永乐帝于公元1408年封日本将军足利义持为“日本国王”，承认他为日本国的元首，那么将无法解释至公元1868年明治维新为止的日本武家政治。

就像这样，无论哪一个时代，日本史和东洋史之间原本应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但现实中，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像样的对谈。

那么，与属于“国史系”的日本史不同，同样来自里思“史学系”的东洋史和西洋史又如何呢？两者皆采用了兰克学派的实证研究法，实际上严重受到中国正史的传统架构影响。

中国型的西洋史

一般的西洋史概论中，欧洲文明的历史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开始，经过希腊、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法兰克王国，之后的法国、德国、英国等。然而实际上，地中海文明的根源就如同“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所写的一样，是从埃及开始。不仅对希腊人而言如此，对犹太人而言也是一样。《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中，摩西率领同族人逃离埃及的故事，代表了犹太人的文化起源于埃及。《旧约圣经》当中有一段故事记载犹太人是在“巴比伦囚虏”时代

中，从美索不达米亚而来的一群人，另外《创世纪》中叙述的伊甸园、诺亚方舟、巴比伦塔，以及始祖亚伯拉罕出身于迦勒底的吾珥，这些都说明了犹太人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由于这个印象太过强烈，因此后世的基督教徒才会将美索不达米亚当作文明的发祥地。

另一方面，日本的西洋史概论是从希腊开始，直到法国、德国、英国等明治维新当时的世界三大强国为终结，以这一连串的历史为主轴。这是将自从《史记》以来的中国“正统”观念套用在西洋史之上，试图以此理解欧洲的历史。日本将直到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的时代称作“古代”，之后直到公元15世纪东罗马帝国灭亡为止的时代称作“中世纪”，之后的时代称作“近代”。对于这样的区分方式，几乎所有人都不抱有一点疑问，这就是日本将中国“正统”观念套用在西洋史之上最好的证据。这个区分方式明显是以罗马的“皇帝”为基准做出的时代区分，依照的是中国史以历代王朝为基准的“断代史”架构。然而，“奥古斯都”不是皇帝。“奥古斯都”的本质是“元老院的首席议员”。首先要有元老院，才会有“奥古斯都”的存在。相反地，从秦始皇开始的中国皇帝是世界的中心，先有皇帝才有中国，与“奥古斯都”的性质不相同。将“奥古斯都”误译为“皇帝”本身就代表了日本人试图用熟悉的中国史来理解不熟悉的欧洲史所做出的努力。

类似古代“皇帝”的误译，中世纪的“封建”其实也

是一种误译。中国史的“封建”指的是武装移民占领新的土地建立城市的意思。然而，欧洲史的“Feudalism”指的是骑士与一人或复数的君主签订契约，奉上土地（feud）一部分的手续费（fee）换取君主的保护，这与中国的“封建”几乎没有任何的共通点。然而日本将西洋史的“Feudalism”误译为“封建制”是因为，西洋史学者不具有中国史的知识，而东洋史学者也不具有欧洲史的知识，双方没有相互纠正错误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将时代区分为“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封建制、近代资本制”，各自的时代中存在着各自独特的生产模式。不用说，这当然是未必合理的区分法。时代的三区分是以政治为基准，没有任何理由要以经济结构来区分。再加上，奴隶制是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现象，封建制是中世纪大陆地区西欧世界的现象，地点完全不同。另外，实行“Feudalism”的实际上仅限东从易北河，西至卢瓦尔河为止的地区，并不是全欧洲的普遍现象，更不是全世界的普遍现象。实行“Feudalism”的主要是法兰克王国的中心部，从中可以看出，这是日耳曼人的部族社会移植罗马型城市文明所形成的特殊现象。

东洋史的失败

无论如何，日本的西洋史将“Feudalism”误译为“封

“建制”的结果，影响了日本的东洋史，让人有一种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经实行“Feudalism”的错误印象。依照这样的理论，如果将秦始皇以前的时代归为“中世纪”，那么中国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进入了“近代”。然而实际上，这时中国出现的是皇帝制度。另一方面，将罗马的“奥古斯都”误译为“皇帝”，这让中国在“中世纪”之后回到了“古代”。而且，“古代”何时结束又是另一个问题，照这样的逻辑推算，公元1912年清宣统帝退位，中国的“古代”才终于结束。

内藤湖南教授（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系东洋史第一讲座的首代教授）提出了新的理论，以宋朝出现皇帝独裁政治为基准，将公元10世纪之后的时代称作“近世”。然而这个理论又引发了新的问题，中国史的“近世”与欧洲史从公元15世纪开始的“近代”要如何对照？这又让东洋史学者伤透了脑筋。将中国的皇帝独裁对应欧洲的“专制主义”也是一种方法，然而问题是专制主义是只有出现在法国的现象，并不是近代欧洲普遍的现象，当然也就不能当作是近代欧洲的特征。

欧洲式的时代区分法不适用于中国，这对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而言是非常不方便的事。如果历史不是依照时代的阶段朝着一定的方向“发展”，那么当然也就无法到达最终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历史是善恶两大势力的斗争，对此有一定的‘发展’方向，在最终阶段，善的势力

获胜，世界静止，历史终结”。这样的思想最初出现在波斯的祆教，乌托邦的幻想也属于这一系列。在这样的思想之下，历史学的终极目标在于依照社会发展阶段来划分时代，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将无法预言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

这样的混乱全来自于认为地中海型的历史观是普遍的历史观，试图将这样的历史观套用在中国型的历史之上。这样的观念让可怜的日本东洋史学家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变得空虚。他们试图将中国史地中海型化的方法除了时代划分的理论之外，还有东西文化交流史。

所谓的东西文化交流史就是收集“丝路”“南海贸易”等，出现在欧洲与中国双方记录中的片段，想尽办法将中国史与欧洲史相互对应。的确，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希腊人学者克劳狄乌斯·托勒密所著的地理书中记载了从罗马帝国的安条克到东汉长安之间的中亚交通道路。另外还记载了公元166年，遣使到东汉的大秦王安敦其实就是罗马“皇帝”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安东尼的有趣故事。但这些都只是很小的事情，充其量不过是有趣的小插曲罢了。

在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出现之前，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往来以及双方的贸易额都十分有限，不足以影响政治。想要透过东西文化交流整合中国史和欧洲史，怎么想都十分困难。只用这些表面的小技巧就想要将中国史重组成为欧洲型的历史，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蒙古帝国让世界史变得可能

历史是文化，根据创造出历史的文明区域，决定了历史通用的范围。拥有历史的两大文明——地中海（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各自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末创造出了固有的历史，直到公元12世纪为止，各自在各自的地区，以各自的历史架构书写历史。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出现，蒙古文明征服华夏文明又继续向西扩展，连接了地中海（西欧）文明。这让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覆盖整个欧亚大陆的世界史从此变得可能。

反映这样的状况，在公元14世纪蒙古帝国全盛时期，历史学家开始书写人类第一本真正的世界史。

拉希德丁·哈马丹尼的《史集》

公元1303年，伊朗高原上伊儿汗国的合赞汗命犹太人的宰相拉希德丁·哈马丹尼以宫廷中用蒙古语书写的古文书为基础，以波斯语写下蒙古帝国的历史。这本历史以《Jāmi‘al – Tavārīkh》为题，意指“历史的集成”，一般翻译为《史集》。《史集》共有三卷。第一卷是在公元1304年合赞汗死前的蒙古人历史。内容从蒙古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诸部族的历史开始写起。接下来是成吉思汗祖先们的故事，

从阿阑豁阿受到天上阳光的感应产下了孛端察儿开始，直到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为止的故事。之后是历代大汗的历史，从成吉思汗开始直到《史集》编纂当时的元朝皇帝铁穆耳汗（元成宗，蒙古帝国第六位大汗、大元王朝第二任皇帝）为止，记载包括大汗们的祖谱、后妃表和当代事迹等。在各自的当代事迹当中，在每年的科目底下，都会记载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大事。接下来是伊朗高原伊儿汗国大汗们的历史，从初代的旭烈兀汗到合赞汗为止。

第二卷是合赞汗的弟弟完者都汗的当代事迹，以及蒙古人之外各国国民的历史。外国历史的部分包括从《旧约圣经》亚当以来至预言家们为止的故事、穆罕默德与其继承者哈里发（哈利法）们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塞尔柱帝国、花剌子模帝国、中国、法兰克（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印度等的历史。第三卷原本应该是地理志，但没有流传下来。

从《史集》的架构可以看出这是以成吉思汗家为中心的世界史。这个世界史当中包含中国与西欧这两个拥有固有历史的文明，这是至今为止史无先例的事。这代表了蒙古帝国出现，首度让世界史变得可能。像这种正式的著作在此之前伊斯兰世界中，都是用艰深的文体，以阿拉伯语书写，然而《史集》是用波斯语书写，且文体属于简洁的散文。《史集》不选择《古兰经》的阿拉伯语，而是用通俗的波斯语书写，是因为这不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而是

以蒙古帝国为主的世界史。

贡噶多吉的《红史》

伊儿汗国宰相所著的《史集》之后，同样在公元 14 世纪，元朝统治之下的西藏也编纂了世界史，名为“Hulan debther（红史）”，意思是“红色的册子”。著者是名为蔡巴·贡噶多吉的佛教僧侣，公元 1346 年以藏语编纂了《红史》。《红史》前半部分是君王们的历史，分别叙述印度的王朝，宋王朝、西夏王朝以及蒙古王朝。虽说是王朝，但内容并非政治史，而是将重点放在帝王与佛教之间的关系。《红史》后半部分则是西藏佛教的历史，以受到忽必烈汗（元世祖）信任，被赋予统治西藏任务的萨迦派八思巴为首，叙述各个宗派由师父传给弟子的教义。这是从佛教的立场来看世界。

西藏从公元 7 世纪起就有文字的记录，但到了公元 9 世纪中期，政权覆灭，进入了没有记录的黑暗时代。黑暗时代持续了大约一百五十年。进入公元 11 世纪后，西藏各地豪族们彼此竞争，请来高僧建立寺院，借此累积财富。就像这样，在政治没有统一的情况下，西藏人形成了以佛教信仰作为身份的认知。

最初西夏帝国是西藏佛教最大的施主，到了公元 13 世纪蒙古人灭了西夏之后，改由蒙古的大汗们保护西藏佛教。

当中，忽必烈汗与僧侣八思巴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西藏之后的地位，奠定了佛教教团的领袖代表西藏接受帝王的皈依，在帝王的保护之下统治西藏的统治模式。

西藏文明继承了没有历史文化的印度文明，但另一方面又是与华夏文明碰撞的文明。因此，西藏的文字记录的多是西藏王的年代记，并没有可以用来定义世界的正式历史。到了公元 14 世纪，能够孕育出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佛教世界史，也是因为蒙古帝国的出现让西藏人接触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历史是世界史”的意识在西藏人的心中觉醒。

杜撰的《元朝秘史》

那么蒙古人自己又是怎么看待世界史的呢？公元 13 至 14 世纪，的确有大量以蒙古语写成的宫廷正式记录。然而很可惜地，这些记录都没有流传下来。唯一的例外是《元朝秘史》（蒙古的秘史），虽然不是正史，但是一本以蒙古语写成的书籍。

成吉思汗生前居住的斡鲁朵（移动式宫廷）在他死后依然留在外蒙古的克鲁伦河畔，他的随从过着与之前相同的生活，侍奉成吉思汗的亡灵。公元 1292 年，忽必烈汗让自己的孙子甘麻刺继承这个斡鲁朵的财产，甘麻刺成了成吉思汗陵的大祭司。在克鲁伦河畔的甘麻刺宫廷之中，整

理从成吉思汗的祖先一直到公元 1206 年成吉思汗即位为止而成的著作就是《元朝秘史》。《元朝秘史》是成吉思汗陵祭神的传说，由于并非蒙古帝国的正式记录，因此内容有很多都没有史实根据。再加上，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部族尚未有文字的记录，内容多半关于成吉思汗事迹的《元朝秘史》几乎都是想象力丰富的创作，不足以采信，也不能当作历史资料。然而从文章中可以感受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文学气息高。另外，甘麻刺的儿子也孙铁木儿于公元 1323 年继承了元朝的帝位。隔年，《元朝秘史续集》在克鲁伦河畔的成吉思汗陵中又完成了，它叙述成吉思汗的征战与死亡，一直到窝阔台汗即位为止的故事。

《蒙古源流》

成吉思汗的斡鲁朵后来成为蒙古鄂尔多斯部族的名称，从外蒙古的克鲁伦河畔迁到了内蒙古的黄河畔。这个部族供奉的成吉思汗陵现在遗留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伊金霍洛。鄂尔多斯部族的贵族，同时也是成吉思汗子孙的萨冈，于公元 1662 年以蒙古语书写了世界史。这本书的蒙古语书名为《额尔德尼因·托卜赤》，意指“宝石的纲要”。这本书在清朝被翻译成满洲语，之后又翻译成汉语，以《蒙古源流》为题。一般而言，汉语的书名比较广为人知。

这本蒙古语的世界史规模十分庞大。一开始叙述的是

宇宙的起源，在空中，风与风相互撞击形成风轮，风轮的热能产生云，云又下起了雨形成水轮，水面浮起的微粒子相互结合，逐渐发展成地轮。地轮上有一座须弥山，围绕须弥山有七重的铁围山、七重的无热池、四个大陆、八个小小大陆。接下来叙述的是人类的诞生。天人因贪图地上的食物而坠入人间，有男女之别，以种植稻米维生，相互为了争夺土地发生争执。以公平的方式平息争端的人被选为人类最初的王者。这个王的子孙是印度的王室。印度王室的释迦牟尼提倡佛教。印度王室末代的某一个王生下了一个长得像鸟一般相貌怪异的男婴。男婴被放入箱子后丢弃在恒河，有一位农夫将男婴捡了回来。长大成人后的男婴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越过山岭进入西藏，成为西藏人最初的君王，这就是西藏王室的起源。后来，某一任藏王被大臣所杀，王位也被篡夺。藏王的三个王子分别逃往各处避难，最小的王子孛儿帖赤那（黑白相间的狼）与妻子豁埃马阑勒（白鹿）一同向东，逃到了贝加尔湖畔的不儿罕合。勒敦山，被当地的居民选为君主。这就是蒙古王室的起源。孛儿帖赤那的子孙朵奔蔑儿干死后，他的妻子阿兰豁阿在梦里与一个美少年交欢，生下了三个男婴。最小的勃端察儿正是成吉思汗的祖先。也就是说，成吉思汗的祖谱可以从西藏与印度的王室，一直追溯到人类最初的王者，拥有地上最高贵的血统。

这是《蒙古流源》世界史大致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之

中，叙述完印度和西藏史之后，随着成吉思汗的诞生，进入了蒙古的历史。蒙古史的部分主要参考成吉思汗陵所传下的众多古文献，叙述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故事。当中，蒙古帝国灭金帝国的这一段历史中，提到从汉高祖到金帝国为止的中国史。成吉思汗之后的时代，故事从忽必烈汗（元世祖）开始，详细记述元朝历代大汗治世的事迹，一直到乌哈噶图汗（元顺帝）失去中原，退回蒙古高原为止的所有过程。

元朝退回蒙古高原之后，《蒙古流源》记述内容主要针对忽必烈家族后裔的蒙古大汗们与反忽必烈家族的部族联盟斡亦刺惕之间的对抗。公元 15 世纪，斡亦刺惕的也先汗曾经一度篡夺大汗之位。但在同世纪末，成吉思汗后裔中唯一存活下来的达延汗复兴了成吉思汗家族，他的十一个儿子分别当上各个部族的首领，蓬勃发展。《蒙古流源》记有达延汗儿子们诸子孙的祖谱和事迹，其中又以著者萨冈自己的鄂尔多斯部族的记述最为详尽。

满洲人是过去被成吉思汗所灭的金帝国的后裔，元朝最后的正统林丹汗死后，他的儿子向满洲人投降，将蒙古政权交给了满洲人，这就是清朝历史的开始。在明朝灭亡，清朝的顺治皇帝夺取中原政权的叙述当中，提到了明朝的历史。当中最有趣的是有关明朝永乐帝出身的故事。乌哈噶图汗退出中原的时候，留下了蒙古人的皇后，皇后当时已经怀有身孕。明朝的洪武帝迎娶了被留下的蒙古皇后，

生下的就是永乐帝。洪武帝另外一位汉人皇后所生的儿子是建文帝。永乐帝被父亲疏远，被赶到了北方边境的北京。洪武帝死后，在蒙古人的支持之下，永乐帝举兵杀了南京的建文帝，自己当上了皇帝，定都北京。这段故事主要的目的在于叙述明朝的历代皇帝身上也流着成吉思汗的血。永乐帝是乌哈噶图汗的儿子这件事当然不是真的，但这个故事主要想表现的是明朝也是蒙古帝国的继承国。

清朝的顺治皇帝整合了汉人、西藏人和斡亦刺惕人、朝鲜人、满洲人和蒙古人，再度确立了正统政权。《蒙古源流》所叙述的世界史，就到顺治皇帝的儿子康熙帝即位为止。

这个《蒙古源流》是以成吉思汗高贵的血统为中心的世界史，描绘成吉思汗所被赋予统一世界的天命，到了著者的时代再度得以实现的原委。

单一世界史的可能性

公元14至17世纪，蒙古帝国编纂世界史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出身于伊朗高原、西藏、蒙古高原等至今为止没有编纂历史传统的地方。无论是波斯语、藏语或是蒙古语，都不是至今主流历史的语言。也因此，他们不受到地中海型或中国型等既成历史架构的束缚。蒙古帝国所写出的世界史，每一本都是以成吉思汗家的祖谱为中心来叙述世界，

反映出了当时世界的真实面貌。

这里隐藏了解决地中海型历史与中国型历史、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矛盾，创造单一世界史的提示，那就是中央欧亚草原之道。中央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反复入侵定居居民的居住地区，他们的入侵创造出了两个有历史的文明，也就是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欧洲说着印欧语系的人们原本都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在中国之前的时代统治东亚城市国家的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也都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之后成为城市的居民，进而创造了中国。像这样，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成立之后，中央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每一次的入侵，都各自改变了两大文明的命运。地中海世界之所以结束古代，进入西欧世界的中世纪，也并非文明内部的因素所致，而是从蒙古高原迁徙而来的匈人将日耳曼人赶到了罗马的土地所造成的结果。另外，结束中世纪进入近代也是奥斯曼帝国继承蒙古帝国的霸业后入侵欧洲所造成的结果。而将西欧人的势力扩展到全世界的大航海时代，也是为了对抗至今为止掌握世界大权的蒙古帝国和他的继承国，西欧人才往海上寻求生路，建立海洋帝国。

同样地，在中国，秦汉时代第一阶段的中国灭亡之后，创建隋唐时代第二阶段中国的也是从中央欧亚草原迁徙而来的鲜卑等游牧民族。与鲜卑所建立的中原政权竞争，优势逐渐确立，最后甚至吞并中原的也是来自中央欧亚草原，包括突厥、回鹘、契丹、金、蒙古等在内的游牧民族。在

蒙古帝国的支配之下，中国彻底蒙古化，形成了元、明、清的第三阶段中国。经过蒙古化的中国文化，就是现在一般认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第三阶段的中国不再是以皇帝为中心单独运转的世界。这些中国的皇帝其实是以成吉思汗为原型的中央欧亚型游牧君主的中国版，中国实际上是中央欧亚世界的一部分。这个第三阶段中国的特征在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可以清楚看见。

如果想要超越来自希罗多德与《旧约圣经》《启示录》的地中海（西欧）型历史架构，以及来自《史记》与《资治通鉴》的中国型历史架构，不是仅仅将东洋史和西洋史混合，而是从头到尾叙述具有一贯性的世界史，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舍去文明内面或是自行发展的观念，把焦点放在从中央欧亚草原而来的外部力量，是他们改变了有历史的文明，以此为主轴来叙述历史。在这样的架构之下，可以将公元十三世纪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视为世界史以前的时代，独立看待各个文明。而蒙古帝国成立之后的时代则为世界史的时代，当作单一世界看待。

为了实践这样的做法，历史学家必须舍弃有历史的两大文明至今为止为了自我解释或合理化而创造出的概念或术语，找出无论套用在哪一个文明都不会产生矛盾的理论，做出真正合理的解释。如此一来，叙述单一世界史绝对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这本《世界史的诞生》便是最初的尝试。

参考文献的解说

第1章 1206年的天命 ——世界史从这里揭开序幕

关于罗斯与基督教东方教会，参考资料如下：

森安达也编《斯拉夫民族与东欧俄罗斯》（民族的世界史一〇，山川出版社，1986年）

关于成吉思汗接受天命，参考资料如下：

海老泽哲雄，《蒙古帝国对外文书管见》（《东方学》七四，1987年7月）

关于历史不具有普遍性，而是构成特定文明的文化要素，仅限于该文明的地区，参考资料如下：

冈田英弘、桦山纮一、川田顺造、山内昌之编《有历史的文明 没有历史的文明》（筑摩书房，1992年）

关于史蒂芬·霍金提出的时间与空间的起源，参考资料如下：

林一译《霍金，关于宇宙》（早川书房，1989年）

佐藤胜彦监译《霍金的最新宇宙论》（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0年）

关于非洲无文字社会的历史文化，参考资料如下：

川田顺造《无文字社会的历史》（岩波书店，1976年。同时代 Library 一六，1990年）

关于《有历史的文明 没有历史的文明》的基础报告，参考资料如下：

川田顺造《关于“历史的意志”——从非洲的无文字社会看起》

关于马雅文明的文字与历法，参考资料如下：

八杉佳穗《解开马雅文字》（中公新书六四四，中央公论社，1982年）

关于危地马拉的《波波尔·乌》，日文译本如下：

林屋永吉译、A·Recinos 原译《波波尔·乌》（中公文库 D 一九，中央公论社，1977年）

关于伊斯兰文明的时间观念，下列书籍有更简单易懂的说明：

片仓素子《伊斯兰的日常世界》（岩波新书一五四，岩波书店，1991年）

第2章 对立的历史 ——地中海文明的历史文化

希罗多德《历史》日文译本如下：

希罗多德著、松平千秋译《历史上中下》(岩波文库三三至四〇五，岩波书店，1971至1972年) 虽然有人批评这本译文意译过头，不够严谨，但也因此十分简单易懂。然而希腊语专有名词的长母音有些地方都以短母音标示。

关于《旧约圣经》与犹太教，参考资料如下：

石田友雄《犹太教史》(世界宗教史丛书四，山川出版社，1980年)

Cecil Roth著，长谷川真、安积锐二译《犹太人的历史》(Misuzu书房，1966年)

关于创造《启示录》千年王国思想的波斯祆教终末论，
参考资料如下：

铃木中正编《千年王国民众运动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第3章 皇帝的历史 ——中国文明的历史文化

本章根据《有历史的文明 没有历史的文明》中下列的基础报告，做出更详细的解说：

冈田英弘《中国文明的历史》

关于中国以前的城市国家时代、第一阶段中国的成立、黄巾之乱后的人口锐减、第二与第三阶段中国，参考资料如下：

桥本万太郎编《汉民族与中国社会》（民族的世界史五，山川出版社，1983年）中的第一章——

冈田英弘《东亚大陆民族》

以及，

冈田英弘《倭国》（中公新书四八二，中央公论社，1977年）

关于黄巾之乱的终末论，以下资料有更详细地说明：

冈田英弘编《亚洲与日本人》（讲座与比较文化第二卷，研究社，1977年）中的第十章——

冈田英弘《秘密结社》

第4章 创造世界史的草原民族

关于“中央欧亚的观念”，参考资料如下：

护雅夫、冈田英弘编《中央欧亚的世界》（民族的世界史四，山川出版社，1990年）的序章——

冈田英弘《中央欧亚的历史世界》

“中央欧亚大陆”这个词汇，最早是 Denis Sinor 于公元 1963 年使用。关于与“中央欧亚大陆”几乎同义的“内陆亚洲”在蒙古帝国以前的时代，参考资料如下：

Denis Sino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从《史记》的《匈奴列传》起，中国正史中游牧民族列传的日文翻译如下。书中并未收录所有的列传。另外，根据译者不同，译文的程度也不同：

内田吟风等译注《骑马民族史 1、2、3》（东洋文库一九七、二二三、二二八，平凡社，1971 至 1973 年）

第5章 游牧帝国的成长 ——从突厥到契丹

关于隋唐是鲜卑王朝的论点，请参考下列中国人的研究：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56年）

关于西藏帝国，请参考下列三项资料：

山口瑞凤《吐蕃王国成立史研究》（岩波书店，1983年）

山口瑞凤《西藏上、下》（东洋丛书三、四，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至1988年）

江上波夫编《中央亚洲史》（世界各国史一六，山川出版社，1986年）中的第四章——

山口瑞凤《西藏》

关于罗斯《原初年代记》，参考资料如下：

国本哲男、山口岩、中条直树译《俄罗斯原初年代记》（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87年）

第6章 蒙古帝国创造世界

关于蒙古人的历史，请参考下列四项资料：

Abraham Constantin Mouradgea d'Ohsson 著、佐口透译注《蒙古帝国史 1 - 6》（东洋文库一一〇、一二八、一八九、二三五、二九八、三六五，平凡社，1968 至 1979 年）

冈田英弘《成吉思汗》（中国的英杰九，集英社，1986 年。朝日文库、朝日新闻社，1994 年）

护雅夫、神田信夫编《北亚史（新版）》（世界各国史一二，山川出版社，1981 年）中的第四、五章——

冈田英弘《蒙古的统一》《蒙古的分裂》

《中央欧亚世界》的第三部——

宫胁淳子《蒙古系民族》

关于汉字的特征与汉文并非汉语，请参考之前提及的《亚洲与日本人》第五章——

冈田英弘《真实与语言》

以及之前提及的《汉民族与中国社会》中的《东亚大陆民族》。

关于清帝国各种族法律，参考资料如下：

岛田正郎《清朝蒙古例的研究》（东洋法史论

集第五，创文社，1982年）

关于蒙古帝国与罗斯的关系，参考资料如下：

Charles J. Halperin, *Russia and the Golden Hord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85.

关于术赤家的黄金斡鲁朵、鞑靼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请参考下列三项资料：

John Andrew Boyle tr.,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1.

Henry H. Howorth,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 PartII, Divisions1&2. Longmans, Green, and Co., London, 1880.

Boris Ischboldin, *Essays on Tatar History*. New Book Society of India, New Delhi, 1973.

关于元朝发行的纸币，参考资料如下：

岩村忍《蒙古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8年）

第7章 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

本章主题以参考下列文章所写的“前言”为基础：

冈田英弘《世界史是否成立》(《历史与地理》二一一，1973年4月)

关于日本的建国与《日本书纪》的编纂，除了之前提及的《倭国》(中公新书)之外的参考资料如下：

冈田英弘《倭国的时代》(文艺春秋，1976年。朝日文库，朝日新闻社，1994年)

关于欧洲的封建制度，参考资料如下：

大谷瑞郎《历史的理论从“封建”到近代》(刀水书房，一九八六年)

关于《史集》，现在尚未有完整的译本。下列是第一卷的俄罗斯译本：

L. A. Khetagurov, O. L. Smirnova tr., *Rashid-ad-din Sbornik Letopisei*, Tom I, Kniga pervaya & Kniga vtoraya. Izdatel'stvo Akademii Nauk SSSR, Moskva & Leningrad, 1952.

另外，之前提及的 *The Successors of Genghis Khan* 同样是《史集》第一卷，从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开始至铁穆耳汗（元朝的成宗皇帝）为止的部分英译。

关于《红史》，日文译本如下：

稻叶正就、佐藤长译《红史——西藏年代记》
(法藏馆，1964年)

关于《元朝秘史》，公元14世纪，明朝太祖洪武帝命人将《元朝秘史》的蒙古语原文音译，以汉字标示。下列这本书又将汉字的音译本书写成罗马拼音：

白鸟库吉译《音译蒙文元朝秘史》(东洋文
库，1942年)

公元1906年完成的《元朝秘史》日文译本，是除了原书中附有的汉译之外，全世界最早翻译《元朝秘史》蒙古原文的译本。文体属于拟古文体。

那珂通世译注《成吉思汗实录》(大日本图
书，1907年。筑摩书房，1943年)

《元朝秘史》口语体的日文译本如下。书中使用汉字正字以及古代的假名。

小林高四郎译注《蒙古的秘史》(生活社，
1940年)

最容易找到的《元朝秘史》日文译本如下。使用的文体介于拟古文和口语文之间。

村上正二译注《蒙古秘史1、2、3》(东洋文
库一六三、二〇九、二九四，平凡社，1970至
1976年)

关于《元朝秘史》作者与年代，参考资料如下：

冈田英弘《元朝秘史的成立》(《东洋学报》)

六六一一至四，1985年3月)

关于《蒙古源流》，尚未有日文译本。蒙古语原文中最完整的是下列的“库伦之书”：

Erich Haenisch, *Eine Urga – Handschrift des mongolischen Geschichtswerks von Secen Sagang (alias Sanang Secen)*. Akademie – Verlag, Berlin, 1955.

“库伦之书”遗漏的部分，补收录在下列的校订本中。

C. Nasunbaljur, *Sagang secen Erdeni – yin Tobci. Monumenta Historica*, Tomus I. Ulanbator, 1958.

将“库伦之书”的本文以罗马拼音表示，并附上索引的书如下。然而，原本应该含有全文英译和注解的第三卷尚未刊行。

Igor de Rachewiltz, John R. Krueger, *Erdeni – yin Tobci ('Precious Summary') Sagang Secen. I&II.*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0 – 1991.

《蒙古源流》蒙古文的完整译本现在只有德语版。但这个翻译自原文的德文译本比“库伦之书”还差。

Isaac Jakob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 – 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 St. Petersburg, 1829.

下列《蒙古源流》的译本是翻自于满洲文的译本
(Enetkek Tubet Monggo Han sai Da Sekiyen)。

江实译注《蒙古源流》(弘文堂书房, 1940年)

汉译本的《蒙古源流》也是翻译自满洲文译本, 但蒙古语在翻译成满洲语时就已经出现误译, 再加上从满州语翻译成汉语时的误译, 使用时须要特别留意。

后记

历史是文化。历史不单纯仅是过去的记录。

所谓历史是沿着时间与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叙述人类住的世界。并不是只要有人就一定有历史。

并不是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有历史这项文化。历史分别于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100年，诞生于地中海文明与中国文明。这两大文明之外的文明原本没有历史这项文化，就算有，也是从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文化中衍生而出的。

创造出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二位天才。一位是在地中海世界中，以希腊语写下《历史》的希罗多德。另一位则是在中国世界中，以汉字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在这二人写下最初的历史之前，希腊语的“historia”（英语“history”的语源）与汉字的“史”都不具有我们现在认知的“历史”的意思，当然也没有“历史”的观念。

同样是历史，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记

述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世界最初的历史叙述的是国家甚至都还没有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战胜亚洲大国波斯的故事，从中确立了“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这样的历史观与基督教《启示录》善恶对决的世界观相互重叠，“亚洲是坏人，欧洲是好人”这种相互对决的历史观甚至对现代的西欧文明都留下深远的影响。

相较于此，司马迁的《史记》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皇帝权力的起源，以及权力传承给现在皇帝的原委。“天命”（最高天神的命令）赋予皇帝统治“天下”（世界）的权限，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作“正统”。天命的正统如果出现了变化，皇帝将无法维持他的权力，因此，中国型的历史无论现实世界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记述时都会尽量忽视这些变化。

就像这样，同样是历史，地中海文明是以变化为主题对决历史观，而中国文明则是不承认变化的正统历史观。二者以各自的历史观记述历史，这对于今日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世界观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上述正是本书希望传递的主题之一。

本书的另一个主题则是，为了寻求世界史真正的可能性，不仅仅是将西洋史与东洋史合体，而是应该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

中央欧亚草原之道远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就是游牧

民族迁徙的路径。《史记》当中也记载，“匈奴”是蒙古高原上最初的游牧民族。这些中央欧亚世界草原民族的活动，其影响范围东从中国世界，西至地中海世界与欧洲世界。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在草原之道上建立了秩序，欧亚大陆的东西交流也更为频繁，这正是单一世界史的开始。

将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国视为世界史的开端具有四大意义。

第一，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了连结东方中国世界与西方地中海世界的“草原之道”，将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舞台做出了准备。

第二，由于蒙古帝国统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至今为止存在过的所有政权都一旦归零，由蒙古帝国重新划分新的国家。以这样的划分为基础，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现代亚洲和东欧各国就此诞生。

第三，诞生于中国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经由草原之道传进地中海世界，再传到了西欧世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

第四，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蒙古帝国外围的日本人与西欧人为了找寻活路，开始了海上贸易，这也使得历史的主角从至今为止的大陆帝国，移转到了海洋帝国。

公元13世纪之后的历史，已经无法再像过去一般，分别记述地中海、西欧世界的历史，以及中国世界的历史。

在蒙古帝国一处所发生的事情，立刻就会对其他地方造成影响，因此必须当作单一的世界史记述。也就是说，世界史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

自从 1992 年筑摩书房为我出版了这一本书开始，像我这样的论点影响了各个领域的人，尤其受到专门写作的同业支持，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本书在筑摩书房很荣幸地能够一再再版，这一次又发行了口袋书，让更多的读者有机会看到我的著作，我也特别在大家不熟悉的汉字旁标上了假名。

1999 年 7 月 冈田英弘

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汉文化中心论

重新认识世界史

人类文明中，唯有东方的中华文明和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是有历史传统的。它们分别以司马迁《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都是以自己的区域来看世界。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的兴起才打通东西藩篱，中华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命运因此改变，人类文明方才真正进入世界史的时代，这也正是蒙古史的文明意义。



ISBN 978-7-200-11662-5

9 787200 116625 >

定价：38.00元